

纪念长春解放四十周年（1948—1988）

围困长春

——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

沈阳军区《围困长春》编委会

長春文史資料

●一九八八年●第一輯

主 编 邹 衍

副主编 刘路明

编 委 侯 克 章 申 刘 悌

崔树人 崔树义 朱士良

李文魁 谢德恩 辛月天

郑庚顺

执 笔 崔树人 朱士良

序

肖劲光

《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一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该书编委会邹衍等同志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围困长春战役的指挥员，我有兴味地阅读了该书文稿。该书是在参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和走访许多当事人提供可靠素材的基础上，经过数次座谈讨论而完成的。它从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瓦解、敌人内部工作和我军群众工作等方面，翔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对围城中的各项政策作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述。文字朴实、生动，值得一读。看了该书，也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1948年10月，在东北战场上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在我兵临城下、久困长围之后，长春守敌第六十军光荣起义，接着新编第七军及第一兵团司令部也先后放下武器，向我军投诚。从此长春得到解放。此次战役起义和投诚国民党官兵约10万人，内中将3名。少将15名。在全国开创了国民党一个兵团的部队先后起义和投诚的先例。

是年5月，东北我军在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准备攻打长春，大军已向长春附近调集，并进行扫清外围战斗，占领了长春守敌赖以空运之大房身飞机场，取得歼敌3 000余名的胜利。从此长春完全被我军所包围。我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从全国战局考虑，把战略决战方向首先确定在东北战场，发起和指挥了伟大的辽沈战役。为集中优势兵力于辽西，在东北形成“关起门来打狗之势”，对长春采取特殊类型的战役——久困长围。我10万大军在长春外围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包围圈，使城内敌人陷于绝境。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资料入城。在敌人内外交困之际，我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使敌人内部分化瓦解，最后长春获得解放。围困长春战役的胜利，意义深远，而最为重要的，是牵制与分散了国民党的兵力，使我军能集结重兵于辽西方向作战，迅速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全胜。

长春围困作战中，由于国民党军队采取了“杀民养军”的政策，使许多人死于饥饿和疾病，人民和军队都付出了代价。值此长春解放四十周年之际，抚今追昔，我们沉痛地悼念为解放长春而牺牲的烈士和死难的人民群众，永远怀念着他们。

参加该书编写的同志，大都是已离休的当年围困长春战役的亲历者。他们在3年的时间里，克服重重困难，完成此书，全靠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发扬的。此书的出版，使老同志回忆过去，不忘艰苦的战斗历程；使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年轻同志，受到启迪，从中得知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无疑是一件有益的事。

1987年12月9日

紀念長春解放四十周年

1988年第1輯

(总第20輯)

長春文史資料

目 录

第1章	东北战场上的长春	[1]
第2章	六十军弃吉就长前后	[7]
第3章	敌军十万守孤城	[20]
第4章	第一次外围作战	[33]
第5章	转强攻为围困	[44]
第6章	固守有方 待援无望	[55]
第7章	揭开围困长春的战幕	[65]
第8章	经济封锁战线的斗争	[77]
第9章	相机出击 屡屡碰壁	[89]
第10章	威力强大的政治攻势	[100]
第11章	断绝粮源的守敌	[114]
第12章	长春人民的灾难	[127]

第13章	大难临头 各寻出路	[136]
第14章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勇士们	[143]
第15章	我党政军民共同对敌	[156]
第16章	我军力量的源泉	[170]
第17章	绝境中的长春守敌	[182]
第18章	我已布下天罗地网	[188]
第19章	第六十军光荣起义	[197]
第20章	新七军及一兵团部放下武器	[204]
第21章	长春人民重见光明	[212]
第22章	历史的结论	[224]

附录

围困长春大事记	[228]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所属部队师以上干部名单	[236]
长春国民党第一兵团所属师(旅)以上指挥官名单	[239]

后记	[240]
----	---------

东北战场上的长春

长春，这座美丽的北国名城，位于北纬 $43^{\circ}26'$ 至 $44^{\circ}5'$ ，东经 125° 至 $125^{\circ}34'$ 之间。长春地方设治于1800年（清嘉庆五年）^①。长春一词作为今日所指地域的专有名词，始见于1806年（清嘉庆十一年）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之中^②。

1931年9月19日，日军侵占长春，设长春市政府。1932年3月1日，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定国都于长春，改长春为新京，政长春市政府为新京市政公署。从此长春成为日本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设于长春。日本为掠夺我东北的资源以及对苏联的战略需要，在东北广修铁路。于是，长春不仅有中东铁路（沈哈线）纵贯南北，又有长白线、长图线横穿西东，成为东北腹地的铁路交通枢纽。

长春地处北清平原东南部的丘陵地带。东傍伊通河，西面、南面起伏着富峰山和石碑岭。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沃野。物产丰富，素有“粮仓”之名。

从多方面来看，长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初期，我军尚处劣势。我党中央、毛主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英明战略方针，我军主动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遂踞长春为东北战场腹地的战略要点，增修工事，扼以重兵。

到了1948年春，已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三个年头。整个战争形势从开始的敌优我劣，彻底改变成我优敌劣。

我东北解放区的军民，在东北局提出的1948年解放全东北的号召下，热火朝天地战斗着、工作着，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与我们相反，蒋介石的政权更加孤立了。由于内战的负担加剧，经济上困难重重，江河日下，接近崩溃。军队士气低落，作战能力不断下降，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重点防御的境地。长江以北，只剩下沈阳、北平、徐州、西安、武汉等五个战略防御区，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企图直接从苏联红军手里接收东北的美梦未能实现。于是，借助美帝的军舰和飞机向东北调运大军，把内战烽火，引向遭受14年日寇铁蹄践踏之苦的东北。攻占了我松花江以南解放区的大部地区。我东北解放区的军民，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将近两年的浴血奋战，到1948年初，我军野战部队已拥有70万人，地方武装30万人。控制了整个东北土地面积的97%，解放区人口占全东北人口总撤的86%。我军力量远远超过了东北国民党的实力。

面对着东北的局面，蒋介石在短短的两年期间，曾三易东

北战场的主帅。先是派熊式辉任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保安司令长官。继而，又于1947年8月，派遣总参谋长陈诚来东北。蒋介石第三次换马，选中的年逾花甲的卫立煌，是在1948年1月22日我军冬季攻势的隆隆炮声中，走马上任的。

卫立煌到任后，怕我军围城打援，任凭那些遭我攻击的据点一再告急，他也稳如泰山按兵不动。于是，1月26日我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师于新立屯，同时切断了北宁线；2月6日，我歼敌第五十六师于辽阳；2月19日，我歼敌新编第六十二师于法库，同日又歼敌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于鞍山。连同12月25日在公主屯歼敌新编第五军，我冬季攻势共歼敌15万之众。3月13日四平解放，我军宣告冬季攻势结束。至此，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所占有的地盘，只剩下吉、长，沈、抚、本，锦、葫等三个孤立地区了。失城诸多，损兵甚众——卫立煌想改变东北局势未成，反而重重地挨了当头一棒。

早在1947年10月，我中央军委、毛主席即电令林彪，东北主力应转向北宁线作战，并将冀东、热河地区的作战指挥，则归东北军区。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更明确地电令林彪：“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这是我中央军委、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部署。

然而，蒋介石也并非没有军事战略眼光，他对东北战局的不妙也颇有预感，也在考虑倘有不测，即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入关内这着棋。因而，他也生怕我切断北宁线的退路，对东北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因此，他主张放弃吉林、长春，以少数兵力守沈阳，集中主力控制锦、葫地区及北

宁路，在辽西与我决战。

这就是说，我敌双方的战略企图，一方要封闭敌军于东北境内全歼，一方要夺路逃走，斗争的焦点，是控制北宁路。

但是，卫立煌的主张与蒋介石并不合拍。一方面他出于维护东北“剿总”这块招牌，不愿放弃吉林、长春，收拢部队于沈阳或辽西。照此办理，东北“剿总”岂不只剩辽西一隅？另一方面，他主张集重兵于沈阳及辽南地区，守则可以集中兵力，退则可以从营口的海上撤走。他的这一预案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为了避免蒋介石收拢吉林、长春部队于辽西，卫立煌曾遣多人往返于沈阳、北平、南京之间进行斡旋。并设法取得部下将领们以及美国顾问团团长沙大维的支持，以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蒋介石同意了卫立煌不放弃长春的主张。因此，他决定将吉林的第六十军收拢于长春，与新编第七军共同固守。在此问题上，蒋卫间虽是同床异梦，但却得到了妥协。

8月间，在长春守敌被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卫立煌判断，我军可能10月攻打锦州，围困沈阳。他既想不放弃沈阳，又不愿沈阳成为长春第二。他要改变防御上的战略思想，使部队轻装做运动战、游击战的准备。对于长春，则企图牵制我兵力，能否突围，尚待考虑。

蒋介石鉴于东北与华北的战略关系，也考虑到卫立煌同他貌合神离，又成立了另一个军事指挥机构——冀热辽边区指挥所，并亲派在徐州方面负有重任的杜聿明来担任指挥，这就更加激化了蒋卫间的矛盾。卫立煌清楚地意识到，蒋在以杜取代他的部分指挥权。事实明摆着：长春守将郑洞国，是杜聿明的至亲好

友；而廖耀湘、范汉杰等人，实际上是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种局面，几乎从卫来到东北以后，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可以说，他们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对于长春，此时的卫立煌，已认定那是一着死棋了。他不抱任何希望，守则维持一天算一天，撤则谈何容易？总之，他觉得长春是个包袱。对长春守将郑洞国的处境，唯有叹息，表示束手无策。例如，彭杰如被任命一兵团副司令官，他却不主张彭去长就职，说“那是一个死地，失掉只是迟早问题，你不必去长春，还是留在总部，大家集中经营沈阳。”郑洞国再三电请增加飞机空投粮食，卫立煌则强调沈阳粮食储备也较空虚，空运能力有限，并未采取积极措施。只是每当接到郑洞国的告急电报时即仰天长叹：“我负了桂庭，我这中间人难作啊！”

10月中旬，蒋介石曾写信给卫立煌，要他设法援救郑洞国撤出长春。卫立煌接信后啼笑皆非，忿然不平地说：“大部队由长春向南撤退，要通过五六百里的共区，事先毫无妥善计划，仅靠一纸命令，叫跑便跑，真是开玩笑！”⑧

卫立煌没能改变东北的战局，他的历史使命也只能是作蒋介石政权在东北最后垮台的替罪羊。

至于长春，在整个东北战场上，它的确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第一大战役——辽沈战役中，围困长春作战，却是该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围困长春的胜利，对促进辽沈战役的迅速全胜，起了重要作用。

①②参考《长春市文物志》。

③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3—54页。

六十军弃吉就长前后

国民党第六十军仓卒奉命由吉林撤到长春，那情形，也是够狼狈的。

1948年3月7日凌晨，驻守吉林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突然接到东北“剿总”紧急密电称：“剿总”副司令郑洞国有紧急要公于当日8时乘专机到达吉林。当天上午，一架军用飞机降于吉林机场。随同郑洞国同机到达的，还有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到达后，立即向曾泽生下达蒋介石的亲笔手谕，大意是：

——为了缩短防线，集聚兵力回守战略要地，待机反攻，着令该军长率领第六十军全军及吉林省政府所属党政军警机关全体人员和地方警宪等武装，全部于本日（3月7日）向长春紧急撤退，

——撤退前不能带走的军火、军事装备、给养、辎重等

物，全部就地销毁，以免资敌；

——撤退前必须彻底炸毁小丰满堤坝和发电机的全部设备；

——沿吉长铁路、吉长公路线内侧之间地带，取道放牛沟向长春撤退；

——限于3月7日夜間立即开始行动，要迅速、保密；

——已令长春新编第七军派出得力部队，到放牛沟占领山岳地带接应。①

郑洞国下达完蒋介石的手令和“剿总”命令后，略事说明一些问题和做了必要的补充指示，当即同赵家驊飞离吉林回沈复命。这两位来去匆匆的空中客，顿时搅乱了吉林市军警宪特们纸醉金迷的生活。

曾泽生立即召集各师长开紧急军事会议，（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率部在外由副师长任孝宗参加）。会议传达了蒋介石的撤退命令，研究讨论了撤退计划。一面命与会人员回去迅速秘密地做一切行动准备；一面退知前往江蜜蜂、乌拉街“移兵就食”和征集粮食的暂编第二十一师迅速撤回。可是，当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把他的部队和运粮大车带回吉林时，已经是快半夜了。原计划当夜10点开始行动，不得不改为午夜12点出发。原定第一八二师为前卫，暂编第二十一师为本队，暂编第五十二师为后卫的撤退序列，也不得不作调整。又因为全军的马车几乎全部调归暂编第二十一师前往运粮，也影响了军、师撤退时对军备和辎重的装运。

在如何通知地方政府的问题上，曾泽生委实作难了；他深知地方机关情况的复杂，如通知过早，势必走漏消息，对部队

撤退行动极为不利，通知过晚，又恐地方政府指责他“怀有私心，临危不能患难相顾”。考虑再三，他才决定在部队开始行动前两小时，通知吉林省政府、军管区等机关随同部队后卫有秩序地跟进。但是，地方机关接到通知后，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象一群炸了窝的蚂蜂，东奔西跑，孩子哭、婆娘叫，各自抢先逃窜。

曾泽生最后下达撤退命令的时间，是在3月7日将近午夜时分。他的指示要点是：第一，撤退的行军序列，分三路纵队，右路为暂编第五十二师，沿吉长铁路；左路为吉林保安旅、地方政府、警察，由保安旅旅长何大刚指挥，沿吉长公路；中路为第一八二师、军直、暂编第二十一师为后卫，沿吉长铁路和吉长公路之间，向长春推进。第二，为了轻装前进，尽可能少带不必要的公物和私人财物。第三，轻重武器全部带走，炮弹、步机枪弹及其它武器弹药和装备尽量设法多带，无法带走的，就地收藏起来。第四，给养必须带足五日份。第五，小丰满守军紧急撤回，凡不能带走的任何物品均不得销毁。第六，严防泄漏机密，准备工作和行动要在迅速、保密、有条不紊的情况下进行。

国民党第六十军终于离开吉林，按行动计划上路了，但是这样的撤退太仓卒了，几万人的队伍，从受命到行动只有十几个小时的组织准备时间。这样仓卒的撤退，加上由地方军警、政教、绅商等各界组成的五光十色的庞大集体，那种你拥我挤、女哭男叫的嘈杂纷乱局面，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的。

曾泽生在执行蒋介石的撤退命令中，对以下两点没有执行：一是将不能带走的装备，辎重全部销毁；二是要彻底炸毁

小丰满的堤坝和全部发电设备。当然在保护小丰满发电设备问题上，我军早已通过电台和报刊对小丰满守军提出了警告，我敌工部门还通过地工人员将警告传单辗转送到吉林守军将领们手里。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又以前线指挥部的名义通牒小丰满守军第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团长胡彦，应“凛然拒绝乱命，尽力保护水闸，制止一切特务分子实行放水的阴谋”，“否则应对此种罪行负责”。我东北总部发言人于1947年11月10日警告中指出：“倘使蒋匪竟敢以此举世闻名的电站作其残酷的殉葬品，对其加以丝毫破坏，我军纵使追至天涯海角，誓必将下令指使及直接毁闸之战犯匪首，逮交人民法庭，严厉惩办，决不宽贷。”我军严正的立场，严厉的警告，以及第六十军将领、电站守备部队指挥员慑于我军的威力和他们自己的明智，使这一举世闻名的60万千瓦的发电设备，终于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曾泽生在布置撤离吉林的行动时，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下级军官自然也心领神命。报当时的六十军参谋处作战科长何贤说：“当时‘剿总’部署撤退的命令，有炸毁电厂、销毁带不走的武器装备等内容。曾军长部署撤退后，我准备起草作战命令。就用电话请示曾军长，关于破坏的事怎么写。曾军长只是支唔，不加可否。当我再次请示是写还是不写时，曾军长不耐烦地说：‘以后再说吧！’就把电话撂了。当时已经开始撤退，哪还有什么‘以后’了。因为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写上吧，曾军长没让写；不写吧，上级又有命令——‘剿总’命令就在我的皮包里。所以，我干脆连作战命令也未起草，曾军长也未追问。”②

3月7日夜晚，曾泽生曾在电话中暗示驻小丰满的五四四团团长胡彦，我们决不能做黄河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接着，

军参谋长徐树民又在电话上严命胡彦必须执行“剿总”命令，把电站炸毁。两种不同的态度，两个截然不同的命令。且看守军是如何执行的，胡彦与副团长黄宗尧商定，表两上造成准备爆破电站的气氛，速令部队撤退。暗地里留下团属侦察排，待部队全部撤离小丰满后，用集束手榴弹把团弹药库和电站非要害部位引爆，造成破坏电站的假象而敷衍塞责。

但对此事“上峰”并不是没有追究，第六十军到达长春不久，蒋介石派来长春的蒋级特使方某，来到军部就怒气冲冲地问：“曾军长为什么在吉林撤退时，不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

曾回击说：“笑话，我不执行命令六十军怎么会到长春！”

方气愤地说：“我不是问这个。蒋委员长手令指示，要你彻底破坏小丰满发电厂设备和炸毁堤坝，销毁不能携带的武器弹药、装备辎重和粮食，为何不执行？”

曾也愤然地说：“我正是遵照委员长的指示才这样做的！请问方代表，紧急撤退是不是最关紧要的军事行动？委员长的手令不是要我军迅速、秘密、安全、全部（包括地方的军警政教）人员撤离吉林到长春吗？”

方答：“当然是这样。”

曾又义正辞严地问：“既然如此，要达到迅速而又秘密，是否要严守机密、不走撤一点风声？如果我们销毁武器弹药，引起爆炸，岂不是等于向共军通风报信、自我泄漏企图和机密？所以，我认为没有那样做正是遵照‘行动迅速、保密、不得有任何泄漏’的指示而执行的。”

方说：“吉林有松花江，难道不可以把它丢到大江里

吗？”

曾说：“说得这样轻巧！那不是丢一根针，摔一个小石头，那是大炮，是炮弹，是弹药！是成千上万袋的给养！要人搬，要车拉。老百姓瞧见，还有不起疑，不知道的吗？”

方又说：“白天不行，夜间总可以秘密进行嘛。”

曾说：“夜里固然不同于白天，但这些东西都在市区内，在老百姓还未入睡时，人来人往何以保密？太晚了，夜深人静，我是忙一头紧急撤退呢，还是顾两头忙于销毁带不走的那些东西？手令指示，限我军于3月7日夜間立即开始行动。时间如此紧迫，手令如此严格，我无法顾两头！我这样做，不也是遵令而行吗！”

方某无言以对了。他只好改变话题，“那么，小丰满离吉林市较远，无论白天夜间都可以着手破坏，曾军长为何不执行？”

曾泽生不悦地问：“方代表，你到过小丰满没有？”

方某默不做声，意思是说没有到过。

曾不禁愤然地说：“小丰满坝高百做十米，坚固异常。发电机在水下数十米，就更不能轻易破坏了。如过早爆炸，急流从天倾泻，恐怕不等我军撤退，吉林市就要成为大水淹没的泽国，老百姓和军队都要被水淹死，我们还能撤到长春吗？如时间过晚，水坝这么厚，可不是一扇窗户纸，一捅就破，一道土堤堰，一挖就垮的。水下的机器设备，四周也都是钢筋水泥构筑，不是一踢就碎的，岂是很快能爆破的。并且，委员长的命令不是要我们彻底破坏吗，要彻底炸毁堤坝和发电设备，试问要多少黄色炸药？”

方某直着眼睛不答。

“几斤几十斤能行吗？如以几吨黄色炸药去炸，虽远离市区但只几十里，市民还有听不到的？还能不惊动四周的共军？同时，我军除有少数余存的地雷外，长官部和‘剿总’有过几十、几百斤烈性炸药给过我军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得追究上级和那些不明事理的糊涂虫！”

曾泽生将军真可谓唇枪舌剑，一番有理有据的话，把一个盛气而来的“钦差大臣”问得瞠目结舌，灰溜溜地回去了。③

当国民党第六十军撤出吉林时，我军活动在吉长地区的部队，只有吉林军区（东满军区）的独立第六师，独立第八师，松江军区的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九师等4个独立师。其中独立第八师1月份在牡丹江组建，2月初开过全师誓师大会师开赴吉林外围。独立九师也是开赴前线不久。另两个独立师虽已在吉长地区同敌人周旋了一个时期，但并没有进行过较为激烈的战斗。本来，从国民党的整个战略目的来说，它在吉林地区的部队，旨在牵制我军的一部分兵力；然而恰恰相反，事实上倒是我军只用了几个独立师，回旋于吉林地区，对敌人起了牵制和监视的作用，而我主力部队却早已活跃在冬季攻势的战场上去了。

与此同时，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正在哈尔滨参加东北局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支援前线，组建二线兵团，准备接管大城市以及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并提出了1948年要解放全东北。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提出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问题。

国民党第六十军所以能够较完整地由吉林撤退到长春，其

原因，一是把握住了时机，二是行动突然。在时机上，六十军撤退时正是我军冬季攻势接近尾声、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而暂时未能顾及吉长的时候，他们钻了这个空子；在行动上，六十军做得既保密又突然，事先竟未流露任何迹象。这正是他们行动成功的一面。但是，敌人在时机的选择上也确有失策的地方，那就只好归咎于蒋介石、卫立煌之间矛盾的僵持，延迟了对吉长的决策时间了。可以设想，假如国民党第六十军再提前一段时间放弃吉林，那时我军正集中力量于冬季攻势各战场上，吉长之间有可能畅通无阻，说不定他们可以长驱直入地到达长春。而我军，从全局看，正集中精力，考虑1948年重大问题的决策；从战局看，正集中兵力于冬季攻势中；对吉林之敌认为横竖在歼之例，只是时间迟早问题。但对于六十军有可能从吉林逃跑，也并非没有充分估计。这从当时4个独立师的配置位置也可以看出个迹象：独立第八师在桦皮厂附近，独立第六师在太平沟一带，独立第七师与独立第九师在波泥河子南、北地区——就是说，4个师都摆在吉长公路、铁路的交通要道附近。有的领导曾向有的部队打过招呼，“要防止吉林敌人向长春逃窜”。但是，两个军区的指挥所并未及开设，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各独立师尚未做出阻击撤退敌人的作战行动预案；当然，更谈不到预定部队展开地段及组织协同。当发现敌人行动在公路上了，情况尚且不明，部队不了师上级的意图，指挥员的决心一时难以下定。然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多年培养锻炼出来的领导干部，是善于依据具体情况、灵活地捕捉战机作战的。我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九师在情泥河子阻击了国民党第六十军的中路纵队的先头部队；独立第六师在太平沟切断和

阻击了该军主力的一部；独立第八师在小官地一带切断了撤退敌人的一股。这些各自为战的作战行动，使撤退的国民党第六十军走了一路，挨了一路打，异常狼狈地窜到长春。曾经是独立第七师师长的罗华生同志，回忆当年情形时风趣地说：“我们是独立师，独立作战。”

还有一种说法，也似近情理。六十军内部存在着我党的地下组织。这些无名英雄在危如累卵的情况下长期潜在敌人内层，一面通过一些有爱国思想的志士做争取该军弃暗投明的工作；一面及时地为我军提供可靠的情报。可是，这一次第六十军撤出吉林之前，由于行动异常仓卒，这些同志竟没有来得及有所反映，所以，我们未能得到任何来自敌内部的情报。

1947年冬到1948年春，吉林地区的雪特别大，平地雪深过膝，有的地方积雪一、两米。初春的暖流使坚实冻土上面的积雪有些融化，踏上去松软滑腻，很难拔出脚来。这对六十军撤退来说，110多公里的路程，起步就是艰难的。在积雪的覆盖下，公路、水沟难以辨认，加之有些地段的公路早已被我军民破毁，所以行进非常困难。尤其是军民携家带着，抢道而行，拥挤迟滞，更加影响了大部队的行动。最艰难的，是那些取重车和重载牵引车辆，引擎轰鸣，转速剧增，那车轮却干转面前进不得。一些军队和地方的汽车，离开吉林10余里，就滑到路旁沟里或掉进公路旁洼地里。就连新七军拨配的4门一〇五毫米榴弹炮，也由于拖炮的十轮卡车在厚雪中无法行进，刚过桦皮厂不远，即连车带炮弃之于路旁，成了我独立第八师的缴获品。此后，几乎是全部汽车被弃在路旁、沟里。骡马车开始时还可以勉强维持着艰难的行动，先是逐步弃掉那些不十分重要

的行李和辎重。后来人困马乏，步履艰难，空车也动弹不得，只能舍掉全部辎重，弃车保马。士兵中，有的由于行动异常吃力，疲惫不堪，扔掉了身上的一些弹药；有的掉了队，黑夜间迷失了行进方向而成了“散兵游勇”。撤退的第一天，就已经沿路尽弃了汽车、马车和零零散散地抛弃了携带的弹药。有的军官个人财物，虽然好不容易带出吉林，又不得不弃之于路旁。财政厅长一轿车钞票，也弃在路旁任士兵抢光。

六十军撤出吉林的第一次碰壁，是在小官地遇到了我独立第八师的截击。由于事先情况不明，我只切断其一部的后尾，缴获了数量可观的辎重和物资。战斗规模虽不大，却是撤退之敌离开吉林的首次受挫，对敌军士气影响颇大，人人惶恐不安，忧虑前途凶多吉少。被俘的300余人中，有一些军队的眷属大多是妇女和孩子，这些人经我们宣传教育后，送入长春让她们与亲人团聚，对瓦解敌军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后话。

9日拂晓前，六十军主力接近太平沟岭时，遭我独立第六师的部队迎头阻击。独立第六师是个较老的部队，长期活动于吉林附近，同敌第六十军有过一些接触。当时，该师占领了公路以北的连绵丘陵地带，但在冰天雪地中却不能构筑工事，只好发现敌人即就地展开阻击。敌担任前卫的第一八二师与我独立第六师战斗激烈，我独立第六师沿连绵的丘陵地带逐次阻击。当发现敌第六十军以暂编第二十一师的部队向我翼侧迂回时，该师才让开一个口子，第六十军遂通过太平沟。10日凌晨，在太平沟附近的磨刀石，敌负责运输军部和直属队辎重装备的运输团团长潘尧，由于车辆物资弃尽，脱离本队太远，且又钻进了我独立第六师磨刀石的阵地，无奈率排长2人和士兵

7人携武器向我投诚。该团官兵全部被俘，剩余车马，也全部“输送”给我军了。太平沟一战，我独立第六师歼敌近2000人。其中有些敌人是枪响后不战自乱，到处奔跑，甚至已通过口子后还不知所措，懵懵懂懂成了我军的俘虏。战后打扫战场时，还发现一具少校军官尸体，从现场情况分析，显系自杀身亡。身上带有少校政工处长证明，姓名今已无从查考。当天，六十军右翼，又遭到我独立第六师的小规模阻击。迫使敌之右翼纵队不得不向中路纵队靠拢，一度造成行军序列混乱，经调整后方得以恢复，但行军秩序已大不如前。

六十军接近波泥河子时，发现山上有部队活动，以为是新编第七军来接应他们。因为波泥河子距放牛沟不足20公里，郑洞国在布置撤退任务时，曾规定新编第七军从放牛沟方向接应。当他们放心大胆地接近到步兵武器有效射程时，我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九师的部队立即开火。这两个师也是较老的部队，虽隶属松江军区，但却经常配合我主力部队作战。此次阻击，独立第七师位于波泥河子北侧，独立第九师在南侧。六十军不敢停留时间过长，曾泽生亲赴前线督战，目的是集中力量打开一个缺口，使部队通过。而我们的两个独立师，也恐敌新编第七军赶到腹背受敌，不能战斗时间过长。因而，双方均未恋战。此次战斗，我独七、九两个师共歼敌约600余人。我独立第七师牺牲团长1名。

六十军夺路通过波泥河子山岳地带，接近放牛沟时，已是3月10日早晨了。又前进10余里，才见新编第七军副军长史说带领的两个团姗姗到来。曾泽生气愤地质问史说，为何不按蒋的指令先期到达放牛沟山岳地带占领险要阵地接应？史说反而

责怪第六十军撤退行动迟缓，没有遵照蒋的指令如期到达放牛沟会师。互相埋怨一番而已。六十军所属部队于3月10日先后到达长春市郊。新编第七军借口驻区尚未调整好，要第六十军暂在郊外露营。几经交涉，才允许他们进入旧市区二道河子。新编第七军还以“库存有限，一时难以兼顾”为托辞，要第六十军自想办法，临时就地购买粮食。直到3月13日以后，第六十军全体官兵才按指定驻区进驻就绪。④

国民党第六十军由吉林窜入长春了。吉林是一座朝不保夕的孤城，退守长春也同样摆脱不了坐以待毙的命运。长沈之间早被我军切断，尤其是3月13日四平宣告解放后，长春这座忧患的孤城，对第六十军来说，只能给他们带来比守吉林更加险恶的命运。至于我军，如果在这次敌第六十军由吉林撤退中，事先能够了解情况，进行周密的组织指挥，各部队能受领明确的战斗任务，互相间有密切地作战协同，即使参战部队只有4个独立师，也能够预先占领有利阵地，以逸待劳地进行阻击，很有可能把仓惶逃窜、人困马乏的敌人打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即使不能全歼，也能歼其大部。

我阻击敌第六十军由吉林撤退之战，共歼敌4 139名（不包括家属、孩子及逃亡地主443名），其中毙伤敌人899名，俘敌3 240名。缴获各种炮44门，掷弹筒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49挺，各种长短枪938支，子弹25万发，炮弹400发，手榴弹1 047枚。汽车4辆（不含敌毁坏的50余辆），大车100辆。电台10部，电话总机20部，电话单机57部，电话线250公里。骡马228匹。蒋币7 000万元。上述数字统计不够完全，而且不包括吉林市内六十军未能带走的物资数字。

六十军从吉林退到长春，在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看来，可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安全撤退。蒋介石说：“吉林市撤退，是最成功的一次战略撤退。”英国路透社评论六十军这一行动是“陆上的敦刻尔克”。诚然，在国共两军的交战史上，国民党军队有过几次如此成功的撤退呢？围城打援，在运动中打死灭战，历来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作战手段。弃城逃窜，的确意味着很难摆脱中途被我全歼的结局，一向如此。

总之，第六十军的吉林撤退，尽管辎重物资损失颇多，部队士气受挫很大，但毕竟是安全撤到了长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一着，被执行了，而且实现了。长春孤城守敌新编第七军，从此又增添了“风雨同舟”的新伙伴。

① 参考《吉林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140—143页。

② 参考《吉林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238页。

③ 参考《吉林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148—150页。

④ 参考《吉林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144—145页。

敌军十万守孤城

长春历来是战略要地。又曾经是伪满首都。日军占领东北时把长春市面积扩展到 200 余平方公里，并在市内构筑了许多极为坚固的永久性建筑物。如关东军司令部，满洲中央银行、在乡军人会等等，均为钢筋水泥建筑。满洲中央银行大楼的全部外墙是 1 米厚的花岗岩砌成，十分坚固。城市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大兴公司等建筑，雄踞十字路口的四角，构成在军事上能相互支援的巨大堡垒。伪国务院和八大部，也都是高大坚固的永久性建筑。同时，还设有地下相连接的钢筋水泥坑道和地下室、防弹闸门等等，形成各重点建筑之间的地下交通网路。总之，市内一些重点建筑，不但坚固，而且有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形成了地上地下均可互为支援、且又较为完整的防御作战的工事体系。此外，还在城市的各要点处筑有碉堡、坑道、交通壕、瞭望台等军事设施。这就是说，长春这

座新兴的城市，在被日本定为伪满首都时，就深谋远虑地进行了统筹规划，整个布局为战时需要奠定了基础。同东北其它大城市比较，在军事设防条件上，有它得天独厚的一面。

日寇占领东北期间，长春市的人口为70余万，其中有日本人21.5万，中国人余50万。

1945年8月，我八路军冀热辽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我抗日联军同苏军一起进驻长春，担任市内卫戍工作。周保中同志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后，即决定以吉林、长春两市为中心，包括吉林、合江两省及松江省之珠河以东地区，建立吉合区党委与吉合军区，由周保中同志任区党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时，我在长春的部队，有东北人民自卫军吉长独立团，九台独立团，怀德警备团等等。10月，东北挺进纵队（即东北人民自治军）到达吉长地区。11月初，按东北局决定建立了吉林省工委和吉林军区。周保中任军区司令员，张启龙兼政委，万毅、贺庆积任副司令员，伍晋南任副政委。军区所辖部队近4万人。

1945年11月中旬，蒋介石乘苏军撤退之际，将收编的原伪满军“冀东讨伐队”姜鹏飞部（即铁石部队），空运长春，据守该城。我吉林省军区部队遂放弃长春、吉林两市。1946年3月，东北国民党军侵占沈阳后，杜聿明指挥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一军及第七十一军沿中长路北犯时，我东北民主联军吉林军区部队于4月14日全歼长春守敌伪军1.6万余人（其中包括日军200余人），第一次解放长春，是谓“4·14”事件。接着，杜聿明率部“北进”，于5月4日开始进攻我四平。我军为顾

及当时战略需要，于5月24日主动撤出长春。该城遂为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所占领。

国民党军占据长春后，为使长春成为它在东北的战略要点，在原基础上大肆构筑工事。增修永久性、半永久性的明碉暗堡150余个，形成了要塞式的防御体系。国民党中央社曾说：“长春城防，曾经聘请专家数十名精心设计，搜集世界各国防御工事的资料，动员技工数十万人，使用水泥6万袋，钢材1500吨，历时一年零一个月，才构筑成了坚冠全国的永久性工事。”^①由此可见，国民党是何等地重视长春。他们所以在长春舍得花费这么多的力量修筑工事，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困守，更主要的是以长春为基地，向我东、西、北满进攻。

号称十万之众的长春国民党守军，其主力为新编第七军。这支主力的来由和编成情况是这样的：

1947年8月，陈诚到达东北，撤销了原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部。原保安司令部下属的各保安区、保安支队等均编入各正规军部队。并在扩大部队的基础上，增编了部队番号。1947年冬，新编第一军开赴沈阳时，留下新编第三十八师与十一保安区改编的暂编第五十六师，保安十二支队改编的暂编第六十一师，合编为新编第七军。由原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任军长。以新编第一军部分留守人员及原长春警备司令部的一部分人员编为军直属队，守备长春。其下辖各师情况：

新编第三十八师原为1938年成立的财政部湖南税警总团。这个团的人数多达差不多够一个师，由孙立人任团长。1941年，编入第六十六军改称新编第三十八师。同年入缅对日作战，由于损失惨重，当年调入印度整补，并优先更换了美式

武器装备。1943年，改隶新编第一军指挥，当时新编第一军的军长是郑洞国。1944年，孙立人任新编第一军军长，该军又再度入缅作战。1945年空运云南。日寇投降后接防广州市。1946年3月调来东北，在秦皇岛登陆后即参加了四平作战，曾在兴隆堡被我歼其一一三团一个营。四平战斗结束后，该师调鞍山、海城，当年12月，又调往九台。1947年1月7日，在其塔木、张麻子沟被我歼其一一二团1个营和另两个营的一部。当年5月，我又歼灭该团大部于老爷岭。以后，该师即调入长春市。在守备长春之敌的6个师中，该师可谓遭我打击最小、战斗力最强者。该师兵员和装备也属长春守敌中的第一流。它虽小受损失，经将自己保留的在印缅作战时多余的武器补充后，仍能保持原来的水平。每步兵班配有1挺轻机枪，正副班长配冲锋枪。每排有一个配备两门六〇炮的炮班。营机枪连有重机枪8挺，营火箭排有小火箭4门。团迫击炮连有八一迫击炮12门，战防炮连有三七战防炮8门。还有一个师属七五山炮营。人员经补充后达1.1万余人。马200余匹，各种汽车300余辆。新编第三十八师在长春守敌中是佼佼者，其它各师是无法相比的。

暂编第五十六师，原为伪满洲国军派出的“冀东讨伐队”，原称铁石部队。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改编为东北保安第二纵队。1945年11月空运长春。1946年4月14日，我军解放长春时被我全歼。后来，该部首脑刘德溥又收罗其残兵败将及一些土匪，又于1946年夏，被国民党东北行营改编为第十二保安区。下辖四一、四二、四三、四四等4个团，其中四三团在沐石河子被我全歼。其余3个团于1947年9月改编为暂编第五

十六师。同年秋季，在范家屯一带又被我歼灭1个团。11月编入新编第七军。1948年4月在机场被我歼灭近1个团；5月24日我第六纵队与独立第十师在长春外围大房身机场作战中又歼其两个团的大部。从4月起，该师奉命改为甲种师编制：配以原新编第一军留长春之武器，补充兵员，加强人事，调换干部。但该师由于屡遭我歼灭性打击，士气极为低落，许多士兵希望我速打长春以便缴枪回家。师长刘德溥不为上峰所信任更换为张炳言。全师原为7 000余人，后剩残部两三千人，只好改为师属两团制。因此，该师虽在新编第七军的建制内，但其地位却是低下的。

暂编第六十一师，是在1947年冬以保安第三支队（原为保十二支队）及嫩江保安队改编而成。其成份大部为土匪、伪军及铁路警察。军官均换为南方人，营连干部多为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师所派，并有一部分南方老兵，东北兵员占80%。全师7 000余人，战斗力较强于暂编第五十六师。1948年5月长春外围作战中，该师一团被我歼灭5个连，二团被我歼灭7个连，共被歼12个连。

预备师（即补充师），是在1948年5月初由吉林师管区志愿兵之第一、二、三团组成。其成份很杂，全师7 000余人，逃亡地主和地痞流氓约占50%，生活无着之青壮年占25%，其余则为被抓的壮丁。武器装备到八成，很杂乱，美式、日式、捷克式都有，每连只有四五挺轻机枪。守城后期补入各师。

青年教导团是在1947年秋由驻抚顺的二〇七师派来长春的一批干部，招募知识青年所组成。1948年春，又强迫松北联中学生千余人补入，共约2 500人。其成分青年学生占70%，因生活

无着而参加者占30%。士气低落，逃亡者甚多。

自1948年3月11日起，国民党第六十军弃吉抵长。长春守敌的守备任务由1个军增为两个军，守城兵力几乎增加了1倍。

国民党第六十军所辖3个师，兵员不足额。该军装备尚可：连有轻机枪9挺，小炮3门，冲锋枪10支。军官大多数是云南人，因损失惨重，云南老兵均被提拔为下级干部，这些人，忠实于龙云、卢汉，不肯轻易放下武器。部队野战攻坚能力虽不甚强，但在阵地防守的顽抗程度以及工事构筑、火力组织的经验等方面，尚不容忽视。该军下属各师情况：

第一八二师，为第六十军的主力。该师南方人多，到达长春后，补北方人约30%。全师约10 000人，战斗力较强。

暂编第二十一师，全师约9 000人。战斗力较强，以往遭我打击较多。

暂编第五十二师，为乙种师编制。吉林铁路警务处之铁路警察编为第二、三两个团后，除由第一团调拨一部分轻重机枪、六〇炮外，其余武器仍是原铁路警察之步枪。因而该师重火器甚少。全师约6 000余人，战斗力最弱。

预备师，由吉林师管区志愿兵之第四、五、六等3个团组成。共约7 000人，其成份与新编第七军之预备师相同，武器装备不足半数。后期也补充到各师。

第六十军直属队，尚有输送团、山炮营、工兵营、通信营、特务营、汽车连等共约4 000余人。

长春守敌除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两个正规军外，还有一些来由复杂的地方部队。这些部队是：

——吉林保安司令部。梁华盛走后，由郑洞国兼司令，李

寓春为副司令。下辖两个保安旅及一个独立团。保安一旅，下辖3个团，旅长何大刚。其第一团是伪满警察及部分土匪组成，为该旅历史最久、战斗力最强者。装备多为伪满残留。二团是由磐石、桦甸之保安队组成，战斗力与装备都不及一团。三团于吉林撤退时刚刚成立，当时尚未编好。保安二旅成立不久，旅长何恃气。该旅是由收编九台保安队、警察、地主武装与地方团队等组成。独立团，团长张贯三，原是流窜于吉东一带之土匪“平推队”所组成。曾一度编为蛟河保安团。以上共约8 000余人。

——骑兵第一旅，成份更加复杂。其前身是收编长春市郊的土匪。如“老三点”、“松北”、“红驹好”、“久合君”、“交的宽”、“大龙”、“老太太”等以及逃亡之德惠、农安、扶余、九台等县区的保安团队凑编起来的骑兵团。因无经费，虽经收编，仍旧大部分散于市郊，靠抢掠过日子。我军逐渐包围长春，这些土匪兵在郊区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缩回城里找饭吃。因而，曾一度移交吉林省政府，改名为骑兵第一、二支队（也称长白部队）。尔后，归长春守敌第一兵团司令部，政称骑兵第一、二团。第六十军自吉林弃城抵长后，骑兵二团抽调5个连编为第六十军骑兵团。此后，又将骑兵第一、二团编为骑兵第一旅。共约3 000人左右。

——骑兵第二旅，原为长春守敌联勤十六兵站支部挽马大队、监护连以及招收的松北联中学生，并合编了一部分土匪组成。该旅下辖两个团，约2 000余人。但武器装备不齐，又没经过训练，战斗力较差。

——“吉黑人民剿匪总队”，以军统局特务头子袁晓轩为

首领，于1948年4月5日受命成立。其成员主要是收编的土匪。共有1个炮兵队，1个直属队和7个支队，人数可能有四五千人。番号代字按7个支队、直属、炮兵的序列，为：“秉”、“承”、“领”、“袖”、“意”、“旨”、“勇”、“往”、“前”。

——新编第一军留守处，主任范纯士，共约3 000人。5月初，选拔1 500人编成1个团。该团多为老兵，战斗力与装备不低于新编第三十八师任何一个团。缺陷是体质不强，老小不等，也非固定建制，许多人有眷属拖累。危急时可以参战。

——长春警备司令部，李鸿兼司令。下辖宪兵营；吉林警察总队，600余人，500余枪；长春市警察约2 000人，枪600支；长春市人民自卫总队，约800余人，是受军训之商民组成，据说武器与战斗力均优于警察。

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共有6个新兵大队，共约千余人。

这些杂乱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与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合在一起，号称十万之师。在以郑洞国为首的第一兵团部率领下，固守孤城。

1948年3月，六十军撤入长春后，郑洞国又奉命到长春视察。当时，他认为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一个是嫡系的中央军，一个是非嫡系的地方部队，彼此派系不同，必将互相歧视，互不协同，甚至贻误战机。他将此情况汇报给卫立煌后，卫立煌深以为然，立即发报要郑留在长春，筹建第一兵团司令部，任他为兵团司令官，坐镇长春，统帅两军和地方部队，并以吉林省党政大权相托。但是，郑洞国却无论如何也不愿背这个

包袱，执意不肯留在长春，仍旧返回沈阳复命。卫立煌借口郑与曾泽生、李鸿都能合得来，一再劝驾，蒋介石也以手令下达。郑洞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于1948年3月15日重返长春，以东北“剿总”副司令兼职的名义，就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兵回直属队的组成，大多数抽调于新编第七军。

然而，郑洞国坐镇长春，统帅两军，根本弥合不了嫡与庶之间的矛盾。在国民党军的法度里，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关系竟有天壤之别。尽管第六十军的“成功撤退”曾得到蒋介石的赞许和某些外国舆论的吹嘘；但却得不到友军的敬佩和上峰的垂青。第六十军满以为从此能够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撤退”时损失的物资装备能迅速得到补偿，结果却大失所望。新编第七军大骂他们是“花子兵”，“脓包官”。东北“剿总”对第六十军要求的各项补给品，指令新编第七军将新编第一军从长春空运调走时，交他们经管的装备和重型武器、车辆、马匹、弹药、被服等，就近调拨，但新编第七军却把持着全部物资，借口库存不多和已废旧损坏而大打折扣。经几番呈报交涉，才拨给小轿车1辆，吉普车3辆和快要报废的卡车4辆。调拨的其它装备也多半不堪使用。而新编第七军本身则大不相同，连长以上军官都有吉普车，军师长除吉普车外，还有一两辆时髦的轿车。新编第七军的士兵也都着美式服装，歪戴着帽子西式衣，神气十足。两军相比，一个象有钱有势的大豪，一个恰似无钱无势的穷光蛋，相差极为悬殊。第六十军的官兵们，不免自惭形秽，从而芥蒂横生，互相关系愈发紧张。郑洞国为了拢络第六十军，以缓和矛盾，于1948年4月，保荐曾泽生为第一兵团副司令。李鸿对此却极为不满，他不但不把曾泽生当

做上司看待，而且嗤之以鼻：“资望不足，不配当副司令官。”郑洞国为了当好“和事佬”，又保荐李鸿为长春警备司令。从此李鸿更是自视不凡，同曾泽生争雄；两军部队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②

郑洞国于3月15日由沈阳飞抵长春，3月25日在长春励志社大礼堂宣誓就职。宣称，蒋介石赋予他的任务是“固守待援，相机出击”。于是，他对“固守”长春作了如下部署：

以长春纵贯南北的中山路（现斯大林大街）为分界线，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新编第七军守西守备区；第六十军守东守备区。第一兵团部驻伪满中央银行大楼。中山广场划入新编第七军防区，由第一兵团部警卫队直接防守。

西守备区：新编第七军军部位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现吉林省委大楼）；新编第三十八师为机动部队，并担任兴安桥至洪熙街之防务，师部与军部同住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内；暂编第五十六师，除派一个团守大房身机场外，还担任西广场至兴安桥之防务，师部位于中山公园东南角伪国防会馆旧址（现为吉林省电影发行公司）；暂编第六十一师，担任洪熙街（现红旗街）至南岭之防务，师部位于红万字会（现长春市图书馆）；青年教导团，驻于伪满经济部、司法部旧址。

东守备区：第六十军军部位于中山大街北端满铁支社旧址（即站前铁路局大楼），第一八二师，担任东大桥以北至长春西站之防务，师部位于原朝日通宝山百货商店（即现长春市第二百货商店）；暂编第五十二师，担任东大桥至全安桥及二道河子之防务，师部位于东三道街成功银行（现南关区银行南街办事处）；暂编第二十一师，担任全安桥至南岭之防务，师

部位于通化路树勋街（即现电力学校以北之中医院）。

吉林保安第一、二旅及独立团，驻守长春外围宽城子、宋家洼子一带。

长春守敌主要炮兵：重炮为新编第七军之重炮营（欠1个连）共8门，分别配置在中正公园及中山公园内；山炮，包括新编第七军山炮营，第六十军山炮营，新编第三十八师山炮营，共30余门，分别配置在伪皇宫、牡丹公园、西广场女中、民权公园、南岭动物园等处。

长春守敌有装甲火车两列，分属于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两区守备部队，用以阻击或侧击进攻之敌，必要时归兵团统一使用。此外，长敌尚有装甲汽车两辆，属于长春警备司令部。

防御工事，谓之“坚冠全国”，环城工事的层层副防御设施，也曾称之为“固若金汤”。此外，还设有康德面粉厂、印刷厂、净水厂、建国庙、红十字会、绿园等6个外围据点，这些据点，都是深沟高垒，围着层层铁丝网和其它障碍物。城外还有收编的两个（土匪）骑兵团（即骑兵一旅的前身）在到处流窜。如此设防，的确是任何守城国民党军所不能及的。

于是，郑洞国下定了决心。他要坚守到底，他觉得他应该而且必须完成蒋介石赋予他的“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使命。他规划了一个“固守”方案，即：“加固工事，控制机场，稳定内部，搜刮粮食。”誓与孤城共存亡。

郑洞国凭着久经疆场的经验观察局势，对“固守”长春并不那么乐观，但却怀有侥幸心理，因为他当时还没有领略过我军“久因长围”作战手段的威力；尽管如此，这位守城的主将也还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就任此职的。下面，我们且摘引

几段他自己追忆这场经历的文字，看上去倒是他那时内心的确切写照（按原文略有删节）：

放弃吉林时，我主张同时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集中力量扼守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当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蒋介石却认为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敌人，减轻对沈、锦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

我对蒋的这种看法，虽不敢表示异议，内心是不同意的。道理很明显：打了胜仗，不仅长春可以收复，整个东北都可以占有；打了败仗，一切都完了，还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因此，这次要我负责固守长春，我在情绪上是有抵触的。

长春固然危险，难道沈阳、锦州就安全？实际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在危险之中。做为军人还能怕危险吗？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叫谁负责？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支配着我。

我也有所打算，有两个军（新七军、六十军）的主力，加上地方部队，兼以认真做好防御工事，利用时间整训部队，长春是可以守一个时期的。另外，就解放军方面看，用很大力量攻长春是不合算的。不如集中力量先打下沈阳、锦州，长春就成为瓮中之鳖了。所以，我判断，沈阳、锦州可能先长春而

解放。到了那时，长春成了东北唯一孤点，我或者还有可能乘飞机离开，把善后问题交给部下去处理。这样，我不仅对蒋介石可以交代，就对国内外的观感也比较好些，这是最好的前途。

战死或被俘（我当时认为象我这样长期与共产党为敌的高级军官，被俘也凶多吉少）是最坏的前途。最后，如果共产党不杀我，给我做一个老百姓，我认为也是好的。能做一个太平之民，也就满足了。当时我对共产党的许多优点，如到处受到人民拥护，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等，心中很佩服。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是不满意的。但我却这样想：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惟有自己的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③

当时的守城主将就是带着如此的心情，来支撑这座孤城的局面的。难道其它的将领、官佐和士兵们，就不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不言而喻，“坚冠全国”的现代化设防，医治不了国民党军官兵们不战自败的精神崩溃。守城开始，就为他们注定失败的命运敲响了丧钟。

① 参考《吉林市文史资料》第3辑第86页。

② 参考《吉林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146—147页。

③ 摘引《辽沈战役亲历记》郑洞国《困守孤城七个月》一文第298—299页。

第一次外围作战

1948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就要攻打长春了。我党政军民都处于临战前夕的紧张气氛之中。我军奉命参战的部队，更是擦拳摩掌。当时有人猜测，林彪提出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略方针，就要在东北战场进行实验，目标就选中了长春。

1948年5月22日，我东北军区在呈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东北冬季攻势已经结束，部队进行了1个月的政治整训和20天的军事训练。同时，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全军参谋工作会议、炮兵专业会议、后勤工作会议、军事干部会议等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军拟于近日开始向长春进军，预计于5月24日抵长春附近，开始进行长春战役。

与此同时，我东北军区总部已命令准备参加攻打长春的各纵，昼夜兼程向长春附近开进。预计参加打援的部队，也正在

准备向待机位置靠拢。

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达到诱使敌人出城的目的，5月中旬到达长春外围的部队和独立第六、七、八、九、十等师，也在采取频繁的调整部署的方法，往返交错，活动于长春外围。我东北总部，并命令“松前指”（松江军区前线指挥所）、“东前指”（东满军区，亦即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各自组织指挥已到长春外围的部队，一面对长春守敌缩小包围圈，积极地寻求有利时机，更多地发起小型战斗，不断打击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组织部队进行攻坚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同时指出，坚决打击敌人外出抢粮，严密封锁、严格禁止粮食进城。各师除派1个营的兵力伸向敌方外，主力应于距长春市1日行程之内的范围集结整训或进行行军活动，以便一面迷惑敌人，一面可以随时机动兵力。

“松前指”和“东前指”部队活动任务区分之分界线为：波泥河子到小合隆以东、以南，由“东前指”的吉林部队负责；波泥河子至范家屯以北，由“松前指”的松江部队负责。并责令独立第十师进至长春以西，集结于距长春西部边缘约20公里的大岭附近。

自此时起，各独立师的部队，都在不停地进行“调动”。这种“调动”是非常艰苦的，需要不停地行军，而且多半是强行军、夜行军，几乎每日行程都不下百里。长春的5月中旬，气候虽然开始转暖，但毕竟是地处北国，依旧是寒气逼人。尤其是夜间行军，战士们还不能脱掉冬装。长春市郊的河流比较多，除伊通河、双阳河、饮马河、岔路河等主要河流外，几乎到处支流密布，沟岔纵横。战士们越过这些河流障碍，因为很

少有桥，多是涉水而过，冰冷刺骨。奇怪的是那年春季，长春郊区春雨颇多。部队有时冒雨在夜暗中进行，头上冷雨沥沥，脚下路途泥泞，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倒，沾个泥水满身。中途小休息，既不能就地而坐，又无处可放背包，战士们只好原地站着歇脚。棉袄湿透了，却搞不清是由于雨淋还是汗浸所致，从头到脸，汗水与雨水交汇流淌。行进间偶遇障碍停得时间稍长一点，就会感到后背背包沉重，前胸凉若抱冰。部队的频繁“调动”，也给后勤、给养供应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一些后勤工作的同志经过艰辛的努力筹得了粮食，好不容易地运到部队临时驻地，部队却又出发了，只好再去追赶。既或这样，一两顿饭颗粒未进的现象仍时有发生。饭吃不上，行军却不能耽搁，战士身上的负荷量达20公斤以上，还要随时准备战斗。应该说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各独立师部队执行频繁“调动”任务，是十分艰苦的。我们的战士、干部为了消灭长春守敌，解放长春，日夜兼程，奔驰在东北腹地的旷野里，练就了两只铁脚板。那时在部队中板出的政治动员口号是：“走路就是打仗，完成行军任务就是胜利！”

在部队进行紧张调动的同时，我炮兵已经进入了指定位置，远射程炮兵火力已能控制大房身机场，早在3月15日，敌大房身机场就遭到我军炮火袭击，两架运输机被击中彻底焚毁，还有一架被击毁机尾。本来，自我军冬季攻势结束后，长春守敌同沈阳的陆地沟通就已全部被切断，唯一可依赖的空中联系也要遭到断绝，这不能不使敌人胆战心寒。同时，长春守敌也从我军的频繁调动中，予感到我军即将攻打长春。于是郑洞国组织了约两个半师的兵力，同时行动，自长春市向西北和

东南方向“出击”。企图将我军驱到炮火射程之外，确保大房身机场安全，并乘机到城外抢粮。当然，还有别的目的：一是如“出击”顺利，便可改善“固守”长春的条件，在市区外围建起防守的前进阵地；二是可以鼓舞士气，振奋民心；三是5月20日是蒋介石就任总统典礼之日，以“出击”的胜利做为献礼。

5月19日敌人开始出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们自以为得计，准备在西部郊区构筑工事，加强外围设防，以保障长春市和空中交通运输线。“出击”的当天，敌暂编第六十一师就前出到长春北面约30公里，占领了小合隆。

5月20日，也就是“出击”的第二天，是蒋介石在南京就任总统典礼日，长春还举行了庆祝大会。由长春警备司令部主持，组织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进行联合阅兵。军政首脑们，自郑洞国以下都出席了这次“盛会”。用尚传道的话来说，实际上是“强打精神，色厉内荏，讲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了。”

5月22日，蒋介石派来的两位视察员李克挺和肖树瑶（这两位南京飞来的“钦差大臣”，自投罗网，飞来就没有回得去，最后被我生俘），在尚传道和长春县长等陪同下，率领警察大队一部分摩托车浩浩荡荡前往小合隆“视察前线”和“抚慰收复地区的民众”。对那些强迫来参加大会的军民们，痴人说梦似地讲了一通“蒋总统非常关怀你们，不久就要派大军来鼓援，就要大举反攻”之类的鬼话后，溜回了城里。①长春出动之鼓为：国民党新编第七军之暂编第五十六师，前出到乔家窝棚、陈家洼子、哈拉哈、苏家营子、王家营子一带；暂编第六十一师前出到孟家窝棚、姜家窝棚、小合隆、万家店一带；

吉林保安第一旅位于小合隆东南地区。与此同时，还得知原驻长春东南之拉拉屯、石碑岭于地区之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之部队，也为准备出击增加了兵力。

就在这些“出击”的敌人立足未稳、而且自鸣得意之际，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第一、第六两个纵队，已经插到敌军翼侧，对大房身机场进行了出其不意的袭击。

我东北军区本拟一举全歼这批伸出头来的守敌，为下一步长春攻坚战创造有利条件，因而，动用了第一纵队、第六纵队和新编为第十二纵队的第三十四师、第三十六师以及独立第六、七、八、九、十师等共13个师的兵力，参加这次战斗。

我东北军区的作战部署：以第六纵队并配属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四师，切断敌暂编第六十一师的退路，围歼该敌以及准备歼灭由长春出击接应之敌；以第一纵队并配属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六师，切断敌暂编第五十六师的退路，歼灭该敌以及由长春出击接应之敌；独立第十师在第六纵队右翼配合该纵队作战。命令要求第一、六两纵队及独立第十师务于5月22日下午出发，24日切断敌暂编第五十六师和暂编第六十一师向长春的退路，尔后围歼之。与此同时，着令吉、松两前指率独立第六、八、九师于24日自现地出发，向长春以东的拉拉屯、杨家店、陶家屯一带前进，25日到达指定地点待命。如该处有敌，则首先大胆断其退路，以便全歼。独立第七师自卡伦以东于24日到达长春西北四间房以东公路附近，配合第六纵队切断敌暂编第六十一师的退路。

根据战斗发起后的过程及战后查明证实，我军对各部敌人的活动情况及所在位置，掌握得比较准确具体，这说明临战前

的侦察工作发挥了很好的效能。

这次战斗的大致经过是这样：

我第六纵队按照军区的命令插至长春西北，进至四间房、班家营子、苏家营子、纪家窝棚，切断敌暂编第六十一师的退路，并包围歼灭该敌。部队隐蔽行动，于22日15时，出敌不意到达范家屯以南，景家台等地集结。当晚21时，接到军区补充指示，命该纵队于24日6时前，插至长春西北四间房一带，主力向小合隆之敌攻击前进，并包围歼灭之。尔后以一部兵力留四间房和四道岭阻击敌人。并应至少以一个师经桑家窝棚附近自敌间隙中大胆插过去。

根据军区上述指令，第六纵队经与独立第十师联系，了解部分敌情后，决心以第十八师担任堵截敌暂编第六十一师退路并阻击长春出城接应之敌的任务。该师务须轻装前进，自机场和长春之间插过去。以第十六师和第十七师担任包围歼灭敌暂编第六十一师之任务，第十六师为左翼，第十七师为右翼。23日12时，在行动中命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四师迅速向东延伸，从东面出击，形成两翼包围，务使小合隆之敌不得东窜。为防止敌向东南与暂编第五十六师靠拢，而形成敌主力南压我之第十八师，命第十六师准备猛插分割该敌而歼灭之。

23日22时，部队已开始开进。23时30分，接军区令暂停行进待命。军区指示，第六纵队部队如经桑家窝棚西进，势必将敌暂编第五十六师吓跑；因此，第十六、十七师改为向桑家窝棚、驛马站前进，担任包围敌暂编第五十六师，协同第一纵队歼灭该敌。第一纵队向吉家房、桑家窝棚、哈达窝棚前进。第六纵队之第十八师仍经机场东，插到四间房。

第六纵队为了避免行进中同一纵队交叉，就地停止待命。待第一纵队之第二、三师通过后，再经过桑家窝棚东，以战斗行动突破，向四间房前进。

此时，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四师，已进至哈拉哈一线，与敌暂编第六十一师接触。战斗中歼敌暂编第六十一师二团团直及两个营和一团的1个连。因此，军区于23日24时命第六纵队迅速向四间房前进。第六纵队之第十八师部队，在前进中先头1个营至崔家营子以南公路时，发现敌骑兵向班家营子逃窜，该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即与敌骑兵第二旅接触。战斗10余分钟，占领班家营子北小高地，俘敌80余；当即与蔡家窝棚、宋家堡子之敌对峙。由于我后续部队过分强调隐蔽，又未放出翼侧警戒，未能迅速跟上，致使敌人抢先占领了火烧里，将我部队截断，不能再继续发展战果。

24日10时许，国民党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奉郑洞国之命，亲率新编第三十八师约两个团的兵力，出城迎击我部队，接应城外之敌撤退。（这是郑的明智、决断之举。）当即占领火烧里、车家窝棚，并迂回到我军背后的雷家店，待我第六纵队其它部队调来时，接应之敌与暂编第六十一师已大部撤回长春，只有该师二团之一部为我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四师消灭。

我独立第十师部队在第六纵队右翼行进中，在范家屯以南遇敌暂编第五十六师一团约两个连的兵力，遂即将其消灭。我第六纵队第十六师部队24日4时进至雷家店、兴隆堡一线时，我独立第十师已与该敌打响，歼敌1个营后，向机场发起冲击。第十六师即与独立第十师并肩战斗，向北纵深发展战果。是日14时许，夺取了朱家窝棚以西之地堡群。

此时，我独立第十师已攻占飞机场的两座机库，与敌机场之“大白楼”对峙。我第六纵队之第十六师，于14时接替独立第十师攻击“大白楼”任务，以第四十七团担任主攻。该团经充分准备后，以山炮4门，步炮2门，火箭炮2门，轻重机枪20余挺担任掩护。于19时10分开始攻击，采取火力掩护与连续爆破相配合的办法，组织了15名爆破员，由突击连长亲自指挥，具体交代任务。首先以炸药包爆破做烟幕遮敌视线；然后第1名爆破手在烟幕的掩护下，顺利地将“大白楼”门外的碉堡炸塌，第2名跟踪而上炸开了大门；第3、第4、第5名立即钻入门内连续爆破……且爆破组人员无一伤亡。突击队进入“大白楼”后，以轻机枪、冲锋枪猛烈扫射，并以迅疾勇猛的动作，将小炸药包投向敌群，此伏彼起的爆炸声使敌人血肉横飞、惊魂丧胆。乘此时机，我突击队战士迅速登楼，以同样的火力扫射和投掷炸药包的战斗行动，使敌人丧失了抵抗能力。在楼上，生俘敌副团长1名，楼下生俘敌副师长王正国。我突击队只用两个班的兵力冲入“大白楼”，结合爆破发展战果，即将敌1个师指挥所和1个团指挥所消灭。

我第一纵队配属军区炮兵，按第二、三师的顺序向北奔袭。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六师在第三师右翼采取宽正面而向北奔袭。第一师在纵队指挥所后跟进，任务为歼敌暂编第五十六师。23日23时，该纵部队到达新开河西岸徐家屯一带渡河。24日凌晨进至驛马站、乔家窝棚，歼敌暂编第五十六师二团大部。敌主力向四间房以北逃去，窜回长春。我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六师，进至孟家窝棚、姜家窝棚，歼敌暂编第五十六师及暂编第六十一师各一部，爆敌向广家窝棚窜回长春。此次战

斗，第一纵队计毙伤俘敌1 386人，俘敌暂编第五十六师二团团
长舒剑，副团长赵廷祥，三团少校营长王石均及少校军官何明
之等人。其中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六师，俘敌营长凌景春以下
170余人。

我独立第七师部队，于23日自卡伦方向朝东开原窝棚出
击。战斗中歼敌吉林保安一旅二团之一部，俘敌600余，毙伤
敌100余。

我独立第六师、独立第八师，于24日攻击东拉拉屯、小河
台，由于未及向敌后穿插，守敌与我稍一接触，立即缩回长春，
以致未获战果。

此次作战，我军共歼敌约4个团（5 000人）。并生俘暂编
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该师一团团长汤克振、二团团长沙舒剑
等人。在歼敌作战行动中，独立第十师坚决大胆，以猛烈顽强的
战斗作风，一举歼灭敌大房身机场之两个营。第六纵队第十
六师攻击机场“大白楼”准备充分，仅以30分钟的时间即将
“大白楼”攻克。该两师均受到军区表扬。而有些部队，在此次
作战中确未能充分发挥威力；有的是未能按军区部署插入敌
后，截断敌人之退路；有的是没有乘敌人溃退之际大胆猛追，
致使敌人逃回市内；还有的是部队疲劳，未能向敌后迂回，过
早接敌，将敌人吓跑；也有的虽然投入了战斗，但打了莽撞
仗，依然未获好的战果。

诚然，我军发动的这次作战，是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的一次战斗行动。但是，就我军这次作战的企图来看，战果却
不十分理想，甚至可以说没能达到我军这次作战的目的——歼
灭战未能打成，被诱出城来的敌人大部缩回长春了。原因固然

是多方面的：就主观方面看，战前对瞬息万变的敌情掌握和判断的还不是那么十分清楚；在部署上，假如按第六纵队曾经建议的那样，把两个纵队的任务对调一下，由第一纵队消灭敌暂编第六十一师，第六纵队消灭暂编第五十六师，不仅可以避开我军部队过多的行动交错，而且能迅速抓住战机。此外，在各部队作战的协同上，尤其是配属部队与隶属关系单位之间，在消灭共同目标的协同行动上，没能形成拳头，因而，影响了战果。②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敌暂编第五十六师。该师确属经我歼灭后重新组建，它的某些军官确曾有同我联系起义之意；该师在长春守敌中地位较低，不为第七军所信任也是事实；国民党第五十八师在营口起义后，该师师长曾被撤换过。但对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绝不能估计过高。事实证明，这次战斗中暂编第五十六师抵抗的比较顽强。③这说明两军阵前不能有丝毫轻敌思想。仗是打出来的，只有打痛了敌人，才有争取的可能。

此次外围战斗后，长春守敌即全部龟缩于市内。大房身机场为我占领，敌人唯一的空中交通从此断绝了。不过，总还算幸运，郑洞国不愧为善于总结经验，敏于吸取教训的民国党军事将领。这次“出击”，的确遇到了他事先没有料到的情况。于是，他见势不妙，迅即责令李鸿亲率新编第三十八师两个团前往接应“出击”部队，撤回长春市内。没把两个半师全部陷进去。

第一次外围作战结束，我东北军区即命令各部队做好攻打长春的准备，决心以9个纵队参加此次攻坚战役。除已安排的第一、六纵队在长春外围作战前即于长春附近集结，并继

续准备接受攻打长春的任务外，并又令第八纵队、第十纵队、第五纵队向长春附近集结。并命令各部队进行攻城训练，准备攻坚和打援。当时，各部队集结位置如下：

第一纵队：九台、卡伦之线；

第二纵队：西安至大石岭；

第三纵队：西安（含）及其以东；

第四纵队：辽阳、鞍山之线；

第五纵队：抚顺以东、清源以西之铁路沿线；

第六纵队：（欠一个师），西阳、口前、双河镇及其以西；

第七纵队：四平、梨树、郭家店一带；

第八纵队：八面城、大洼一带；

第九纵队：北镇附近；

第十纵队：昌图、新老开原之线；

第十二纵队：长春附近；

炮兵：双阳以东，五家子一带。

① 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一书，第399页。

② 参考第六纵队《我纵奔袭长春西郊作战经过详报》及东总有关电文。

③ 参考东总上报军委《我军奔袭长春外围》电文。

转强攻为围困

在这里首先简要追溯一下中央军委同意强攻长春的过程。

1948年三四月间，东北局、东北军区利用冬季攻势结束休整的间隙，召开会议，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打不打长春和如何打长春的问题。

3月12日，罗荣桓同志就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作报告时指出：从夏季攻势以来的10个月里，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局面，由劣势转为优势。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东北局的“七七决议”确定了明确的方针，我们12 000干部下乡，土改基本完成。由于我们关内关外的同志一致努力，加上华东战场上的连续胜利，牵制了敌人不能北调。这些，都是改变形势的重大因素。目前，敌人的后备力量有限，大量增兵东北已不可能，蒋介石进退两难。我们的方针政策，一是切断敌退路，一是围困敌人，最后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

从4月份开始，东北军区总部召开了若干军事专业会议，着重围绕着“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剖析了四平等城市的攻坚战例，为强攻长春，进而解放全东北，做了思想上、组织上以及战术、技术训练的准备。

4月18日，东北军区总部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上报军委。预计从5月份开始，集中9个纵队攻打长春和打援。以新成立的3个纵队和几个独立师，在沈阳与锦州、沈阳与四平之间牵制敌人。决心一举拔掉这根敌人前伸到我东北解放区腹地的钉子。使东北国民党军守的3个孤立点，减为两个。在完成准备后，发起全面总攻，争取以10天到半月的时间结束战斗。于是，除已到达长春附近的第六纵队外，第八纵队和第五纵队也接到了攻打长春的命令。与此同时，活跃在南满的一些部队，均得到了准备对长敌实施攻坚和打援的通知。

4月22日，中央军委、毛主席复电，同意攻打长春，但同时却指出林彪多次强调先打锦榆段以及入关作战困难的思想是不对的。早在1947年10月17日，中央军委、毛主席曾电示东北局，“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1948年2月18日，又电示说：“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的由东北向华北撤退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但此时林彪考虑的仍然是先打长春，或围点打援，而后再一步步向南推进，解放东北全境。所以，从4月份开始，东北军区总部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仍是围绕着强攻长春这个主题。为了下一步作战，5月中旬，东北局开始组建两个指挥所，一个是第一前哨指挥所（即“围指”，后改为第一兵团，第十二兵团），以原辽宁军区机关为基础组成，由肖劲光任司令员，肖

华任政委，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副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任参谋长，准备指挥攻打长春。另一个是第二前线指挥所，以原冀热辽军区机关为基础组成（后改为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负责指挥北宁线方面作战。两个前线指挥所均不辖部队，由东北军区总部根据任务的需要组织配属。

两个作战方向的指挥所是宣告成立了。但是，根据战局形势的发展，在东北战场上南北两头，究竟该把战略重点放在哪一头？前面说过，中央军委、毛主席早有指示；而且，那是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现在摆在面前的这一重大课题，该由东北军区的领导机关在两者之中抉择了。

5月下旬，长春外围战斗结束后，长春守敌当即陷于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当时的态势是：我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六师在长春正南伊通河至班家营子一线；我独立第八师在长春正东四家子至伊通河一线；独立第六师在长春正南孟家屯到四家子一线；独立第十师在长春正西杨家粉房至孟家屯一线；我第一纵队位于长春西北方面的独立第十一师和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六师的纵深内；第六纵队位于长春正南独立第六师的纵深内。但是，我军并没有立即攻城，而是在逐步接敌压缩中，不断构筑工事，处于做好战斗准备、整训待命的状态。

当时，东北战场上的敌人在做何打算呢？

卫立煌与蒋介石在对东北战局的看法上虽然矛盾重重，但有一点还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军队撤往关内；不同的是，从陆上跑，还是从海上跑？他们各持己见。蒋介石为了达到他的战略目的，组建了冀热辽边区指挥部，安插亲信杜聿明担任指挥，削弱卫立煌的指挥权力，迫使他就

范。冀热辽边区指挥所于1948年春成立，并由秦皇岛移至锦州，兼控葫芦岛。卫立煌深恐自己的权利受损，呈请将该指挥所改称“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但并没有改变蒋卫之间矛盾的实质。因而，在这种情势下的长春，也处于一种蒋卫间同床异梦的特殊地位。按蒋卫“统一”思想的战略要点在辽西，长春本该放弃。然而，卫立煌考虑的却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弃则只剩辽西一隅，何谓“东北剿总”？^①因此，以长春处于我解放区腹地，向北、向西、向东都可以作为向我进攻的基地，从而可以牵制我一部分兵力，减轻对辽西以及北宁线的作战压力为由主张固守长春。此外，蒋介石还考虑到倘若轻易放弃长春，于国际影响极为不利。总之，败局虽定，面子尚不可轻丢，一句话，东北国民党军所以没能及早放弃长春，是因为蒋卫之间的同床异梦合了拍。可是，当5月下旬长春外围那一仗打过之后，长春就彻底成了一座孤城。此时，不想死守也得死守了。

我中央军委、毛主席对东北的战略局势早见及此。因而多次强调东北的作战重点应转向北宁线。并将东北、华北接壤地带的作战任务交给了东北军区。从全国形势发展来看，东北可以早日宣告解放，东北部队可以转战华北已成定局。从开始酝酿攻打长春时起，几乎一直到锦州战役发起之前，中央军委、毛主席曾连续多次致电，督促东北主力及早南下北宁线作战，切断敌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1948年6月3日，中央军委对长春作战来电称：“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一、以2个或3个独立师攻城，以7个至8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

占一半或1/3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起一次大消耗。”

中央军委这一电文是根据朱德总司令看过我东北第一、六两纵队的电报后，对攻打长春致电军委的意见而发出的。概括起来，大致内容是这样的：第一，攻打长春有一定的优越条件，因为纵观形势，我优敌劣，可以达到攻克的目的。第二，但要准备充分，攻击时间要长，投入兵力要大，还要有各种专门炮工人才，实事求是地、一步步地进攻，不能操之过急，二三个月能打下也算是快的。第三，要有充足的家当，如要准备伤亡30 000以上的人，20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轻重迫击炮弹，30万斤炸药，200万枚手榴弹，即有可能打开。第四，如家当不足，即可采用另一种方法——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他，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强攻与长围，两种战术，如有家当，可取第一种；如家当不足，攻一城即将弹药、炸药消耗殆尽，一时又难以补充，则不如打野战。因而，如何打长春要看家当大小来决定。②

中央军委的指示，朱德总司令的意见，全国战略局势的要求，东北战场上敌人的动态以及我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具体情况，构成了一个总的战略要求，那就是东北战场务须于南面封闭北宁线、断东北之敌的退路，而北而攻打长春，也决非轻而易举。权衡利弊，何弃何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不能不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了。如果说在四五月间还坚决主张首先攻打长春，那么，到了5月底6月初，作战思想也不得不发生转变。考虑再三，提出了3个方案，并于6月5日上报中

中央军委。

第一方案：立即攻打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甚小，不成功的可能性大。因为从我可能使用的兵力看，新老部队合起来对敌之比还达不到三对一，而打援的部队只有两个新建的纵队。这样的力量对比，我攻城部队经过战斗消耗，没有取得胜利的把握。很有可能歼敌一部和占领城市的一半后，因各部队所剩人数太少，出现僵持状态。如此，则日夜在敌人飞机、炮火的袭击下，不断遭受杀伤消耗，而时间拖长，援敌又可能与守敌会合，使我军不得不退出战斗。这种无把握的仗，如果放在别处，有时尚可以考虑打，因为即便以半数或1/3的兵力投入这样的战斗，不成功，也无碍于大局。但在长春进行这种无把握的作战，若不成功，则对整个战争局势产生消极影响。士气受到影响，而且又难以找到打中、小胜仗恢复士气的机会，将来带着这种情绪去执行围困沈阳、锦州、天津、北平的任务，是不利的。同时，也考虑到敌炮兵火力、自动火器较强，与全国其它战场相比，东北之敌装备精良。如1947年秋季攻势，东北全歼敌第五十师1个团，缴各种炮即达到82门之多。而那时我晋察冀部队在清风店歼灭敌新编第三军4个团、1个师部和军直5个营，缴获的各种炮只有72门，较之东北消灭敌1个团还少10门。如按上述情况分析，可以想象，如我占领长春的一半，停止进攻而与敌对峙，则日夜都会遭敌密度相当大的炮火袭击。所以，长春不打则已，要打就要一鼓作气打到底，直到胜利结束。但目前还不具备此种条件，因而第一方案不能采用。

第二方案：以少数兵力围住长春，主力到北宁线、热河、

冀东一带作战。以主力南下，仍可能到处扑空，或遇到同样集中而不便攻打之敌，其结果也可能只有围困。而且，还要遇到一个粮食供应困难的问题。热河地区部队此时粮食供应已颇困难。如我军在秋收前南下，势必使粮荒加剧。还必须估计到，如我主力南下，长春守敌很可能在沈阳之敌接应下退至沈阳。如果我们对长春守敌围困的时间延长，我军的战斗力自会提高，长春守敌横直跑不掉，迟早会被我歼灭。如我军主力南下，这个横直可以被歼灭的敌人，很可能跑掉了。因此，目前也不宜采取这一方案，搞不好会造成两头失利。只有待长春之敌被歼灭后，那时，由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均已延伸，我军可以一部包围沈阳，主力指向热河、冀东，则较为有利。

第三方案：对长敌进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时间约2—4个月，在此期间，力争打援。即使无运动仗可打，我军进行练兵整训，战斗力亦可大为提高。而敌人经我长时期的围困，疲惫不堪，战斗力必大大降低。总攻发起后，战斗进展必然加快，可以在敌援兵没有到达之前攻下长春。综合以上情况分析，认为这一方案较妥。同时估计到长敌被围困到粮尽饿极时，沈阳之敌有可能被迫增援。我则可以长敌为钓饵，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这是对我最有利的。这一方案，除在时间上多费几个月以外，没有其它坏处，却有把握全歼守敌和拿下长春。舍此，目前即攻打长春，加不能获得全胜，则我军士气的影响，实力的损失，决非短期所能恢复。那时，须要等待的时间比等待攻击长春的时间还要长。况且，目前敌人在东北、华北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以龟缩大城市固守为主，借此保存力量，苟延残喘。我军在现阶段也必须准备对沈阳和类似

的大城市采取围困的方法，除此，暂无妙策。因为暂时决无可能形成进攻这类大城市的足够兵力。所以，无论主观上如何急于求成，客观上要求你采取较长时期的耐心的围城打援的办法。而在采取对大城市围困的同时，配合中原、西北等战场运动战及中小型规模的攻坚战。歼灭敌人扩大根据地并配合华南游击战争。这样做，有利于全国战局。③

在上述的三个方案中，林彪虽然依旧强调去辽西及北宁线、热河一带作战的困难；但却放弃了立即攻打长春的主张，提出了经过较长时围困后再攻城方案，这也是他在多方面的启示下，作战思想的进展。

5月下旬以后，由于准备攻打长春在整个东北部队中已成即定的事实，所以各部队都在围绕着这一作战计划进行着多方面的准备行动。有的组织部队向指定的地区靠近，有的对长春进行了侦察，有的展开了针对性的战场训练等等。然而，此时的东北领导机关，对如何攻打长春问题，却正在酝酿着新的作战方案。为了集思广益，使各部队在任务突然转变中思想有所准备，东北军区于5月26日发出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队根据长春外围作战与敌接触的实践和通过侦察了解的敌情、地形等情况，冷静的估量，我军究竟有无把握一举全歼长春守敌。并提出了对长春守敌作战方针的上述三个方案，供大家讨论。

各有关部队研究后，均上报了各自的意见。上面所说的朱德总司令看到的第一、六两纵队的报告，即是他们上报的意见转呈军委的。其中第一纵队的意见较为具体。态度也很明确。他们在6月1日给东北军区的回电要点大致如下：

——根据俘虏供称，长春守敌新编第七军为3.15万人，第

六十军为2.75万人，吉林保安第一、二旅，骑兵旅，志愿兵团，警察自卫队等共2.8万人。加上其它零星部队，约10万人。

——长春西北、正北地形开阔，惟有正面较之有隐蔽地形可利用。而西部敌工事构筑的较为坚固。长春市区西部共有36个永久性的坚固碉堡，土木地堡、堑壕较多。

——敌军内部控制严密，实行连座法，军官采取督战队办法。这些办法在敌军中很起作用。军官不被打死，士兵是不能缴枪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攻打长春开始是可以突破的，如全歼该敌则把握不大。打得不顺利势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其结果是使我军力量遭到相当削弱，仍难取得彻底胜利。而目前我全军中真正受过激烈巷战锻炼、有着这方面经验，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并不多。但若有较长时间，付出较大代价，亦有全歼之可能……

此时，中央军委态度早已明确。东北军区也曾有上述3个方案的电报上报。各部队对于如何攻打长春的问题，态度亦已明朗，一纵队的电报可见一斑，颇具代表性，可谓上下一致。

1948年6月7日中央军委致东北军区电称：“基本上同意你们5日19时半来电的第3个方案，即用3个月至4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后再攻承德或他处……”

综上所述，对长春的作战方针必然产生的结论应该是什么呢？第一，中央军委、毛主席三令五申东北部队务须转战北宁线、冀热辽一带，尽可能将东北的国民党军消灭在主北境内，以减轻其它战场的压力。这是必须遵循的战略全局。第二，长春

军事设防较为坚固，具有两个正规军和地方部队约近10万人防守，攻之不易。如按当时我军装备与战术、技术条件攻之，即使攻击开始能够突破，发展战果亦颇困难，更不易在短时期内全歼守敌，而我需要付出3—5万人的伤亡和几千吨弹药的庞大代价。尤其是倘若短时间攻之不下，会把我军主力拖住，不能集中精锐于北宁线一带，这是恰恰符合了敌人的战略企图。蒋介石不肯轻弃长春，旨在牵制我主力不能南下作战，以便减轻其战略重点的压力，苟延残喘，等待时机。如我军在长春与敌纠缠，势必影响我东北全境战局，进而影响其它战区，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为时不到1个月的期间，我东北军区领导机关在对长春作战的方针上，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攻”到“围”。攻与围，仅一字之差，却是东北战场在战略上极为重要的一着棋。它加速了我东北战场全局胜利的步伐，也完成了东北局提出的1948年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战争的任务，加速了国民党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彻底失败。

我东北军区领导机关，继1948年6月5日报中央军委的对长作战三个方案的电报后，又提出了围困长春具体办法的报告。报告内提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两项办法。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联系，使城外各地的物资，尤其是粮食、柴草、蔬菜等生活资料，不能流入长春，使长春守敌得不到外围人民的供应。以炮火和高射武器控制天空，使敌机不能着陆和不敢低飞空投，以限制敌人空运。十万之众的敌人，一旦供应被完全断绝，经过三四个月之后，则不战自乱。战斗力必将大减，以至完全丧失斗志。如此即有利于我之攻城，进而全歼守

敌。因而，我东北军区领导机关指出，包围与封锁，是大的攻城战中一种有效的作战手段，要求各部队必须重视这一作战任务，要认真负责地执行这一作战手段。

从此，对长春守敌围而不攻的战鼓敲响了。一种在我军各个战场上从未出现过的作战形式，在东北战场上就此崭露头角。

此时，我军在长春外围的态势如下：

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六师位于长春正北之伊通河到班家营子一线；独立第八师位于长春东北侧四家子至伊通河一线；独立第六师位于长春正南孟家屯至四家子一线，其纵深为第六纵队三个师；独立第十师位于长春正西场家粉房至孟家屯一线，第一纵队于独立第十师纵深，并以一个师跨至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六师右后纵深。不久，第一纵队首先调离，继而第六纵队奉命调离长春前沿地带，集中整训。只留下第六纵队之第十八师做“围指”预备队。在压缩了的包围圈与敌对峙的，只有我第十二纵队和几个独立师。这就是对长春守敌实行久困长围的序幕。

① 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1—52页。

② 引自《毛泽东军事文集》462页之电文及496页之注释。

③ 摘自东总1948年6月5日《关于进攻或围困长春方案向军委的报告》。

固守有方 待援无望

当1948年3月25日郑洞国在长春励志社大楼（现东北及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大楼），庄严宣誓就职的时候，他面对着号称十万之众的守军还是有点自信心的，尽管心情有些沉重，但却有“一线之望”。这就是蒋介石的亲口许诺，不久援军即可运来东北。试问援军安在？蒋介石曾有过一个如意的算盘：准备放弃锦州，以7个师的兵力驻守葫芦岛和锦西机场。再抽7个师由葫芦岛船运营口，并着令第五十二军前往控制营口，接应登陆。尔后，登陆部队再北上接应长春守军突围。

除此以外，长春守敌内部还有一种维系士气、神话似的流传。说什么国民党在台湾正训练着大批的美式装备新军，几个月内即将开到东北，大举反攻，只要能在长春守住半年左右，大局一定能扭转。

事实如何呢？解长春之围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美梦。

既然上了马，就不能下马，长春的烂摊子再棘手，郑洞国也只好尽力而为了。他根据持久防御的作战方针，把长春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分别由第六十军和新编第七军防守。除沿城市边缘构筑防御工事外，在市区内，利用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以伪满中央银行大楼（现人民银行大楼）区为中心造成核心工事。为了巩固城内秩序，郑洞国不准那些地方游杂土匪部队入城。让那些找他要粮要钱时，自称有成千上万的人马，而一经核实，不是一支队伍就有几个头、就是干脆是“光杆司令”的土匪队伍们，在城外“自生自灭”。①

新编第七军与第六十军一嫡系，一地方，不但使用不同，在分界线的划分上也体现出亲与疏、信任与不信任。笔直的中正大街，作为两个守备区的防守分界线，却把街东的一大块地区划归西守备。原因是这个地区是郑洞国第一兵团指挥部所在的中正广场区周围。这地方，高大建筑物矗立，工事布局严密，不但坚固，而且便于向各个角落机动兵力，是长春核心守备地区、要害部位。置该地区于新编第七军严密控制之下。郑洞国的警卫部队也配置于此。由此可见，受重用的是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只能承担非要害部位的防守任务。

长春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大体上两个军都做为两个梯队的配置，各以1个师（欠1个团）作为兵团的预备队。有两个反击预案：一是西北方向，以新编第七军之暂钱第六十一师（欠1个团）和吉林保安第一旅于水仙路展开，向西北钱路方向反击；二是东南方向，以第六十军暂编第五十二师（欠1个团）于南岭街展开，向东北屯方向反击。在防守兵力的使用上，以2/3的兵力守前沿外圈，以1/3的兵力守核心地区。

从整个兵团到军、师、团、管、连的兵力的配置，都是2/3在前，1/3守各自的核心地区。此外，将可以参战的地方部队配置于外围，以便对我袭扰或窜入我后方进行破坏。将新兵编入主力部队，以便以老带新。地方警察用以维持社会秩序，必要时，亦可参加作战。对军队的后方机关人员，也都进行了战斗编组，必要时，皆可投入战斗。

总的看，长春守敌防御作战特点有三：即核心、细胞、后三角队形。防御手段和作战思想强调依托坚固的工事进行持久的防御；依靠绵密的火力机动阻止杀伤对方，而不甚注重兵力机动。整个防御体系是以各个细胞构成一个周围的防御整体，各个细胞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孤守一点，应付各方独立作战。又能相互进行火力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如对方突破一点，仅能消灭一部分细胞，不致影响整个防御体系的震动。这与防线式的、或阵地带式的防御体系，是有很大区别的。从长春守敌的兵力配置和工事构筑的布局上，就可以充分的说明这一点。

因此，长春守敌的防御体系，可以说是以核心、细胞和战斗队形后三角等三种形式相结合的组成体。以若干核心点（也就是细胞）构成核心区，使层层核心守备的区和点，都成为易守难攻的硬钉子，以利持久防御作战。这种防御体系，无疑是针对我军攻坚战特点而采取的对策。

按照长春自然地形以及坚固建筑物的分布条件看，敌东西两个守备区的6个师的防御地区内，均有各自的核心。如暂二十一师以东荣区为守备中心；暂五十二师以成功银行为守备核心；暂六十一师以伪经济、司法部大楼为守备核心等。其各团，也均有防守核心区 and 点。中正广场地域，为兵团最后的防守核心。

因为是郑洞国兵团指挥部所在地，工事最坚，兵力配备也最强。上述核心守备地区和点，均控制一个以上的、能俯瞰面积较广的高大建筑物。既便于观察，又能依托发扬绵密的火力，控制全区。因而，几乎每一幢坚固的建筑物，均有1个连以上的兵力防守。从兵力使用上来看，多以弱的部队守备外圈，而防守核心地区的部队，多为战斗力较强的主力。如中正广场地区的全市守备核心，即由新编第三十八师和郑洞国的警卫队防守。

从阵地编成到每一个防御核心细胞的工事构筑，都考虑到独立作战的本能。工事构筑多为据点式的核心工事及碉堡群。都有一个较坚固的建筑物或母堡作为守备核心。周围绕以子堡及一般土木工事。母堡与子堡之间，连以掩盖的交通壕及伪装等，形成可守、可退，伸缩性较强的战斗据点。碉堡内通常设有电话、电灯、炉灶、压水井、住宿的床位以及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烧柴。从而形成几乎每一个碉堡都是一个细胞，若干个细胞构成整体，而每个细胞又都可以各自为战的防御体系。

这种细胞（据点）式的防御体系的构成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班或小组固守闭锁式的碉堡，形成基层之细胞；二是由排连守碉堡群，碉堡群是中间以永久或半永久性的碉堡（也可能是坚固的建筑物）为核心，周围伸出若干个于堡形成的；三是营（连）通常以1至3个碉堡群构成据点工事；四是各师（团）分为2至3个守备区；五是兵团以第六十军守备东城，新编第七军守备西城；六是环城阵地及外围各据点均以天然障碍及人工制造的副防御物（如伊通河、外壕、地雷、绊索、铁丝网、铁管障碍等）环绕起来，构成大小细胞之外的屏障。

结合各据点的工事构筑，重视发挥隐蔽的侧射和斜射火力。

配置在前 $2/3$ 的兵力，可随时得到配置在后的 $1/3$ 的兵力的策应。如我只从一面攻击，仅能打击其 $2/3$ 的兵力，其另 $1/3$ 的兵力，可随时机动策应。若我进行两面以上的攻击或分割包围，即可使敌陷于各方应付，易于使我各个歼灭。但敌人还可能得到友邻据点的火力支援。因此，敌人的这一着，最有利于抗击穿插能力较弱的对手。

此外，敌人还注重了副防御设施，据点前及外围均设有铁丝网和宽3米深2米的外壕，壕内还设有纵射火力点。因而，长春的设防，曾受到卫立煌的重视。1948年4月，卫立煌曾亲赴长春视察，并指示要结合设防工事，进行一次全面训练，还要增加副防御设施等。由此可见，宣称长春设防“坚冠全国”，并非完全吹嘘。如前所述，远在日寇占领时，为了对抗苏联红军，即结合市政建设，构筑了大量的着眼于军事上需要的设施。1946年5月，新编第六军占据长春后，即构筑了若干野战工事。是年秋，新编第六军他调，新编第一军接替后，又增修半永久性高低碉堡70余个，大部分布于前沿。1947年秋季攻势，我军攻打四平后，长敌也为之震动，又急修永久性高低碉堡60余个，也大部分布于前沿。1948年3月，六十军逃至长春后，又增修野战工事与土木工事。我军开始围困长春，敌于慌忙紧迫之中，以增修前沿工事为主，并加修与加强纵深防御体系。由于材料缺乏，仅增筑了30余个小型永久性碉堡，面普通地堡构筑数量颇大，多密布于阵地前沿、市街两侧、院角、广场周围和公园里。这些分期分批的工事构筑，可谓多得无法统计，仅就长敌工事分布图上标定的，半永久性以上的碉堡，就有360余个之多。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前出外围的6个据

点。土木建筑的地堡数字，无法统计，更不要说野战工事及副防御设施了。人力物力消耗之大是非常惊人的！

堡与堡之间隙，一般为50—100米。通常以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碉堡为母堡，周围环绕3—5个地堡做为它的火力连接点和子堡，形成一个碉堡群，构成火网封锁街道，消灭死角。另外，前沿阵地的副防御设施也很复杂。在外壕两侧一般设有两道铁丝网，外壕外设有地雷、绊索、钢筋、鹿砦、陷坑等等。前沿副防御纵深通常为40—60米，如从碉堡算起，则在100米左右。

长春守敌对工事构筑，不但计划周密，而且施工的管理原则与采取的方法步骤都十分严谨。首先是施工的原则，以确保持久固守长春为目的，以市区为中心、市郊为外围构成永久性工事与坚固建筑物相结合的主阵地，力求歼敌于阵地前。阵地的选择，着眼于节省兵力，控制要点，并与星罗棋布之半永久性工事、野战工事相连接，与核心阵地相协同。其次是工事构筑的位置，自北郊现公路沿赛马场（现称跳伞塔）、民族广场、南岭及南岭小学之线，摘要构筑，其重点置于西南面。构筑步骤，由外围向核心陆续增修。并侧重南岭小学以北地区，使其具有高度独立持久作战能力，能向四周发扬火力，严密伪装。三是施工的组织领导，先由主要幕僚选点，再由各主官亲赴现场决定。由警备司令部（现省委大楼院内）、长春市政府、长春市议会派员与长春市的建筑工程师们合作，组成长春特种工程委员会，按定点的位置与要求，向长春市各民营建筑公司招标负责施工。战术方面，由警备司令部赴现场督导；技术方面，由特种工程委员会负责。四是使用材料的来源，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再广泛搜集水泥，主要建材上级批发，不

足部分出工委采购，所需价款由上级拨发。

除土木工事外，主要工事是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碉堡。永久性碉堡的构筑材料，全部为钢筋水泥整体打筑。常见规格墙厚0.7米，内径5米。大部筑于前沿起伏地形和市区街口。有高低两种，通常入地2米，露出地面的高度不等，依据地形而定。射孔的设置，取决于碉堡突出地面高度或一层或两层，每层射孔4—6个，底层射孔距地面0.7米。大型永久性碉堡以1个排防守，配轻机枪3挺，重机枪1挺，堡外设有六〇炮阵地。半永久性碉堡，建材为砖砌外涂水泥，壁厚1米，内径3米，高达6米。射孔两层，每堡可容10人。配轻机枪或重机枪1挺。普通地堡为上木建筑，多用于前沿阵地与外围据点，坚固建筑物及核心工事的周围。每堡可容4—6人，配轻机或重机1挺。这种地堡，坚固程度虽弱，但利于伪装，不易发现。

长春守敌除大量增修工事外，将原伪满时期日寇构筑的较为特殊的工事和坚固的建筑物，加以利用。如中山公园门外东北角之大碉堡，有3条坑道分别通往火车站、警备司令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松北联中（伪宫内府）有两个大碉堡，也有3条坑道。民权公园东北角之大地堡，可容30余人……这种可利用的设施，多不胜数。伪满中央银行、伪国务院、新帝宫、经济部等等，都是全钢筋水泥花岗岩建筑物；还有一些钢筋水泥砖石混建的建筑物。经过修改后，与市街广场之工事相结合，构成交叉火网，形成集团工事，作为纵深核心之守备点。

从兵力上看，虽号称十万之众，但直接参战者，不过80 000左右。其中踞守在主阵地以内的主力部队，约有63 000人，主阵地周围全长33.6公里，如把阵地上的国民党军官兵

都摆在前沿上，平均每公里正面有1 878人。

主要重火器，计有：新编第七军两个重榴炮连，炮8门，新编第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各有1个山炮营，共30门左右；此外，化学迫击炮8门，八一迫击炮27门，八二迫击炮82门，六〇炮377门，总计530门左右。共有重机枪262挺，轻机枪1 507挺。

对炮兵的使用：两个重炮连配置在平伦路以北之中山公园内；两个山炮营分别配置在民权公园（现新民公园）西侧和中山公园以南、交通银行以北地区，炮兵火力计划和区分任务的办法也较为细致：将长春市及火力能控制的郊区，以中正广场为中心，自西向东，由北向南，划为A、B、C、D 4个区。每区分为10×10等方格100个，每一方格为2 500平方米。将各种火炮按不同射程和配置位置进行分工，以图达到置长春全部于炮兵火力控制之下。主阵地内，平均每0.9平方公里内有八二迫击炮口径以上的炮1门，每0.7平方公里内有重机枪1挺，每0.3平方公里内有轻机枪1挺。②

工事“坚冠全国”了，粮食就成了能否做到“固守待援”的关键。在我尚未合围之前，抢购军粮为长春守军的紧要任务。5月份出击小合隆抢粮未遂受挫后，郑洞国即一面令各军自行抢购；一面责成吉林省的粮政局和长春市的田粮管理处代为筹划。经多管齐下，近50天的搜刮和抢购，得到约300万斤粮食。新编第七军原驻长春，积储了一点粮食；第六十军和吉林保安旅则现购现吃。为了摸底，4月中旬进行了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据称，按当时所统计的市内食口数和存粮数计算，全部存粮，只能吃到7月底，到8月就无粮可吃了。郑洞国说，

“当时，最使我头疼的是粮食问题”。大房身机场被我军占领之后，粮源彻底断绝了。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的6个师长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诉说困守长春的艰苦状况，请求速派大军赴援。蒋介石在庐山给各师长复电说：“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困难。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蒋介石，对长春还没有收回“待援”的承诺，只是强调还没“准备好”，因而要求他的部下在援军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支持到底”。

可是，就在这同时，蒋介石又发电给郑洞国，令他把长春城市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计日分配。从此，国民党在长春奉行的杀民养军政策开始出笼。

为了充实兵员，东北“剿总”下令吉林师管区加紧征兵。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把从解放区流入长春“难民收容所”的一些青年和从吉林逃来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当地的地痞流氓网罗起来，组成“志愿兵团”。居然有七八千人，交给了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可是，好多人被退了回来，因为有些人年龄和身体都不合格，许多人还有嗜好和不良习惯。同时，郑洞国还下令要全力组织应战，由长春警备司令部统一指挥宪兵、警察和各个自卫民众团体，会同省、市政府，维持市内治安，防止所谓的意外事件。

长敌企图达到“固守”目的另一个手段，就是强化庞大的特务组织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还制定了情报汇集计划，远及四平以北，吉林及松花江南北两岸。并在长春市外围25公里

以内，区分各部队区域，派出坐探，搜集我军事情报。

而且，还要利用“待机出击”收复已为我解放了的长春周围各县。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拟定各县《军政指导员办公处组织通则》。向解放区永吉、九台、德惠、怀德、农安、磐石、桦甸、伊通、双阳等县，各派出1名军政指导员。他们的职责是组织流亡政府，联络各县地主土匪武装，对解放区进行袭击的骚乱，在正规军出击时，配合行动。此外，还把榆树、舒兰、扶余等县划为吉北区，设“吉北区军政指导员办事处”，委国民党省党部CC分子孟庆涛为指导员。③

郑洞国对蒋介石是尽职尽责的。按理，国民党军在长春有如此能干的守城主帅，佐以那么多的将领，凭借着第一流的现代化设防，指挥着美械装备训练有素的十万精兵，是应该稳操胜券的。遗憾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失道寡助的不义之师，必然是穷途末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复灭的命运。不久，我军主力转战北宁线、冀热辽一带，蒋介石、卫立煌首尾难顾，自身尚且难保，何以援长春之急？于是，长春这座孤城，的确象郑洞国哀叹的那样，成了“断了线的风筝”，飘泊未卜了。且莫说“相机出击”，“待援”也绝了希望。只落得援兵无望，出击必亡，“坚冠全国”的设防，到成了天下第一的牢笼，真的圈在里面出不来了，惟有挣扎着等待末日！

① 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0页。

② 参考《长春敌匪概况续一》。

③ 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95—400页。

揭开围困长春的战幕

自1948年6月7日，中央军委电复东北军区，同意6月5日报请军委对长作战方案的第三方案时起，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对长春守敌即正式敲响了久困长围的战鼓。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总部还向担任围城部队强调指出：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瓦解等办法来围困长春，决不是以消极的办法对付敌人，而是要达到夺取长春、全歼长春守敌、解放长春人民的积极战略目的。也就是说，要以今天的围困，造成明天攻打长春的有利条件，今天的久困长围也正是明天攻城的序幕和有效的作战手段。其具体做法是断绝对长春的交通及一切商业关系，使城外各种物资，首先是粮食、柴草等生活资料不得流入市内。使长敌得不到市郊及外围各地的任何物资供应。封锁的办法，主要断绝两个渠道：一是断绝鼓空运。在我已占领长春外围机场的基础上，以炮兵火力和高射武器火力控制市内可以起

降飞机的场所（如经过改造的自由大路）及长春市上空。使敌机不能着陆和不敢低飞空投物资，以断绝敌供应的空中来源。

二是从陆地断绝长春守敌生活物资的渠道。具体措施如下：

——划长春市郊25公里以内为封锁区，在此区域内，没有县团以上机关证明的物资，一律不准进入。只要封锁区控制严谨，即便敌人出城抢粮，也可造成敌人出城半日的行程内，无粮可抢。

——由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告，宣布对长春市内断绝一切交通和商业联系。特别明确严禁粮食、柴草、蔬菜及其它生活物资流入长春。凡将上述各项生活资料，运入封锁区、企图援济敌军者，一律扣留，由指定机关没收。并视其情节轻重，酌情处置将物资运输过境的本人。

——为防止长敌将市内大量食口的负担转嫁于我，对从市内出来的群众予以劝阻。凡应劝回者，务必设法劝回。不能使敌人达到迅速疏散大量城市人口的目的，不能使其减少粮食食口的阴谋得逞。

——严妨奸商走私，广泛发动群众，军民协力，在大、小路口上设立检查站，以便封锁盘查。

——动员封锁区内靠近前沿地带的人民群众，将多余的粮食、柴草及暂时不需要的的生活资料窖藏起来，以防被敌人抢走。

只要能够在陆地和空中这两条渠道断绝敌人的生活资料来源，那么，长春守敌10万，加上市民，共约60余万人口，一旦断绝市外粮食供应，其惶恐之状是不难想象的。即使国民党军的杀民养军政策行有特效，口粮难以为继，也将锐气大减，馁无斗志了。如那时我再攻城，一举即可全歼守敌。因此，东

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指出：包围封锁，是大的攻城战中一种有效的作战手段。各部队在执行此任务中，务必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包围封锁持久严密的效果。

为使对长敌包围封锁形成社会性的大动员，我围城指挥所提出了广泛宣传群众的要点。其大致内容为：（1）军民总动员，围攻长春，消灭长春的国民党守敌；（2）反对国民党军抢粮抓丁，长春人民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收复长春；（3）不给敌人一粒粮、一根草，把长春的国民党守军困死在城内；（4）反对奸商走私，走私是犯罪行为，严拿走私分子交政府法办；（5）围困长春，保护土地，保护生产，保护粮食，保护壮丁；（6）军民一条心，把长春变成死城，变成敌人的坟墓。

上述宣传口号，很快就通过政府布告、张贴标语、大会宣讲等形式，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开来。

方针既定，我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对长春守敌展开的围困战的战幕从此揭开了。这是一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作战手段。我军夺取大城市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尝试，首次展现在我东北腹地的战场上。

哈尔滨会议时，东北局为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曾决定成立第一、第二两个前线指挥所。并指定由第一“前指”负责长春作战指挥。5月下旬，第一“前指”于长春东南25公里处之李家屯开设。原“吉林前指”和“松江前指”撤销，合并到“第一前指”。后来，随着任务的转变，“第一前指”改称围城指挥所（简称“围指”）。

围城指挥所接受任务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按东北军区总部的命令调整部署。

我“围指”根据肖劲光司令员、肖华政治委员的具体指示，下达了部署命令。整个围城部队划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具体任务区分如下：

以长春市东北之伊通河及长春市西南中长路之孟家屯为分界线，划为东西两个地区队。分界线由东地区队负责。

东地区队：

独立第八师，控制安龙泉以西以南之高地；独立第九师，控制伪满军官学校（现拉拉屯坦克学校）、靠山屯以东之线高地。两师分界线为杨家堡子、杨家店之线，线上各点属独立第九师。独立第六师，配属独立第十一师第一团、九〇野炮1个连、高射机枪1个连，控制黑咀子、广播电台、孟家屯等要点及其附近一线之高地。配属之野炮任务控制长春市自由大路机场，高射炮兵主要控制城南上空。该师与独立第九师分界线为长春市东南之伊通河，线上归独立第九师。第六纵队之第十八师为东地区机动部队，控制于小南屯以北、东西五里桥、新立城一带，随时准备策应独立第六师作战，与独立第六师密切联系。并有于必要时策应独立第九师作战的任务。

以上东地区各部队，直接归围城指挥所指挥。但在紧急情况下，如第十八师策应独立第六师作战时，该师暂归独立第六师首长指挥。

西地区队：

独立第十师控制大房身机场、绿园、上下石虎沟及其附近一线高地；独立第七师控制车家窝棚、班家营子、潭家营子、小东边以南之水塔以及桥梁、上下台子之线诸要点。两师分界线为长洮公路之线。线上属独立第十师。第十二纵队配属野榴

炮3个连，高射炮1个连，为西地区机动部队，位于烧锅店以东地域。任务为及时策应独立第七师、独立第十师作战。同时，亦应准备必要时策应独立第六师方向作战。配属之野榴炮控制宋家洼子及伪满新皇宫（现地质学院）机场。高射炮兵主要任务为控制城北上空。

以上西地区队统归第十二纵队首长直接指挥。

作战部署命令中同时确定，除独立第九师因故暂缓外，各部队均于6月20日进入指定位置。独立第九师于22日到达指定地点。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要立即构筑工事，作为向前发展的支撑点，以便完成对长春守敌的严密封锁。各部队还须详细侦察敌情、地形，研究作战方案。第二步，则要求各部队向前沿前推进，夺取可能夺取之敌人前沿阵地或警戒阵地。夺取后，立即构筑工事加以控制，逐步向敌逼进。①

此时，我第一、六纵队（欠十八师）则后撤整训待命。

上述我承担围困长春这一重大使命的部队，除第六纵队的第十八师外，第十二纵队刚刚组建不久，独立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师也是刚由各地方二线兵团组建的。这些部队的沿革，大致是这样的：

第十二纵队，其基础为新四军三师部分干部为骨干。开始是在西满军区组建的3个独立师，当时也主要活动于西满。1947年冬秋攻势中，参加战斗较多。如攻下德惠，参加解放四平作战在公主岭一带阻击长春出援之敌，攻下伊通县城等等，都是该3个师的联合作战。此后，曾在双阳同敌新编第三十八师交过锋，并一度攻入过长春市区和占领过大房身机场。还到过吉林消灭永吉县城之敌，活捉敌县长。1948年5月下旬，曾配属

第一、六纵队参加过长春外围作战。因此，可以说是活跃长春附近的一支较强的部队。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报请中央军委批准，编为第十二纵队，下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3个师。

独立第六师，原为冀、鲁、豫二十五旅1个团的骨干及延边军区1个团编成。战士和基层干部多数是朝鲜族。上述部队，原属东满军区，活动于吉林附近。于1948年1月10日编为独立第六师，仍活动于吉林地区。

独立第七师，为松江军区第一、二、三军分区的3个独立团和1个特务团组成。于1948年1月10日编为独立第七师，组建后仍属松江军区指挥。当时在九台附近一面整编整训，一面剿匪。

独立第八师，由合江军区2个团编为1个团，东安和依兰军分区2个团编为1个团，牡丹江军区1个团组成。于1948年1月10日在牡丹江编成后，开赴吉林前线。参加围长前，归东满军区指挥。

独立第九师，为嫩江、龙江4个独立团编为3个团组建。于1948年1月10日组建后，到达长春附近。参加围长前，归松江军区指挥。

独立第十师，为辽吉3个独立团编成。参加围长前，归松江军区指挥。

独立第十一师，以原直属东北军区总部之朝鲜支队、东满军区七十二团及牡丹江军区之独立三团编成。于1948年5月正式组建。其第一团曾一度配属独立第六师作战。后该师全部参加围长。

参加围困长春的炮兵部队，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炮兵第四团。

当时参战各师兵员充足，每师均在万人以上，日式装备。团属有八二迫击炮及九二步兵炮，有的师编有山炮营。部队成员有大批老骨干——排以上干部多为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战士，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战士大多为土改后翻身农民，政治素质好，觉悟较高。各独立师虽未参加过较大规模的作战，但各团队在编入师的战斗序列前，几乎都是在同后方政治股匪作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因而，都有一定的实战经验。

被围困封锁了的长敌，景况日趋暗淡。不但断绝了陆地和空运的供应，连一切通讯联系，也只能赖于空中电波了。然而，空中电波只能传递蒋介石、卫立煌对长春守敌爱莫能助的感叹，却寄托不了长春国民党军广大官兵与亲人之间的互相牵挂和眷念。而面对着通信手段如此发达的现代，10万国民党军官兵，却连传递“家书”渠道也被堵塞了，岂不令人慨叹！当然，有人通过飞机空投也曾偶而获得过“万金家书”，但那是很不容易的，并非广大官兵都有如此幸运的机遇。何况，空投下来的信件不易收到，说不定飘落何处，即便收到了，也只能是有来面无往——只有寄托故乡亲人对死守孤城将士们的牵挂和哀怨，却不能复亲人以只字片纸的慰藉，徒增烦恼。

举个例子，我独立第八师曾拾到敌机空投飘落到我阵地上的邮包，其中装了不少长春守敌高级军官们的信件。

应该承认，围困长春的作战手段，对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来说，毕竟是个新的课题。正如当时围城指挥所领导同志所说的：“我封锁敌之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内战与抗战

中我只有反封锁的经验，而缺乏封锁敌人之经验。”随着围困作战的需要，我围城部队各项工作都在陆续展开，在实践中逐步获得了卓著的成绩和可贵的经验。

围长之初，我各围城部队即在“围指”的统一部署下对长春守敌开展了军事侦察。1948年6月30日，“围指”又专门发出侦察工作指示，对敌情搜集工作提出五个察明：一要察明敌外围据点及前沿阵地情况；二要察明伊通河南起肖家堡子、北至上台子一段的情况；三要察明敌人纵深配置以及工事构筑的情况；四要察明敌人内部的情况；五要察明长春市内及周围的兵要地理。指示中按各部队防区划分了地段，明确了任务分工，提出了侦察组织及步骤与具体措施。

在几个月的围长过程中，侦察手段逐渐改进、日臻完善，从而达到了情报来源广泛，内容深入、细致、准确。当时的侦察工作，所以能取得良好的成果，主要靠抓好三件事：一是发动群众，运用群众路线于战术侦察。发挥侦察机构的作用，在侦察业务上实行统一领导，明确侦察目的与计划。由侦察部门指派干部深入群众和基层，进行具体指导与帮助。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大批骨干，解决对大城市攻坚侦察缺乏经验的问题。使之善于体会上级的意图，掌握在执行任务中急切需要的知识。除此以外，还要注意发动与组织3支生力军：即我围城部队——特别是第一线的部队，以及国民党军逃、投、俘官兵和被敌驱逐出城的大批难民。要尽可能把这些人吸收到侦察阵线上来，不可低估他们提供情报的能量。对这些来自多方的情况，要及时掌握，不断地进行科学分析，发现偏差，立即核对纠正。注重树立典型，不断地总结经验，使工作逐步深入。

二是在我军内部，要组织大家，人人动手，实行步、炮、工各兵种及党、政、军各部门的联合侦察。这是因为，侦察的内容要求系统、广泛，不仅要察明外围前沿，还要察明纵深；不仅要察明工事构筑、兵力配备，还要察明兵要地理；对敌军不仅知其表，而且要察其里；不仅限于察明情况，而且要提出判断结论与攻击方法的建议。这就要求做到专职人员与广大指战员、战术侦察与技术侦察、直接侦察与间接侦察、外部侦察与内部侦察协同起来，为着一个侦察目的，严密分工而又有机结合。事实证明，这种多方面而配合的做法十分重要，它可以把多侧面、多角度的情报来源，集中起来得出准确、系统的结论。

三是采取广泛的侦察手段。首要的是实地观察，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侦察方法。对敌人的工事构筑、火力配系以及依据地形情况调制要图、写景图等等，都要通过缜密的观察才能做到。即便化装到敌纵深内，也离不开敏锐地观察和冷静地判断。除此以外，我各围城部队还利用敌逃兵接待站汇集了大量敌人内部的情报，这是靠我们自己的“观察”不易获得的。敌军的逃风愈盛，我们对敌内部了解的就愈详。把投降俘虏官兵口中吐露的情况积累起来，通过多人多口反复核对，最后得出的结论一般是去伪存真。准确可靠的。

但在上述三种做法中，必须注意克服两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挂名”思想，有些单位认为围城是各独立师的事，攻城是主力部队的事，侦察工作好坏与自己关系不大。因而，不认真，不积极，敷衍了事。另一种是经验主义思想，他们以过去的游击战，运动战或对小城镇的攻坚经验，来看待对

敌近代化大城市的攻坚侦察。因而，只注意敌兵力部署，很少注意敌之工事构筑和防御设施；只注意敌之外围前沿，很少注意敌之纵深。特别是忽视对市内的兵要地理（如坚固建筑物、地下道、铁路基、公园、广场等）以及敌军设防情况的侦察。②

总的看，围困长春的侦察工作，可以说达到了“详”与“细”的地步。各围城部队不但对当面之敌了如指掌，而且均整理上报了大量的敌情资料。“围指”整理的《长春匪情汇编》内容详尽，其中包括敌军连长以上的军官名单。解放长春后核对证实，这些侦察资料的准确程度达90%以上。当时“围指”的司令员肖劲光同志回忆说：“那时，城里有什么动向，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情报来的很快。现在看来，当时我军的司令部工作，已有了相当的水平，是值得称道的。”③

我围城各一线部队的野战工事，也是不断完善和逐步加强的。首先构筑堑壕、交通壕，次则指挥所、掩蔽部等等。长春市郊土质松软，工事构筑并不艰难。因而，每靠近敌人一步，工事也越来越趋向完善。多数部队靠近铁路，可取枕木、铁轨做为掩盖与加固之用。时值草木繁茂的夏季，容易伪装。战士们利用这些方便条件，不断地改善工事内的设施。如靠近伊通河的工事内积水被排除了；长时留在阵地上的部队，在工事内盘起了“串地龙”式的散烟炉灶的火炕等等。到了围城的后期，我军阵地野战工事更是层层密密、纵横交错。除了有环城的交通沟保持各部队之间、前沿与指挥所之间的联系外，各部队都有伸向前沿的壕沟，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甚至在地面上见不到一兵一卒，而地下则可机动千军万马。交通沟的最前

沿，有的距敌不到百米，连敌人吃饭都可以看到。围城部队野战工事构筑完备到如此程度，在我军作战史上是罕见的。

在通信联络的组织上，除开设了完备的无线通信网外，从前沿到纵深，均架设了横向和纵向的多路有线通信网。在工事向敌和背敌两个方向，架设了两条通信线路。纵深线路采取了永久性的措施。还架设两条环城线路，一条在封锁区内侧，一条在封锁区外侧。整个对长包围圈形成了一个纵横畅通的有线电话网路。各部队上下联络畅通，指挥灵便，卓有成效地保证了战斗及围城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后勤工作，不但保证了部队的供应，而且非常得力地配合了对敌经济封锁、政治攻心的斗争和我部队驻区的生产救灾活动。曾被敌破坏了的铁路与公路，迅即修复至部队驻区。大量的粮秣和副食品，源源不断地运到第一线围城部队。为了发展生产救灾，改善部队生活，在长春市郊因受战局影响而闲置的土地上种植了秋菜。“围指”要求围城部队每个师，生产蔬菜不得少于100万斤，并上交30万斤。

我各围城部队种菜面积：

第六纵队十八师：525亩；

第十二纵队：1 527亩；

独立第六师：410亩；

独立第七师：1 528亩；

独立第八师：350亩；

独立第十师：400亩；

独立第十一师：410亩。

合计5 771亩。

当时，秋菜长势良好，颇有按计划超产之势。然而，经过辛勤劳动的种植人，并没有得到收获。围长任务结束后，各部队纷纷转移执行其它任务。这些丰硕的劳动成果，交由政府分发给当地人民群众。

在我军包围下，长春市內，人人思危，前景是可怕的。除少数上层官员外，多数人饥肠辘辘。长春守敌一方而要“固守”，另一方面还要把市内几十万人民食口的包袱背起来，我阻止市内人口外流的目的就是促使守敌早日溃不成军，缩短它苟延残喘的时间，早日解放长春，早日拯救长春及其周围人民于水深火热。

我围城部队在长春外围设有10个哨卡。开始，主要是控制人口外流和接待盘查国民党军逃兵。到了后期，这些哨卡有的成了我军放行和收容市内难民外逃的出口。这些哨卡的位置在：宋家洼子以北；崔家营子以东；火烧里以南；大随家窝棚附近；孟家屯附近；欢喜岭附近；獾子洞附近；八里堡附近；东大桥以东；吴家洼子附近。

① 摘引“围指”1948年6月21日围城命令“代电”。

② 摘引1948年9月27日东总《关于战术侦察经验向中央军委的报告》。

③ 摘引肖劲光《久困长围取长春》一文。

经济封锁战线的斗争

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其结局大抵都很悲惨。这是因为，围困的要素是双方军事力量的相较量而形成的，不具备优于对方的兵力，即构不成置对方于困境的态势。而围困的目的，顾名思义，“围”，是要敌人出不来，逃不掉；“困”，则主要是经济封锁，不让敌人从城外得到任何生活资料；所以，“围”是为了“困”，使敌人在困境中削弱，士气沮丧到无力抵抗的程度，尔后攻克之。

10万敌军要在长春城内生存下去，等待蒋介石派兵接应进行反击，那么，吃饭活命是起码的条件。长春守敌不但懂得这一致命要害，而且也早有准备。为了储备粮食，他们煞费心机。早在1948年3月初，吉林省政府即从上调的粮食中，打了一些埋伏。长春市长尚传道，更是虑之在先，在3月4日，就把南京政府中央信托局存在长春的100万斤大豆扣买下来，准备做为市属公教人员和警察等共约七八千人的粮食储备。当然，尚

传道的这番苦心并没有为他的下属捞到多少好处，这批大豆到是帮了长春国民党守军一点小忙。而他的一些下属呢，到头来在杀民养军的政策下，也被列为驱逐出城的对象。这是后话，暂不提。

在我军对长春形成包围之前，长春守敌又向长春四郊及周围各县征调和抢购了一些粮食。这批粮食，大约不下300万斤。我军对长春形成合围的初期，长春守敌在龟缩市内之前，疯狂抢掠粮食和一切生活资料。这些地区，本来已被外围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和土匪们践踏的够苦了！这龟缩前的掠夺就更加残暴：人可以吃的东西抢光了，抢喂马的，谷草没有了，就强行把群众的苦房草扒下来，因为那是靠近伊通河某地区出产的一种草，可以用来喂马。此次洗劫，在城外方圆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几乎无一村庄幸免。因此，在我军围城的初期，长春守敌还有一些储备粮食。所不同者，新编第七军存粮较多，第六十军则靠新编第七军的部分“恩赐”和联勤总部的调拨过日子。不过那时，敌人那些地方部队还可以在市郊靠抢掠吃饭。随着我军包围圈的缩小，这些“山大王”的抢掠“地盘”也就越来越狭小，抢掠的手段，也越来越恶毒。抢到最后，终于被我赶入市内，同国民党军争饭吃去了。

当时，我围城部队的口号是“不让一粒粮、一根草进入长春市内”。6月下旬，我“围指”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东北局、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对长春之敌采取长期围困的重要指示。同时，全面部署了有关围困长春的一系列措施。6月28日，肖华政委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长春有50余万人民，守敌10万，如果我们在空中、陆上，断绝了敌人的生活

资料，严禁城外粮食输入，不让长春与市外来往，现敌空运也已受到阻碍，机场在我控制下。这样，经过二三个月，敌人内部肯定会发生急剧变化。将会造成敌人的饥俄与困难，发生军民交困、军惊民怨、士气瓦解、社会骚乱的局面。敌人的生存条件为我操纵，这时，也正是大举进攻的有利时机。肖华同志还指出，现敌存粮，已难支持很久，粮价急剧增长，高粮米已卖到38万元1斤，蔬菜每斤也要卖八九万元。因此，我们党政军民要全力以赴，一致动员起来，认真执行这一封锁长春的重要任务。事实证明，肖华政委的这些论断和估计是正确的。

“围指”首长号召全体围城部队的指战员充分认识，不让一粒粮一根草进入长春，是我军对敌斗争的策略，也是对敌作战的手段。要求全体指战员克服片面的慈善观点，着眼于大局。应该认识到，长春攻不下来，是长春人民永远的灾难，只有解放了长春，人民才能彻底摆脱灾难。①首长这些话是针对我围城部队有些指战员的实际思想而发的。某些干部、战士，由于对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认识不足，在复杂的经济封锁斗争面前，产生急躁情绪。有的认为，不让群众逃出长春，是不“人道”，对外逃的老百姓抱有怜悯情绪。有的战士把自己的津贴费给了要出来的群众，让他们买饼子吃。也有的战士向群众解释：“没办法，上级的命令，我们同情你们。”有的干部、战士执行封锁任务敷衍了事。有些饥民逃出了敌人的哨卡，进至我军岗哨前，要求到解放区去活命。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与人民的感情休戚相共。他们在战场上打起来是条硬汉，但却禁不住这饥饿的群众苦苦哀告。于是，有些人的心软了下来，不得不擅自放人出卡。我“围指”就对敌实施经济封锁问题，作了

一系列的部署并提出若干具体要求，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粮食、蔬菜、柴草、牛马牲畜等一切生活资料，均不得进入长春市；第二，断绝长春市与我区人员来往及一切商业关系；第三，肃清我边缘区及敌我双方中间地带的一切土匪及一切走私爪牙。

封锁范围，划长春市周围25公里内为封锁地带。参加封锁的以围城部队为主，县区武装（当时各县均有县大队，均有3个连以上的兵力；区有区中队，兵力相当于1个连）、民兵、自卫队等都纳入这支封锁大军，按群众住地及部队防守区域划分，采取从前到后的梯次配置，前后左右互能沟通联系，以弥补空隙。

但是，要真正实现对长春守敌的经济封锁，也并非易事，各方面的斗争非常复杂。在封锁粮食入城的问题上，就是一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封锁开始，我军就注意了封锁的重点地区。因为，执行封锁任务的是以围城部队为主，所以，特别注重了各围城部队之间的结合部，以及地形复杂的地带。如各羊肠小道，以及树木丛林较多之处等等。尤应注意的，是土匪活动较多、我工作较薄弱的地区。

这一类的地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基本上是特务、奸商与地痞流氓的天下，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暗中来往，偷运粮食，什么偷爬呀、带路保险呀，甚至还有有的暗中成立了“粮站”逐点运输，一步步偷运进城。这种情况，中长路附近、以及伊通河沿岸地带较多。走私要道是经过新立城的伊长公路及伊通河两岸和范家屯方向。这些复杂地带和重点地区，在封锁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不但未能杜绝走私分子的活动，反而日益嚣张。仅

据6月中旬统计，这些地区每日平均至少有50—60石（每石约合500市斤）粮食通过走私分子流入长春市。这些走私分子，少则十数人，多则三五十人，用肩扛或背负等方式，向长春市偷运粮食。而且，多在夜间活动。

随着封锁斗争的逐步深入，除严密封锁、加强控制重点地区外，又采取了以下三种措施：一是对敌我经常争夺地区及中间地带，动员地主及广大群众将粮食搬入我区保管；二是以县为单位在封锁区内进行户口调查，对居民发放证明，原国民党发的证明，一律收缴焚毁，停止使用。对外地来人或非本户居民不得收留居住；三是严防敌人疏散长春市内的人口。

为了减少封锁中的漏洞，加强组织领导，便于指挥党政军民齐动员的封锁大军，成立了统一领导机构——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围城部队各师的政治委员为主任，当地县委书记、县长为副主任，并设委员若干。主要任务是统一部署本防区的经济封锁，堵塞漏洞，严密控制不使敌人得到任何生活资料。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开展工作后，立即起了重大作用。统一了领导，明确了分工，配合紧密，消除了依赖思想，加强了责任心；对封锁中出现的漏洞，能及时察觉妥善处理。在当时来说，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出现，对经济封锁斗争，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当时，据我驻卡伦的部队发现，每日粮食市场交易非常活跃，而且粮食去向不明。另据双阳县调查，该县粮食外流量很大，也难辨去向。这些现象说明，我对长敌的经济封锁，还有很大的漏洞。经了解在我对敌实行经济封锁的初期，走私风还难以煞住的时候，靠近封锁边缘区的各地集市贸易非常活跃。而

且，大多粮食交易，如，奢岭口子，每逢双日一集，每集即有粮食交易20至30石。新立城集市则更加“繁荣”，因为那里的粮价高，而且差额很大。譬如1市斤大豆在相隔20里的大南屯只170元（我东北流通券），相隔30里的奢岭口子210元，而新立城每斤大豆却是650元，比大南屯竟贵3—4倍。在新立城，1石大豆（480斤）可以换到1匹驷马。甲地与乙地粮价相差如此悬殊，势必导致我后方粮食向这些集市流动。然后，又通过这些集市流入长春近郊，为走私分子提供了方便。

其实，发生这些情况的原因并不费解。一些接近长春市郊的封锁区，惨遭国民党土匪队的洗劫，灾情严重，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为了应急，我地方政府许可这些灾区的群众到我后方自由购粮，或组织群众以衣物到后方换取粮食。虽有组织，但由于手续不严，一些村屯和部队的连排都可以开证明、路条，以致为粮食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方便。同时，我后方靠近封锁区的各地，粮食缺乏管制，一些村农会可任意发证明给农民到新立城等地卖粮。后来，虽经下令禁止村屯开证明，禁止任意到这些封锁边缘区卖粮；但因这些地区粮价悬殊，获利甚巨，有的农民伪称走亲访友，开出路条，声东击西地达到去集市卖粮的目的。据了解，当时封锁边缘区各村屯，有不少这一类跑经济的“老客”。表面上似是繁荣经济，实际上对封锁长敌极为不利。

基于上述情况，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决定，

一、断绝封锁区内人民自由向非封锁区购粮换粮，同时也严禁靠近封锁线的各区村农会组织任意向封锁区内卖粮或借贷。

二、凡粮食进入封锁区内，必须有军队团以上机关、地方县级以上机关证明，区村政府、部队连营证明无效。

三、严格控制刘家店、奢岭口子、新安堡三集市的粮食贸易，建立粮站，实行专买专卖，取消新立城市集。

四、封锁区内的粮食分配、买卖，凡运粮出门上路，统由我人民政府组织生产救灾委员会安排。

五、加强岗哨、军民联防和群众缉私工作，严格检验与盘查，实行缉私有奖办法。并规定将缉私没收的部分粮食与物资，交由该伙食单位改善生活。如双阳县明令规定，缉私物资提成30%，捉获1名特务奖粮50斤等办法。于是，各地均查获了大量的缉私粮。7月初，双阳县境内之万宝山区，仅3天即没收粮食20 000余斤。独立第八师在双阳境内没收走私粮30 000余斤。②

长春守敌面临着粮荒的危机，便千方百计地设法将数十万市民食口的包袱转嫁于我。于是，粉碎敌人这一阴谋，就成了实现对敌经济封锁的一个重要侧面。敌人采取了若干逼迫群众出城的手段，而且做法一个比一个恶毒：一是强迫市民进入我区，只要赶出哨卡，再不准回城；二是以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为借口，煽动群众要求进入我区；三是与奸商相勾结高价收购，造成粮价奇昂而有价无市，迫使群众不得不外逃奔向我区；四是假借“出击”的名义，将群众胁迫送出城外，驱向我区；五是造谣，说什么“7月1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八路军开口子8天”，欺骗群众出卡，或以集体领粮为名，连同伤兵老弱一起逐出哨卡。

显然，如果我们任凭敌人把这些被洗劫一空的群众赶入我区，其结果将会抵消我对敌经济封锁的效用，有利于敌对长春

固守，而不利我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势必推迟解放长春的时日。这时，前面说过的我军在实行对敌经济封锁初期，存在的执行封锁政策不甚得力的现象已经开始扭转。如独立第八师指战员们经过反复讨论，自订出十项围城纪律：（1）坚决完成封锁任务，不放进一粒粮一根草；（2）严格检查行人，不马虎放过一个人；（3）为解放多数群众，不能为少数人痛哭哀告所动摇；（4）对群众和气耐心，做到逢人宣传；（5）不乱没收，不打埋伏；（6）站稳立场，不受贿；（7）沉着机智处理情况，不乱打枪，不脱离岗位；（8）认真耐心挖好工事，防止敌人出击；（9）反对盲目轻敌，做好战斗准备，坚决消灭出击之敌；（10）发扬吃苦耐劳精神，坚决完成任务。这十条，内容虽简单，但针对性却是很强的。③

继成立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之后，为适应形势任务需要，在我区内又建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地方政府为主，各围城部队有关部门派人参加，负责安排救灾和组织群众生产。当时的长春市郊，居民遭国民党土匪队的抢掠，生活很苦。有的地区有些人几个月没有粮食和盐，仅以野菜充饥，脸肿体虚，且有饿死人的现象。有的被扒走了苦房草，住着露天的房子。有的村群众流离失所，十室九空。许多地区，良田荒芜，有的村屯没种上的地竟达1/3以上，有的虽然下了种，却又撂了荒。原因是土匪抢，群众没有种子，没有粮食，没有牲口。还有的地区，因为“拉锯”了几次，群众思想有顾虑，对我政策有误解，也影响了耕种。

生产救灾委员会首先抓住了救灾工作。但这项工作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一是后方准备了救济粮，却没有运粮工具，一时不能应急；只好动员身体好的青年去背，每人背50斤，还要发

扬互助精神，背回后统一分配。二是有的地区饥民嗷嗷待哺，急待救命，救济工作的方法不能按步就班——先调查，后报告，再批准，等到救济粮发下来，人不知饿死了多少。因此救济的原则，是首先救命。先救急，后救缓；先救将死，后救不致死；先救有病，后救无病；先救贫，后救富（指灾情程度相对而言）；烈军属有优先权，孤寡酌量增加。我围城部队的广大子弟兵，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每人每日节约1两口粮，救济灾民。④

在抓好救灾的基础上，组织群众进行生产。我“围指”的政治机关，向各围城部队发出在各自防区内不得出现荒地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帮助郊区人民群众，把由于敌人骚扰而延误的农时夺回来。要尽可能抢种粮食，种植大秋作物不成即改种晚秋作物。人民政府从后方调来了大批养麦种。于是，我各围城部队均组织了大量的人力与畜力，人民子弟兵与当地广大群众并肩在田野里操作，并肩战斗在对敌实行经济封锁的战线上。我长春郊区军民，与长春守敌仅咫尺之隔，却呈现出一片军民鱼水相融、和平欢乐的场面；长春市郊到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鸡鸣犬吠，人欢马嘶。我民主政府全力组织救灾生产，只吉林省政府即拨救济粮1 000吨，贷款5亿元，并调拨了足够的种子，帮助人民群众生产。

曾几何时，这里还是遭敌摧残的人间地狱！现在，那些悲惨凄凉的景象，不复存在了，长春市内外，宛如两个世界两天，天堂地狱，截然不同。解放了的长春郊区人民，在人民政府领导和人民子弟兵的支援下，迅速排除了国民党土匪部队带来的创伤；生活有着了，生产恢复了，家园重建了；那曾经是

一片凄凉景象的荒野，转瞬间变成丰收在望的庄稼，牛、马、猪、羊，膘肥体壮。劳动人民第一次体验到解放了的欢快。男女老幼，笑逐颜开，在欢笑中生活，在喜悦中劳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彼伏此起；新组织起来的民兵、妇女会、儿童团……活跃于村头巷尾。眼前的这一片景象，冲淡了与敌咫尺相峙的战场气氛，到象是远离前线的老解放区。

然而，只隔了一条环城公路（群众称“圈道”）的那一边，国民党统治下的长春市竟是一座人间地狱！人们吃光了大自然赋予长春的盛夏绿装。凡能往嘴里吞的，都毫不计较酸甜苦辣填到肚子里了，可是，依然难以活命。无论男女老少，大人孩子，那一张张浮肿、灰暗、毫无表情的脸，使人望而生畏。

国民党军在龟缩长春市内前的洗劫抢掠，给城郊近30万人民群众制造了濒于死亡的灾难。愤怒的人民群众，同解放军并肩战斗，又狠狠地吧“饥饿”还给了长春守敌。国民党军在郊区和市内都制造了严重的饥饿灾荒。到头来却自食其果，受到了饥饿灾荒的惩罚。

国民党的杀民养军政策象瘟疫一样，给长春人民撒下了无边的灾难——饥饿与死亡，同时也给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饥饿的封锁圈。6月份，两个正规军——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的粮食供应，高粮米大豆各半，7月份高粮米减到4/10，到了8月初，除新编第七军的新编三十八师每周还能吃上1次少量大米掺多数大豆的“大米饭”以外，第六十军的一八二师尚能用1/3的高粮米做“药引子”掺大豆。其它4个正规师却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大部因领不到军粮而发粮贷金。至于那些地方部队只好以酒

糟、糠麸来充饥活命。但是，有些较高级的国民党官员，却在酒足饭饱之余，投机倒把，从粮价暴涨中攫取黄金和贵重物品，或利用银行尚能通汇谋取暴利。

此外，长春守敌还面临着一个烧柴的大问题。日伪时期做为满洲国首都的长春，有不少装璜门面的建筑物，有许多木料可供国民党军队拆做柴烧。正因如此，长春虽然没有经过攻打，市内没有房木的废墟瓦砾却比比皆是。居民没有拆房子的权力，只好刨马路面上的沥青当做柴烧。这本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国民党军队居然也认为此计可行，就干脆也刨马路沥青做柴烧和准备冬季取暖之用。于是，长春市的柏油马路就非常“壮观”了！到处是一段段、一片片的烂石坑，光滑的街道，成了生过天花后的麻脸，莫说行车，人走，也是坎坷的歧途。

在我军对长春实行经济封锁期间，长春守敌对市内难民问题，曾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封锁初期，守敌为了减轻粮食负担，很想把市民象包袱似地一麸脑地抛给我们，千方百计地促使市民出城，甚至不惜用强行驱逐和各种欺骗的手段，把饥民推向我解放区。我军为了封锁斗争的需要，制止敌人将市民食口的负担转嫁于我，尽可能阻止市民出城。可是，到了封锁后期，国民党军在杀民养军政策的指使下，将大量市民驱之于敌我双方的真空地带。这些难民欲出不得，欲返不能，只有一批批成为饿殍！人民子弟兵对国民党这一惨绝人寰的行径深恶痛绝，决定开放哨卡，收容灾民，并且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设置专门的救灾机构，解救长春灾民。然而，此时的长春守敌，却又一反常态，严锁哨卡，不准饥民外出了。其原因就

是前期，怕城里吃饭的人多了，会加速他们的灭亡；后期，又怕老百姓走光了，只剩下他们“孤家寡人”，不但军事上没了依靠，政治上更加孤立。

-
- ① 参考《围城简报》第1期肖华在政工会议上的报告。
 - ② 引自《围城简报》第1期双阳县委来信。
 - ③ 引自《围城简报》第1期。
 - ④ 引自《围城简报》《围城情况简报》之军事封锁部分。

相机出击 屡屡碰壁

为了执行蒋介石赋予的“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使命，郑洞国在“待援”无望的情况下，不仅在“固守”上费了心机；而且做出了积极地“出击”姿态。他曾说过，“执行持久防御的作战方针，是可以守下去的。”诚然，既要“守”，就要守出个积极姿态来，坐以待毙的守法，是兵家所忌。于是，他想再搞一次大规模的“出击”。这次“出击”，也有几个目的可取：一则可以向蒋介石交帐，以正视听；二则乘机振奋一下久被围困军队的士气；三则力求争得长春防御态势的“主动”，利于苟延残喘时间；四则也想试探一下我围城部队的虚实，侥幸可抓一把，讨点便宜。

可是，对于“相机出击”，郑洞国并非没有吃过苦头。5月下旬长春外围的那次战斗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但郑洞国还是有军事将领的倔犟性格的，为了“效忠党国”，他可以做到“临

危不惧，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他哪里知道，如果说第六十军从吉林侥幸逃至长春，是出我军不意而又准备不及的话；那么，5月下旬那次战斗，所以没能把他那两个半师完全吃掉，也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军在战斗行动上的某种客观原因，造成了他们能够侥幸缩回城里的条件。假如那次战斗，我军能一举全歼“出击”之敌，长春守敌正规军将不是现在的6个师而是3个半师。那时东北战场上的长春将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就很难说了；假如我东北军事领导机关乘我军士气振奋，决心趁热打铁，下达攻城命令，一鼓作气地攻下长春，也就不存在对长春守敌的久困长围了。

长春守敌对5月下旬的出击失利并不服输。他们认为那次失利，由于碰上了共军的主力。而此时他们心里却有些底：对方不过是一些独立师形成的包围圈，集中力量攻击某一个地段，一时是不会碰到硬拳头的回击的。等对方集中兵力赶来，我已达到了出击目的，得到了便宜，“迅速撤回”了。不甘心坐以待毙的长春守敌的第二次大规模“出击”，可以说从6月份就开始了积极的筹划。

1948年7月2日夜，长春市内守敌利用夜暗，机密迅速地调整部署，机动部队。经过精心策划的多路、多梯次地“出击”就要开始了。这次“出击”，接受了5月下旬向西北郊“出击”失利的教训，计划步骤谨慎周密，部队行动诡谲突然。基本要领：一是突破我警戒线后不能伸出过远，抓一把就走，严防被我切断退路、遭我围歼；二是对西北方向不做重点“出击”打算，原因是过去在那里碰过壁，此次即便从那里伸出头去，也无利可图。因为重占机场已无指望，即或夺得机场，跑

道已被破坏，短期不能修复，无法使用，三是考虑到今后唯一出路，是向沈阳方向退却，因而，对这个有可能从此“突围”的方向，不能等闲视之。所以，此次长敌“出击”的重点，是想试探一下我军对长包围圈的南面防守阵地作战能力的虚实。至于向东、向西，都以少量“出击”部队打了一下，那只不过是辅助方向。

7月3日凌晨，敌新编第三十八师一部，向我独立第十师防守阵地的绿园、石虎沟一带发起了冲击。可是，并没有十分恋战，当遭到我独立第十师部队迎头一击后，即溃退缩回长春。

与此同时，敌新编第三十八师的另一股部队，企图由丁家窝棚方向向我发起冲击。因战斗发起前，其尖兵班集体向我投诚，暴露了该股敌人的作战意图，致使“出击”士气顿减。该敌又惟恐在此种士气下，出现更多向我投诚者，故不战自退。至此，敌新编第三十八师向西这一试探的“出击”方向，与我独立第十师的部队两处进行了接触，都碰了钉子，前后战斗不过1个小时，就草草收兵了。

7月4日凌晨，敌新编第三十八师又以1个团的兵力，由火磨公司出动，向我独立第七师的宋家洼于以西谭家营子阵地进犯。经过3次冲锋，均被我击退。这股敌人碰了硬钉子之后，也未恋战，匆匆地缩回市内。

新编第三十八师这支守城的王牌部队，接连两日向西、向北“出击”，都是未及探出头来，一碰硬就缩了回去。至于该师两日作战的战果如何？也未见之于长春守敌发布公报。不过，守城的王牌部队劳师出征，那阵势还是满够雄壮的：枪声密

集，炮声隆隆，军官督战，士兵喊杀——到也显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可是，不知怎么，这支训练有素、美械装备的王牌部队，一经阵前交锋，竟狼狈不堪地撤了回去。两天内三处“出击”，都是如此。如果说该师的战斗力不强，却是长春守敌的主力；如果说该师在此次“出击”作战中别有目的，也令人费解；如此匆忙地打了一阵就跑，到底得了什么便宜、实现了什么目的呢？即便其策应主攻方向作战，也未见明显效果。不过，据我前沿抗击部队观察，敌人除在我前沿丢掉一些尸体外，还有大批伤员，被抬的抬、背的背、搀的搀——一个个哭丧着脸，拖着沉重的步伐，撤回了他们冲击出发的阵地。

就在7月4日当天，长春守敌第六十军暂编第五十二师，也奉命以一部兵力向我独立第九师阵地小河沿、四家子一带“出击”。不过，六十军不象新七军那么“士气旺盛”。只不过是造造声势，故做姿态地枪炮空响了一阵，连一个象样的冲击队形也没见到，就消声匿迹了。

此次的大规模“出击”，向西、向北、向东的情形大抵如此。那么，南面如何呢？南面特别是西南孟家屯方向，是“出击”的重点，是为将来可能向沈阳方向突围的试探，所以，是一场“大打出手”的硬仗。

时隔两天，7月6日拂晓，长春守敌作为试探“出击”重点的一面——长春南面的战斗打响了。敌人仅在这一个地区，即投入了新编第七军之暂编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军之暂编第二十一师共5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西南、正南、东南之我独立第六师（含独十一师一团）和独立第九师防守的阵地“出

击”。西南方向，我独立第六师之孟家屯车站附近、肖家堡子、欢喜岭一带，敌人集中了暂编第六十一师和暂编第二十一师的两至三个团的兵力实施猛攻。这一带，由于紧靠铁路线，是我预计敌人从此突围可能性较大的重点地区，敌人也把“出击”重点选在这里，因此，战斗非常激烈。敌人为了策应西南面的主攻方向，在长春的正南和东南方向，又展开了约两个多团，同时向我攻击。并且，为了牵制我机动兵力，又以新编第三十八师之一部，于长春西面我独立第十师阵地之绿园一带，进行佯动性的“出击”。仅这一天，敌人总共动员了两个半师的兵力。

在孟家屯方向与我独立第六师打得最激烈的，主要是敌暂编第六十一师的部队。当天夜间，该师与新编第三十八师即集结于原满赤医院和七分局（现国防工办招待所）。拂晓前，新编第三十八师由原满赤医院出发，西指我独立第十师阵地，以达牵制我之目的。暂编第六十一师，一部由原七分局出发，指向田家油坊；另一部自原满赤医院出发，指向孟家屯。敌人利用拂晓前的昏暗，隐蔽地向我阵地靠近。

偷赶上那天朝雾很大，能见度很低。敌人首先采取小部队多方向佯动，全面寻我之弱点——翼侧接合部，然后，再集中主力重点突击。有的则狡诈地扮成逃兵模样，向我阵地靠近，以图达到麻痹我之目的。由于能见度低，直到敌人进至距我警戒前沿30—40米远才发现。当即开火阻击，使敌企图偷袭的目的没能达到，不支而退。接着，敌人在其据点的炮火掩护下，采取了多梯次、反复冲击的办法，向我实施猛攻。其每一冲锋队大约40到50人，一次冲击铁击退再次冲击，就象铁浪一样，

一个梯次接一个梯次地连续冲击。我独立第六师是一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部队打得非常勇敢，顽强地击退了敌人多次的轮番冲击。从拂晓激战到下午1时许，结束战斗，敌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我军阵地巍然屹立。

当日拂晓的激战中，坚守在田家油坊的我独立第六师十七团七连的一个排，不得已撤至铁路医院，又由铁路医院撤至孟家屯破红楼。他们奋力抗击着与自己力量相差异常悬殊的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连续冲击，一面等待着援兵的到来。十七团组织了一个加强连（九连）的兵力，在团重机枪连和炮兵连的火力支援下，向占领铁路医院之敌发起猛攻。敌暂编第六十一师支撑不住，连同攻击破红楼之敌一并向田家油坊撤退。我九连追击不舍，迫使敌人退回原七分局一线及红熙街（现红旗街）南面的据点。于6点30分，全部夺回了我阵地。九连的反击获得了成功。

我独立第六师和配属该师作战的独立第十一师一团，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在整个战斗过程中，部队战斗作风是出色的，可以说是沉着机警，英勇顽强。同样，也是以少胜多的一仗，出现了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以少抗多的场面。如我孟家屯方向开始与敌接触时，阵地第一线的警戒只有1个班。战士们坚守阵地，沉着顽强地阻击了敌人，直至主力赶到。

从拂晓到下午1时，历经8—9个小时，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出击”之敌遭受了重创，又灰溜溜地缩回城里。总括此次战斗，敌人投入长春以南（主要是我独立第六师阵地）方向的作战部队，于达5—6个团。仅在肖家堡子和田家油房两处的攻击兵力，起码不少于两个团。然而，6次冲

击，均被我击退，此战共毙、伤、俘敌1 000余。①受到围城指挥所的美誉。

因为这此抗击敌人“出击”作战，是我国城中规模较大、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一次战斗。故此，有必要归纳一下经验体会：

敌人的作战特点：

小部队多方佯动，寻我翼侧与接合部，集中主力重点突击；采用夜暗集结，拂晓攻击，并伪装逃兵乘我警戒疏忽接近阵地，突然发起攻击，依托据点火力支援，每次依40—50人为一队，轮番攻击；动作谨慎，如不成功，即行缩回。

我作战中的体会：

——战前训练务须注重与实战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指战员收到学以致用成效，才能在提高智慧的基础上，坚定完成战斗任务的信心。此次独立第六师的实战中证明，部队在围城以来进行了一个月的有重点的战术与技术训练，在作战中，都应用上了。战术动作与技术运用做到了有机结合，指挥员的指挥能力，也有显著提高。这是因为指战员们感到战时出现的一些情况，颇与平时训练近似，从而真正达到了练为战的效果。

——我围城部队，应时刻防备敌人“出击”或“突围”，要有充分地战斗准备。特别是要反复侦察地形，做到对防守阵地前之地形地物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估计到敌可以利用的地形地物和判断敌可能向我攻击的方向。并测量距离，扫清射界。对敌可利用之地形、以及不利于我之地形，均应想出对策，并选出反击的道路，做出战斗方案与干部具体分工。只有

这样，一旦发生情况，才能心中有数，从容处置。我“围指”主要领导肖劲光司令员，曾亲临独立第六师阵地勘察地形，并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十七团九连反击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他们平时注意研究阵前地形的结果。所以，在反击作战中地形很熟，冲击中顺畅地利用了地形地物，未受任何阻碍，直到冲至距敌10余米处投掷手榴弹时，敌才发觉。当敌向北溃逃时，该连又进行了猛追。从战斗开始到结束，仅用了十几分钟。这正是由于他们战前经常结合战斗任务和地形进行预习，进入实战时则能做到井然有序。人人对自己的动作心中有数，个个沉着而有必胜信心。

——战斗中的指挥员只有在认真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对任务指示明确具体，不失时机。譬如，对出击方向，运动路线，前进、停止、射击、冲锋、追击等各个阶段，均应胸有预案，给下级以明确的指示。只有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地掌握部队，掌握冲击中的战斗队形。如独立第十一师一团的九连九班，向敌冲击时在排长的指挥下，队形与低姿运动地战斗动作，以及对地形地物的利用、保持各组间的联络等等，都做得很好。从而避免了伤亡，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组织好重火器的火力配系，做到与部队作战行动紧密协同，是战斗指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如直射与曲射武器必须按其性能明确分工，有机结合，不失时机地组织火力机动或火器机动，支援部队作战。如独立第十一师一团七连、九连在此次战斗中，火力运用得较好。当敌接近前沿时，突然的火力给敌以很大的杀伤，敌溃窜至隐蔽物后，则以曲射火器射击，连的掷弹筒发挥了很大效力；待敌躲避我曲射火力暴露目

标时；则在以轻重机枪火力大量杀伤敌人的基础上，发起冲锋。很短时间内，即解决了战斗。又如十七团组织九连反击时，团属迫击炮、步兵炮及连属掷弹筒，都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不但压制了敌人的火力，而且有效地消灭了隐蔽物后的死角，为九连的反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要达到大量歼敌的效果，必须大胆地迂回穿插，断敌退路，并发扬独胆勇猛的精神，使刺刀追击与火力追击结合起来，在可能情况下，还可以利用敌人的武器追击敌人。如独立第十一师一团五连一位班长，带1个组勇猛追击敌人，当即捉到敌排长1名，缴冲锋枪1支，该班长即利用自动火器射击敌人，而后再缴到轻机枪一挺，即利用机枪向敌人射击。结果俘敌排长以下5名，缴轻重机枪各1挺，冲锋枪1支，步枪4支，而我无一伤亡。又如十七团九连六班，从敌翼侧以手榴弹击溃了敌人，继续追击投弹，将敌解决，俘敌10余名。这都是刺刀追击与火力追击相结合的范例。但也有的部队，看到当面进攻之敌受挫，军官被打死，又处于不利地形，成群退却时，却未发起猛追与断敌后路，以致坐失歼敌良机。

——反击时机的选择，应选在进攻之敌疲惫之际，或遭我火力杀伤而呈动摇状态。如肖家堡子战斗，十七团七连，就是在我连续数次击退敌冲击后，敌一部已向后撤，另一部在我火力封锁下进退维谷之际，立即发起反击而获胜的。在敌火力旺盛的情况下，施行反击，兵力不必过多，以少数兵力于正面，采取班散队形，积极动作，吸引敌人注意力，麻痹敌人，再集中主要火器于适当位置，区分火力任务，封锁压制敌人，掩护突击队前进；并以一部兵力或火力抄击敌后，断敌退路，造成对

敌人的威胁。如十七团九连反击时，突击队实际上只有1个班的兵力，但却集中了全连的火力及团的步、迫炮火压制敌人的火力。并组织了一部分力量包抄和侧击了敌后，使敌动摇退却，造成反击致胜的良机。

——依工事进行防御（封锁）的部队，不在人多，而在于火力与兵力及工事配备结合得当：加强工事，节省兵力，控制机动力量，适时发起反击，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如6日拂晓，敌以1个连的兵力，在山炮的掩护下，向我肖家堡子十七团阵地进攻时，我在150米宽的正面上，只有1个班的兵力进行抵抗。该班连续击退敌两次冲击，坚持到连的主力到达，击退了敌人。同时，敌在向我攻击中遭我前沿埋设的土造地雷（炸药包、手榴弹，再以木箱装满石头铁块，拉火）杀伤颇多，敌有1个班中我地雷仅逃回4人。我有的部队，构筑工事时忽视坚而和防护能力，遭敌火力压制时不能发扬火力，遂增加了伤亡。

长春守敌的第二次大规模“出击”就此告終了。这次历时4天（7月3日到6日）的试探性地“出击”，投入的兵力起码有4个正规师先后参加了这次“出击”行动（新七军之新编第三十八师，暂编第六十一师；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第五十二师）。仅7月6日这一天，就出动了约两个半师的兵力。从长春守敌这次“出击”的意图看，主要是想试探我围城部署南面战斗力的虚实，是毋庸置疑的。其它方向，都属于对我迷惑的佯动。然而，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分不出主次策应关系的四面出击。7月3日、4日两天，新编第三十八师与暂编第二十一师，分别向西、向北、向东进行了“出击”，均是

“虚晃一招”，见硬即回——这分明不是“出击”的目的。而事隔二三天的7月6日，才在实现目的的主要方向长春以南“大打出手”。真正起到策应作用的，也只是7月6日拂晓，在暂编第六十一师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向南攻击的同时，新编第三十八师向西佯动的那一举。那么，7月3日、4日两天的“出击”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说为了策应主攻方向，却又事隔两天，毫无联系；如果说先为主攻方向试探虚实，而这试探又是失利的，提供不了作战经验参考，也远达不到声东击西的目的。那这主次方向的作战还有什么联系呢？只有失去主攻方向攻击的突然性、徒增对方的警惕防范了。其行动企图令人费解。二是这次“出击”，是暂编第六十一师唱了主角。如果说第六十军的暂编第二十一师、第五十二师出场做衬，不足为怪，因为他们从不被嫡系看重和重用。然而，那守城王牌新编第三十八师，竟西一头、北一头地担任了三四天的“跑龙套”。不知这大才小用、微才重用的安排目的何在？

长春守敌这次“出击”，结果一是损兵折将1 000余人；二是撤离孤城、向沈阳方向突围的一线希望，也基本上付之东流了！从那以后，长春守敌虽然也进行过多次小规模骚扰性的“出击”，那只能叫做有气无力的挣扎，其结果都是一经接触，迅即龟缩市内，丝毫没得过便宜。

① 引自《围困简报》第1期肖家堡子回家油房一线反击战经验介绍。

威力强大的政治攻势

瓦解敌军，是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我军历来的克敌制胜，不只是依靠英勇善战，而且也依靠于对敌军的政治瓦解。我各围城部队自靠近长春守敌以后，就纷纷展开了对敌的政治瓦解工作。

1948年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肖华政委在报告中指出：“要强化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的斗志，减少甚至瓦解敌人的战斗力。”他分析了长春守敌的处境说，“长春的敌人已经断绝了陆上的供援，是一个孤点孤军，军事上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被我束缚并随着我给予打击的重量与围困时间的持久，内部困难必然日益增长，士气也愈益低落颓丧。”他指出在此种局势下，加强对敌的政治攻势异常重要。他强调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在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具体部

署上，肖华政委指出，政治攻势的开展，必须与军事的围困，经济的封锁，密切结合。因为每次军事行动加于敌人的压力，都为政治攻势打开了门路，同样，每次政治攻势也为军事行动打扫了道路。二者互为影响，相互作用。因此他强调，围城的党政军民，都负有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任务。①

“围指”政工会议开过后，7月初，唐天际副政委又在长春东郊召开了围城部队政工科长会议，部署政治瓦解长春守敌的工作。接着，各级相继建立了瓦解敌军的组织，师、团政治部（处）主任亲自担任领导，并设专人管理这项工作。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对敌军政治瓦解——也就是攻心战，迅即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时，我各级地方政府，在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也紧密配合与大力支持我围城部队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各县大队均靠近了长春的周围，各级公安机关积极活跃在围城战线上，各级地方工作的同志，除做好对部队的各项支援保障工作外，也积极投入围城攻心战斗之中。军政军民，形成整体，并肩战斗，配合十分默契。譬如，曾受我“围指”通报表扬的王云波武工队，在洪熙街一带非常活跃。他们不失时机地向敌军、向难民作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敌驱逐出来的伤兵，也推代表找王队长作主，王当即授意他们回去并告诉他们如何进行斗争。

“围指”为了把对敌的攻心战不断推向新的高潮，曾统一领导开展了两次攻心突击周活动。从而启发了广大群众在攻心战术上的创造性，更加充实了斗争的内容。

我军开展的的对长春守敌政治瓦解的这条战线，无论是发动群众面之广，宣传内容之丰富，采取方法之繁多，组织形式之

活泼，持续时间之长久等各方面，都可以说是我军在战场上瓦解敌军的斗争史上所罕见。其中最通用、最简便而效果又最明显的方法，即是阵地前对敌喊话。

对敌喊话，是我对敌政治瓦解斗争中贯彻始终的一种方式。从围城之始，各部队就纷纷使用了这种方法。不过，那时的对敌喊话，从内容到方法都不够完善。一是没有统一组织和规定宣传内容；二是抓不住敌人内部的要害，触不到敌士兵内心的痛痒。内容一般化，如：“老乡们过来吧，我们欢迎你们投诚！”“缴枪不杀！”“放下武器，我们一律优待！”等等。甚至有的说了不符合实际的话：“老乡们过来吧，我们吃的都是大米白面。”不但没有说服力，且容易被敌利用进行反宣传。有的敌军官把士兵们赶入碉堡内，说“这是八路惯用的一套手法，都是欺骗宣传。”敌新编第三十八师的军官还对士兵们说：“三十八师是主力，八路看到可不客气，不扒皮就活埋。”

各部队加强领导后，都组织干部和有一定水平的战士去喊话，后又逐渐发展到营、团机关的同志直接参加喊话。各团宣传队，不但参加前沿喊话，有时还在前沿唱歌，演出小戏剧，形式丰富多采。用硬纸壳或马口铁片摺成可以拢音的土喇叭，在夜深人静时喊话，可以把声音扩散到很远。可是这种直筒喇叭从地堡孔或堑壕沿伸出，往往招致敌人打枪造成伤亡。于是，将直筒改成弯筒，喊话时筒于伸出去，人可以站在一边，发音也很清楚。后来，有的单位发现，话筒长短也影响喊话效果，通常是细长些好，发音清晰。如有的逃兵过来讲：“你们喊话光是嗡嗡响，听不清。”其原因就是筒子短粗。经过一再

改进的喊话筒，成了有力的宣传武器。我独立第十师阵地有的老乡看到话筒笑着说：“这大喇叭就够三十八师受，怪不得兵都往这边跑。”我们的战士说：“这筒子比三八式步枪还顶事。”

“围指”指出，政治攻势就是宣传攻势，其主要手段以喊话为主。喊话内容，要经过充分准备，应以打破敌人的幻想和揭穿其欺骗宣传为目的，避免空洞。因此，喊话的内容好坏是喊话成败的关键。主要是摸准对象，对症下药，少用讽刺口吻，少喊带刺激性的口号。譬如，对新编第三十八师喊“不要替老蒋卖命，欢迎你们投诚”，就打动不了士兵的心，还可能在“投诚”二字上挫了他们的“自尊”；又如“蒋介石是美国的走狗，你们不要再当蒋介石的走狗了”，这类口号更易引起敌士兵的反感，招致他们还骂，出现喊话对吵的情形，对宣传很不利。我独立第十师面对的是敌主力新编第三十八师，较之其它敌人，顽固而高傲。独立十师的部队终于攻下了这个“坚实堡垒”，打开政治攻心的突破口，取得显著成绩。

要想喊出针对性强的内容，就必须充分的了解和分析敌官兵的心理状态。多同敌逃兵谈心，喊出他们压在心里的话，少讲大道理，多说实际事。如对东北籍的士兵，其家乡大多在解放区，就可以将解放区经过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过上了苦尽甜来的翻身日子的情形讲给他们听。并喊“八月中秋快到了，庄稼快收了，你们的父母妻子盼望你回家收割。”对南方的老兵，则要启迪他们的阶级觉悟，如“不要为少数人卖命”，“你们药了为了谁”，“长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有死路一条”等。我独立十师针对敌新编三十八师的特点，喊出“三

十八师的弟兄们，你们想一想，你们是怎样被抓来的，你们的父母妻子在怎样活着，他们不想你们吗？”，“参加过远征抗日是光荣的，现在替蒋介石卖命就不值得了。”我独立第八师组织一八四师海城起义的同志，用云南口音向敌第六十军喊话：

“云南老乡们，我们是一同被蒋介石欺骗来东北当炮灰的。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要为他们卖命了。欢迎你们过来，带武器有奖，愿回家的发路费。”“老乡们，觉醒吧，快从火坑里跳出来！你们现在饿着肚子为什么？过几天解放军就要攻打长春了，那时你们连命都难保！快过来吧，解放军欢迎你们！”这些针对性很强的喊话，很起作用。据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二二团七连的士兵齐贵投诚过来说：“听你们喊怎样被抓来的，父母妻子想不想，我真想大哭一场，当时就决心不干了。”另据原国民党第六十军少将代理参谋长李树民回忆，原一八四师海城起义人员，到长春外围用云南口音对六十军喊话，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士兵一提到家乡，就落泪。

利用投诚人员喊话很有作用，他们可以将他们过来后的实际体会讲给他所熟识的人听，比我们喊效果更好。事先准备好对答内容，但时间不宜过长，时间长了往往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如有的连续喊了几天花以后，敌兵问他：“光说过去让回家，你们为什么没有回家呢？”又如我独立十师要一个名叫韩玉堂的投诚兵喊话。对方听到是韩玉堂的声音便问：“韩玉堂，你说说，八路军对你有什么好处？”韩说：“叫我吃大米吃肉。”对方又逼问：“人家叫你吃了顿好东西，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你说，究竟八路军对你有什么好处？”对方越是

逼得紧，韩玉莹就越是答不上话来。引起对方认为韩是被迫来喊话的，这是个失败的教训。

所以，喊话前的准备工作很重要，特别是要准备好回答对方的反问。这种反问，通常是两种情况：一是对方的好奇；二是敌人有组织、有计划的干扰挑衅。所以，喊话前要充分估计到所喊的内容，对方可能提出什么反问，敌人可能从哪些方面钻空子，如何驳倒它。例如我们的战士在前沿唱了一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子，对方马上问：“你们说，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我们及时地做了解答，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敌人对我们的喊话很恼火，很害怕，他们也组织了一些人到前沿来，一方面监视士兵，一方面对我进行荒谬的质问或谩骂。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应力争主动，不给敌以更多的说话机会，并抓住他们话里的矛盾，进行有力的反击，使他们在士兵面前威信扫地。有一次，新编三十八师之敌向我独立十师阵地挑衅。他们喊：“八路弟兄们，过来吧，我们这里有大米白面吃。”我战士反问：“三十八师的弟兄们，你们现在吃的是什么呢？”

敌人不做正面回答，又喊：“八路弟兄们，过来吧，愿干的干，不愿干的就放你回家。”

我战士又反问：“三十八师的弟兄们，你们自己能不能出得来呀？”

敌又喊：“过来吧，我们派飞机送你回家。”

我战士问：“三十八师的弟兄们，你们的飞机能不能落下来呢？”

敌人暂时哑口了，我们的战士乘机喊道：“三十八师的弟兄们，看到了没有，他们不但欺骗你们，还想欺骗我们呢！”

这着失败了，敌人还有第二着：荒谬的质问和漫骂。如“你们挂的是什么国旗呀？”“你们为什么要向斯大林敬礼？”“你们打的敌人又是哪国人呀？”等等。如无充分准备，就很可能回答不出。

这一着不灵，他们还有更下流的一着：把他们的政工队员、宣传队员，甚至妓女，都弄到前沿上来。我们喊话他们就唱，或乱喊乱叫。如有的妓女唱：“八路哥哥呀，你们过来吧，我们等着嫁你呀。”有时，说不出理，就泼口大骂。我喊话人员的做法是隐蔽好，你听也喊，不听也喊；就是不与敌对打对骂，表现了应有的政治风度。因此可以说，对敌喊话的本身，也同时教育了我们自己的战士，他们更加深刻理解了我军对敌军人员的具体政策，每天喊话也等于给战士上了政治课。

每当入夜，我阵地上喊话声不绝，敌军阵地反而鸦雀无声，说明他们在静听。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静静的敌方阵地，突然恶声恶语叫骂起来或打一阵子乱枪。事后，又静下来，对方主动喊话：“现在你们说吧，方才是当官的来了”。就这样，我们的喊话时间从夜深延续到天明，从不间断。最好的时机，是后半夜两点敌军查过哨以后，非常宁静。一个逃过来的士兵说：“每到后半夜你们喊话时，我就偷偷地叫起亲近人在工事里听。”喊话对象是士兵，但也要注意到下级军官。向兵喊话时如笼统强调官长坏，而无上下好坏之分，就会引起一般下级军官对我仇恨，增强他们的顽固性。因此我们喊：“你们的高级官长净欺骗你们。”这就对下级军官采取了争取

的态度。

随着我军围城时间的增长，我围城部队对当面之敌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因之，喊话内容的针对性也越强了。又由于敌士兵和下级军官出城投诚者愈来愈多，敌内部情况和敌人的内幕也暴露得更具体。我们掌握了这些情况，喊话时就可以指名道姓地呼叫某些人，指出他们的要害和隐痛。这种攻心方式，可以直接刺到对方的心坎上，就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受到感动。中秋节，我有的部队组织南方籍的战士唱家乡小调，触动了国民党官兵的悲愤思乡情绪。第二天，出来投诚的敌兵说：

“昨晚你们那些曲调悠扬的歌，唱得我们心酸了，你们的箫把我们都吹哭了。”我独立十师面对着敌新编三十八师，由于他们的喊话，该师一一二团七连的1名曾参加过远征军的班长唐国华，带领全班携械向我投城，使整个新编第七军为之震动。新编三十八师副师长当即到一一二团讲话说：“唐国华等人被八路活埋了。”可是，紧接着唐国华等人就在我前沿阵地向敌人喊话，有力地揭穿了敌副师长的谎言。

我有些围城部队，通过前沿喊话逐渐熟悉了对方，从而开展了不见而的“交友”工作。如缝制一些袋子，里面装上食物、用品和宣传品，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晚上喊话时通知对方去取。或通过难民、小孩子、老百姓直接把东西送过去。敌兵在没有军官监督的情况下，很乐于接受这些礼物和宣传品。士兵接到宣传品都争着看，背冲锋枪的班排长们也看。后来，发展到我前沿部队改善伙食时，也送给他们一点，如馒头、烙饼、大米饭等等。我独立十师二十九团六连在“八一”建军节那天给对面阵地上的敌人送去了大米饭，用望远镜观

察，敌兵都在狼吞虎咽地争食。八月十五日那天部队吃烙饼，当即利用小孩子给敌前沿那个班送去了几张饼和宣传品。敌兵在争抢吃饼时说：“八路军吃的真好，还吃面呢。”还有的说：“叫八路军弟兄们来玩吧，没关系，官儿都到城里开会去了。”敌一一二团最前沿的1个排，其中1个班和我关系很好，三次送去宣传品，三次回了信，内容都不错。有一次回信中说：“我们班里8个人，两个到城里去受训，今天可能回来，有轻机枪2挺、冲锋式1支，将来一定过来。”我前沿部队立即回信表示欢迎，并送去了5斤白面。敌兵们在地堡里做着吃，并问送面的小孩：“我们过去了，八路军能不能叫我们回家……”后来敌排长知道了此事，也动心了。有一次送饼给他们，敌排长也回信说：“我们南方人吃不惯饼，最好给些大米吃。”他们得到大米后，那排长回信表示感谢说：“我们有两个病号去休养了，回来一定行动。今后一定对得起你们。”

还有的单位发展到与敌人阵地联欢。这种形式，可以说是在长春围困战中的一种别开生面的对敌攻心形式。一种方式是在敌前沿前布置敌军士兵俱乐部，插各种各样的宣传旗子，上写“出路星”、“救命星”、“光荣起义”等口号。先是用留声机给敌军播送两次音乐，接着，我们的战士就演唱流行小调、奏悲哀的乐曲、数快板、对口唱等节目。这种办法很能打动敌兵思乡观念。在洪熙街举行的那次联欢会，当场就有两名士兵携枪过来了。第二种方式是干脆将敌军阵地上的官兵请到自己的阵地上，先由他们叙述一下国民党军内部的情况；然后我前沿阵地的同志讲一讲我军的政策，招将他们吃顿饱饭，再让他们回去扩大宣传。还有一种方式是在阵地前沿举行敌军党兵来投欢

理会，请逃兵吃饭，向逃兵讲话，宣传我优待俘虏及逃兵的政策，并请地方群众参加。在我独立十师部队采取这种办法时，当场就有逃兵站起来，要求回去再动员几个出来，结果回去2人，带出5名携枪的逃兵。

向敌人散发宣传品的渠道也非常广。我各类宣传品均由“围指”统一印制，由各部队散发。并规定围城各师除可以酌情翻印“围指”下发的宣传品外，原则上不得自行编制带有政策性的宣传品。“围指”下发的宣传品内容极为丰富，多达100余种。其中有〈告东北国民党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蒋军投诚兵通行证”和有关我军在其它战区大捷的捷报传单等等。我独立十师还经“围指”准许，自编印了〈告三十八师各官佐〉、〈告三十八师弟兄书〉以及〈唐国华等告三十八师弟兄们〉等。这些宣传品的内容，大多是讲清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各项政策，给国民党军官兵指示光明出路。如在〈告长春蒋军官兵书〉中，指示了三条出路：一是退却，这很大可能在途中被歼，即便到沈阳，也摆脱不了被困挨饿，而且呆不了多久，还得逃跑。二是困守，其结果不被饿死，到冬天也得被冻死。三是投城或起义，这才是光明的道路，到解放区，可以分地，可以工作，也可以就学。在〈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中指出：“三逃健儿要牢记炮轰五华山事件”，号召他们弃暗投明。

把这些宣传品送到长春守敌手中，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用迫击炮向敌阵地或城内发射；假难民出入之便，委托捎带；用树条做弓，将宣传品缚在箭杆上，射到敌前沿。通过游

动哨和侦察员散发；利用投诚官兵（有条件）返回城里时携带，去伊通河和南湖上放小船漂到城里，给敌前沿的士兵送礼送饭时夹带进去。如我独立八师曾借中秋节之机，在九台县制做了大量月饼，每块月饼中间都夹有宣传品。有的宣传品写道：“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以节日送礼的方式，分头送往敌阵地。

在我围城期间，散发的宣传品多达百万余份。在敌人的工事里、大街上和沿街的墙壁上到处都有，甚至在长春市内的中正大街（现斯大林大街）上，随时都可以拾到我军的传单。在靠近郊区地段我军的大字标语竟出现在大街的墙壁上。这种连续而强大的政治攻势，对瓦解敌军士气发挥了巨大作用，卓有成效地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虽然有时似未收立竿见影之效，但却在长春守敌的广大官兵中，埋下了能够发芽生根的种子，一旦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就可以充分暴发它的能量。②

我围城部队的宣传攻势愈是活跃，长春守敌就愈是感到末日临头的不安和畏惧。在我喊话时，他们就把士兵赶到碉堡里；喊话过后即集合部队训话：“别听八路那套胡扯，你过去放你回家？他们那里60多岁的老头还抬担架哩。”还有的敌人，在我喊话时，除集中火力射击外，并秘密迁回到我喊话地点，埋地雷，或捕捉我喊话人员。尽管如此，难以控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逃风仍旧日趋增长。军队无法巩固了。于是，敌人采取了一系列的严控手段，如实行连坐法，如强查哨制度，进行欺骗宣传，派遣大量特务控制部队，下令凡收藏和看八路传单者枪毙，等等……这些做法所起的作用如何呢？据说在当

时长春国民党守军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连坐法办，促成集体投降，杀身成仁，变做保身倒蒋。一批批地跑，一群群地投，打完了，守完了，跑完了。”③

当时，有许多投诚官兵，带着我散发的宣传品出城，表示他们是看了我们的宣传品，受到启发教育才出来的。特别是“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在长春守敌的广大官兵中倍受重视，一旦得到立即珍藏；许多俘虏和投诚人员手里都有，没有的人，就想方设法地弄到手，如国民党暂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的弟弟就曾派人出城向我独立九师方向购买通行证。

政治攻势最显著的成效，是长春守敌大量向我投诚。请看下面的不完全统计：

起止月日	敌正规军	地方军	合计
6月25日*~7月31日	3 796	1 678	5 475
8月1日~8月31日	3 754	2 236	5 991
9月1日~9月30日	2 315	3 432	5 749
总 计	9 865	7 346	17 215

以上数字刊载于我《围城简报》第4期。不久，《围城简报》又刊登补充统计，记载了8月16~9月30日，我收容投诚者的数字：

新编第七军	358人
第六十军	395人
地方军	1 650人
小 计	2 401人
与以上总计：	19 612人。

* 6月25日为“围指”布置此项工作开始日。

另外，仅就6—8月3个月份的不完全统计，长春守敌向我投诚官兵携带的武器计有：步枪2 952支，短枪267支，冲锋枪69支，轻机枪34挺，六〇炮3门，共3 325件。另有子弹92 733发，炮弹49发。“连坐法”的实行，恰恰说明长春守敌在我强大政治攻势面前，一筹莫展，被逼得走投无路而采取的愚蠢暴政。

“连坐法”规定可谓严矣：3人1组，1人逃跑两人受罚；两人逃跑，1人枪决。每连逃跑3人，将连长交军法处法办，军政人员，超过哨卡30米者，射杀毋论。其结果如何呢？它不仅没有煞住逃风，反面促使下级官兵集体携械投诚和逃跑。如敌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一团二连在长春火车站拆民房时，有5名士兵携械逃跑，连长怕被法办，竟果断地带领全连向我投诚。④从我军围困长春开始，到六十军起义，我军共收容敌集体投诚者：57个整班，10个整排，3个整连。此数并不包括第六十军起义后，新编第七军投降前、处于散乱状态时，纷纷向我投诚者在内。

以上是当时可以看到的立竿见影的成效。如果问我军政治攻势对长春守敌还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那么，从1948年10月17日六十军光荣起义之后，再看新编第七军内部的情形就一清二楚了：尽管上面还要挣扎顽抗，基层却不为他们做主：整班、整排、整连向我投诚，上层想要控制也无能为力，最后，只得放下武器投诚。

在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中，我围城部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如独立第八师二团二连四班长李凤春同志，就是一位坚定掌握执行封锁政策和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不怕疲劳和牺牲的功臣。曾受到“围指”通报表扬。

对长春守敌实施政治攻势的另一种办法，就是尽可能把一些能够遣送到长春市的人，派遣进去。如过去在战场上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官，经教育后，选择表现较好者，送回长春。此项工作，我围城西地区队开展得较好。这些遣回人员大多数对瓦解敌军起了作用。另一方面，六十军从吉林撤退时和撤退途中，丢下了一大批家属。我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把这些人收容起来，进行一些政策教育，然后，带上我军给他们亲人的书信，送到长春市，使其全家团聚。这些家属到长春后，现身说法，客观地宣传了解放军的俘虏政策，在敌人内部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叙述了。

综合上述情况说明，我军对长春守敌所采取的“攻心为上”战术，不但卓有成效地大量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而且在敌军上层无法抗拒的情况下，从思想上解除了下层广大官兵的武装，为我军不攻而破地解放长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引自《围城简报》第1期。

② 参考《围城简报》第2期。

③ 引自《吉林市文史资料》第3辑。

④ 参考《围城简报》第3期。

断绝粮源的守敌

长春守敌十分清楚，能不能“固守”，能守多久，关键取决于有没有粮食，一旦没有饭吃，工事再坚回，武器再精良，也无济于事。因此，郑洞国来到长春后，就千方百计地搜刮粮食。从3月份起，他就责成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抢购，并拨给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和保安旅等单位大量东北流通券，要他们自行采购。到5月份，已抢购到约300万斤左右，加上长春市长尚传道扣买南京政府存放的那100万斤大豆，共约400万斤。到5月下旬，我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对长春形成了四面合围的局面后，就断绝了敌人从市外搜刮粮食的来源。敌人搜刮了两个多月的粮食，满打满算不足10万守军食用1个月。全市经过人口清查和存粮摸底，市民的口粮也只能维持到7月底。那8月份以后的日子又怎么过？长春守敌已经意识到，市内的老百姓也几乎没有多少“油水”可榨

了。

1948年3月以前，长春只驻有新编第七军和一些地方部队。那时，新编第七军的编食供应由联勤总部十六支部负责，比较充裕。好在那些地方土杂部队多为收编的土匪武装，平时抢掠成性，虽然把他们驱赶到市郊，仍旧可以靠着迫害老百姓、打“活食”吃过日子。六十军撤到长春以后，长春与沈阳的陆上交通虽然时断时续，尚可勉强维持。空中交通，还控制着大房身机场和宽城子机场。国民党东北长官部派驻长春的空军人员和后勤补给人员仍照常工作。因此，长春市虽然增加了数万军队，粮慌问题，并不突出，市面依旧生意照常。自5月份我军开始合围后，外围据点逐步放弃向市内收缩，那些打“活食”吃的土匪队伍，也被赶到市内来了。此时的空运，虽然在维持，但却没把运输口粮做为重点。大多是来时运军用物资，回程则撤退空军的设编器材，兼理民间疏散。由于形势日益紧张，一些有钱者争相逃离长春，掌握空运者，提高票价，借机大发其财。于是，长春市内的粮慌问题，就开始突出了。市场也因货源断绝，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宛如决了堤的洪水，任何力量也无法控制。守军日子不好过，市民更是灾难临头。一个好端端的长春市，顿时变成了一座凄凉的死城。

郑洞国、尚传道等人曾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大意是为了“面守”长春，要把市内人民的一切粮食和物资全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这就是蒋介石对长春守敌亲自下达的第一道“杀民养军”的政令。郑洞国拟将此令由尚传道施行。尚传道生怕照此办理会引起长春人民的“骚乱”，拒绝执行。同时向郑提出：“所谓尽收物

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7月底，8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郑洞国无奈，只好责成尚传道搞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办法”中规定，只准市民每人留自食粮到9月底，共135斤，剩余的粮食，一半卖给政府做军粮，一半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买卖粮食按政府议定的价格，不准哄抬粮价，违者从严处以极刑。草稿拟成后，经郑洞国核准，以一兵团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公布。到了7月1日，更下明令规定：凡麦子、麸子、糠粃、豆粉等类，均列为管制粮食。有的用高粮变换为麸子、糠粃，打算多吃几天的，也因超出了规定的斤数，被查收。尚传道还亲自到市场检查粮价，并杀一儆百，处决了3名哄抬粮价情节严重的商人。①这就是蒋介石和长敌杀民养军政策的第一步骤。

国民党东北长官部对长春空运问题不能说不重视。1948年3月24日，曾在长春专门召开过空运工作会议。对长春空运问题数过具体安排。决定从4月5日开始，空运起点为沈阳，接受单位为长春补给区十六支部。确定空运物资为军械弹药、通讯器材、粮秣被服等等。第一次空运，4月5日来机4架，降于大房身机场。由于当时粮食问题尚未十分“紧张”，因而运来的是些通讯器材、卫生药品。第二次空运，为4月6日，运来的仍是通讯器材，还有胶鞋。在第三次空运回程起飞时，遭我炮击，1架飞机被击毁、停运一周后，改用宽城子机场。到5月3日止，每日飞机3架，运输物资主要为枪械弹药。5月4日那天，飞机4架，往返两次，最后一架飞机起飞时遭我炮击，虽未致毁，但却因此停运到5月10日。5月10日后，又陆续开始空运。5月7日，又遭我炮火袭击。至此，敌空运告

停，改为空投。如上所述，长春守敌在4—5月间虽然空运尚较得手，但运输的物资绝大多数是军械装备，粮秣却没运来多少。

到了6—7月间，长春外围据点全部被我扫清，原来方圆数万平方公里的国民党统治区，都成了解放区。长春市粮食来源，彻底断绝了。大房身机场被我占领，机场跑道被我独立第七师用炸药炸坏。宽城子机场也相继为我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守军，只得仰赖于空投过日子。

6月11日，长春守敌组成了空投接收委员会，由联勤总部交通主任张伯僚为主任。从6月12日起，由沈阳起飞的运输机每日可保持5—10架次抵长空投。两个空投场，一是新七军的中山公园，一是六十军的南岭运动场（即跑马场）。因东西两个守备区人数大抵相等，规定飞机架次数以及投粮数大致相同。

最初一段时期，空投飞机每日少则5—6架，多则10余架。所投粮食以大米为主，兼有少量面粉，以后则全部是大米。以2—3袋或4—5袋为1捆，用降落伞降落。6月18日以后，伞降空投渐减，用麻袋或面袋，直接下投。这投法，落于平地尚好，粮袋摔碎也不致为害，有的落到居民房顶或人的头顶上，就可谓祸从天降，无从防范了。即便如此，空投机数和次数也日渐减少，有时3—5日才乘天气好来空投1次。这期间，尽管空投次数渐少，在我高射火器尚未配置于长春市郊之前，敌机抵长春上空后，还可以低飞、慢飞，按预定空投地区落点效果尚好，很少飘出市区和两军防地。米袋坠地也很少破裂，损失尚微。7月份以后，我军高射炮火从四面八方控制了

长春上空，敌机临空，立即遭我高炮火力袭击。从地面就可以观察到，我高射炮弹炸点的火花，始终不离敌机前后左右，敌机如惊弓之鸟，不敢低飞和慢飞。胆小的敌驾驶员们为了勉强完成任务，只好躲在云层之上作漫无目标的高空投掷。有的甚至没临长春上空，即抛下空投物资仓惶逃去。因此，白色的降落伞，黄色的麻袋包，经常一包包地落到我阵地上来。其中有大米、白面、服装、弹药、电池……甚至还有整个的肥猪肉片子。有的落在敌我之间的空隙地带，我即以火力封锁阻止敌人去取，待夜暗时我取回或让老百姓得到手。据不完全统计，仅敌空投大米一项，为我军得到者即3 000余包。这些落到我军阵地上的空中飞来的“礼物”，我照收不误，不打收条。能吃的，能用的，都物尽其用，派做用场。如我独立九师“八一”建军节举行庆功大会，那隆重的大会会场主席台，就是用降落伞搭成的。战士们风趣地说：“这运输大队想的还真周到，知道咱们没有大礼堂，在露天开大会，连布置会场的材料都给送来了。”

长春守敌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自己的飞机，把大量应该得到的粮食和物资降到我军阵地上，十分恼火，埋怨飞机飞得高（三四千米），不按规定办法投掷，骂他们贪生怕死不负责任，甚至归咎于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寻机报复。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因为空投下来的许多麻袋里竟装满了砖头石块。不是航空人员贪污，就是有意对长春守军进行嘲弄。即便投入城内的，也由于敌机仓惶乱投，兼之受风向影响，能够投入预定地区的也寥寥无几。据说，有对空投一次敌人得到的粮食尚不足2 000斤，真是杯水车

薪。有的居民，甘愿遭房倒屋塌之险，也梦寐以求“天赐”粮食以济活命。有些空投粮食被饥饿的士兵或贪污的军官私下分掉。郑洞国规定由兵团部统一搜集投下来的粮食，统筹分配各部队，但每当空投飞机来时，有的部队便立即升火烧水，等待米包落到附近，便马上抢来倒进锅里，待收集者赶来，生米已变成了熟饭。士兵们说：“要我们卖命打仗，让我们吃饱了肚子再去死，并不算过高要求吧？”尽管郑洞国三令五申，亲自签名发出布告，洞之以“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行抢走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如数收齐。

其实，想依靠空投来解决10万守军的口粮，不啻为墙上画饼。守敌10万，每天每人以1.5斤计算，每日需粮15万斤。而大型敌机每架最多载6 000斤。7—8月份以后，每隔3—5天才能空投1次，最多4—5架次。何况阴雨天气根本不能空投，即令毫无损失，每3—4天才能收到20 000斤粮食，平均每人每天半两，真是杯水车薪！

然而，尽管空投粮食为数如此区区，长春守敌的两个正规军却都虎视眈眈，嫡系与滇系为此矛盾日益加剧。由于两个空投场，一个是中山公园在长春市内西北部，一个是运动场在长春市内东南部。入秋之后，多半刮西北风，因而，落到东南部运动场方向的粮食较多。新编第七军大为恼火，故经常发生两个军争夺粮食的事件。郑洞国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废除原定东西守备区，各收各空投粮的规定。改为各自搜集后，如实具报，由兵团部统一分配的办法。但是，新编第七军强调他们的人数比第六十军多，反对平均分配。第六十军则认为新编第七军有储粮，缺乏同舟共济的风格。郑洞国心里明白，新编第七

军久驻长春确有私储，有的军官，不但囤积居奇了粮食，而且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在粮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从中谋取暴利；从吉林撤来长春的第六十军，则两手空空，筹划一口吃一口，粮食确难果腹。可是，郑洞国却以“惟恐发生意外，不能操之过急”为托词，听之任之，不做公平合理的处置。一面出布食重申严禁市民隐瞒“误投”军粮，必须如数报交，违者严予论处；一面向沈阳“剿总”空投指挥部提出改进空投办法的意见。结果，被对方强调因避我军之高射炮火以及气候、风力等影响的理由而碰回。仍按原办法空投，损失依旧有增无减。

郑洞国为了避免纠纷，又采取由兵团部统一组织，抽调两个军的人员，组成搜集空投粮食指挥部。并指定市中心之中正广场为唯一的空投场地，统一收集后，由兵团仓库储存，再行分配。但这种做法却又给新编第七军提供了方便，因为兵团仓库在新粮第七军的驻地，空投场地也属于新编第七军防区，他们可以近水楼台，监守自盗。第六十军的广大官兵，虽然愤懑不平，也无可奈何。

空投的办法不能改进，飞机不敢低飞，投下的粮食依旧损耗很大。郑洞下令用坦克将南岭地区的一条柏油路两旁的建筑物和树木一律推平，辟成一条可候空运飞机起降的跑道。跑道修好后，第一架飞机刚刚降落，我军炮火接踵而至，敌机仓惶飞走。

据当时我军从敌内部得悉，敌于8月1日开始，空投物资中有少量食盐及日用品、慰问品；并拟改为夜间空投，不知何故未能实现。9月，东北“剿总”声称“机油两缺”，由应付性的数日一次空投，到完全停止空运给养。据敌内部透露，长

春守敌获得空投粮食的总数，不超过300吨，每人平均6斤，按每日每人1.5斤计算，只够4天的口粮。②这一场兴师动众的空投，其收获竟如此少得可怜！当然，这里可能并不包括文武官员贪污自肥的损失数字。

中断了空投，长春守敌失去了仅有的一点希望。往常，军队也好，市民也好，日日盼望的是能有个晴朗的天气。就军队说来，天气好，就有空投希望；在市民说来，飞机来了，也希望于侥幸中“天官赐福”。可现在，天气再好也没指望了！存粮日趋减少，特别是第六十军和一些地方部队，更是日不果腹，无奈只好找寻其它可代为粮食的物品。于是，尚传道扣买的那100万斤大豆，就派上了用场。自此，新编第七军改食大米掺黄豆的白米饭，第六十军则食高粮米掺黄豆的红米饭。大豆虽是佳品，但因含油量高，多食并非所宜，发生腹泻的人不少。不过，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除开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地方土杂部队和居民，谁能吃得上？

长春守敌的口粮供应虽然日益减少，也难以为继。第六十军由过去的每天1斤粮，减到5两、4两，最后连2两粮也难以分到了。绝大多数官兵饥不择食，只得挖野菜喝稀粥过活。至于保安旅、骑兵旅等地方部队，好在他们吃“活食”习惯了，则划定一个地区，由他们去抢到什么就吃什么。一些部队买不到蔬菜，就去抢、去偷，有的单位每班经常派一个人去偷菜。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裤腿虽、衬衣里装得鼓鼓的“专职”偷菜士兵。由于饥饿，很多士兵面部浮肿，染上了夜盲症。正如第六十军的逃兵所说的，“个个都耷拉着头，捂着肚子拉稀。”第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要求曾泽生向新

编第七军新三十八师借粮。曾泽生请求郑洞国批准，郑却推诿让他去找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而李鸿则当面拒绝借粮，使曾泽生很难堪。两个军驻地虽仅一道之隔，却有天壤之别，一边还有大米吃，一边则麸子掺豆饼也难以维持。这极不公平的待遇，引起矛盾日趋尖锐。新编第七军与第六十军之间摩擦时起，双方士兵曾在中正广场发生鸣枪冲突。③

早在1948年的6月，长春守敌就已根据东北“剿总”政务委员会的电令，成立了“吉林省粮食郑购委员会”。由郑洞国亲任主任，曾泽生、李鸿、尚传道和吉林省财政厅长侯景文等任副主任。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执行蒋介石杀民养军政策的办事机构。所谓“粮食筹购”，就是在长春彻底断绝外界粮源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在市内搜刮军粮。采用的手段，是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印发的大额本票，将市内人民手里仅有的一点活命粮食，骗掠殆尽，用来养活长春守军。初期，还可以由军粮筹购委员会“郑购”来粮食拨给军队。到了7月份以后，“筹购”粮食已很困难，便把大额本票发给军队自行“筹购”。这个委员会，也就变成了转发中央银行“本票”的机构，让军队自己去操刀杀民了。④

在军民争食的严重局面下，军队赤膊上阵，强制向民间“征购粮食”。这种所谓“征购”，不啻为抢。因为市民中的“余粮”早已搜刮罄尽，仅有的，也不过是一两日之炊，如此情况，卖粮岂不等子卖命！只有准备逃生出走的人家，被迫不得不把粮食卖掉，面索值则要比官价高若干倍。市内粮价一日三跃：6月上旬每斤5.6万元，6月中旬每斤22万元，6月下旬每斤80万元，7月上旬每斤350万元，7月中旬每斤720万

元，7月底，3 650万元。如每斤高粮米按3000粒计算，每粒要1 200元。黄豆1 130万元。蔬菜每斤17 000元。飞机投下来的10 000元票额的钞票已无用处。5 000万元票额的中央银行钞票，以及长春分行发行的票额1亿元的“本票”充斥市面。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谚语说：“本票、本票，几千万买不到一个烧饼、半根油条；擦屁股不顶用，买手纸也买不到！”^⑤老百姓如此，国民党军的官兵们也有牢骚。士兵们的顺口溜说：“豆饼面子是好饭，提心吊胆把岗站；心一横来牙一咬，去投八路见晴天！”军官们的顺口溜是：“中央军官有三怕：一怕光发本票不发粮，二怕战场打黑枪，三怕当兵的不打仗，成队成帮去投降。”^⑥

这是当时被困的长春市内国民党官兵的心理写照和民怨沸腾的反映。

国民党军手中拿了大量的“本票”也买不到颗粒粮食，只好到居民家里去搜抢了。原是动员自愿出售，此时变为迫售抢购，原规定按住户人口可以留1—2个月的口粮，而今变成“竭宅取粮”、搜粮抢粮。造成市民无以为生，抛家弃业，妻离子散而逃亡的悲惨景象。有些不愿走的，或老病残废无法逃走的，只好吃酒糟和蔬菜草根。也有为获得一点糊口食物卖儿卖女的。真是惨象横生，目不忍睹。满城阴森，如同鬼域。饥饿的敌军士兵发现谁家的烟囱冒烟，就去抢粮。搞得居民即便有点可以入口的食物，也不敢举炊。

国民党的正规军尚且如此，那些土著的地方部队就更加无着了。他们在市内实在无糟可抢，就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到郊区去抢粮。8月5日，吉林保安旅两个营进犯市郊宋家

洼子抢粮，遭我独立第七师迎头痛击而返。8月29日，敌骑兵一旅800余人复窜入宋家洼子抢粮，经过激战，伤亡400余人之后，狼狈逃回老巢。8月30日，号称国民党义勇军的部队，约两个团的兵力出城抢粮，结果第一团团长阎敏哲以下193人被俘，二团中校副团长吴殿全以下212人被毙伤。据不完全统计，围长中我军进行反敌抢粮大小战斗30余次，共歼敌4000余名，从未使敌抢粮目的得逞。

国民党军杀民养军的抢粮行动，曾激怒了一些市民的拼死反抗。

长春市东荣桥外，有一位靠种菜过活的张治安。一个敌军谍报员以前曾到他家抢过粮食。7月24日那天，这个谍报员又来他家，要把他仅有的一点粮食全部拿走。张治安被逼无奈，冷不防把敌谍报员抱住，喊他妻子拿菜刀来，这个敌人拼命挣扎，打了3枪没打中人，最后，张的妻子赶来用菜刀把敌人砍伤。因桥上军队闻声赶来，夫妻俩急忙夺下敌人的短枪，撒腿跑到我军岗哨。八里堡有王姓、谢姓两家老乡，住对而屋。粮食早被抢光，每日靠青菜充饥。一天夜里，4名土匪兵闯入家门，他们一面将王、谢两人按倒在地拷打，索取粮食和金子，一面翻箱倒柜搜寻财物。王、谢二人忍无可忍，趁匪兵要他们抱柴烧水之机，冷不防抄起镐把和棍棒打伤了两个匪兵，夺下了两支匣枪。另两个匪兵见势不妙，拖起伤员且打且跑。王、谢2人带着两支匣枪，立即奔向我前沿。⑦

长春市内连陈年的酒精存量也不多了。成千上万的灾民，每天都聚果在靠郊区处，等待空投大米。因为这一带不是指定空投区，只要米袋从天而降，便被饥民哄抢。一次，国民党军

几辆运粮车，把成麻袋的空投大米运往仓库，行经七马路，即被成群结队的群众包围，道路堵塞，粮车不能前进。群众各持小刀一拥而上，割开麻袋，动手抢粮。国民党军开枪射击，死伤群众数人，但那几车粮食却被抢光了。

据统计，大约两个月的时间，粮价上涨了913倍，而且物价无市，市场上的野菜，1斤也要几百万元，哪怕是1捆青草，也要1捆钞票去换。

据了解，当7—8月份市内高粮米价每斤3 000—4 000万元，小米每斤1亿元，黄金的价格每两是7 000万；就是说，1斤小米能换1.5两黄金。

长春守敌可以说是瞪起眼睛来与群众争粮食！那可真是毫不含糊的你死我活之争。为了把赖以活命的粮食抢到手，采用再残酷的杀民养军手段都不足惜！是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有什么本事能同现代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抗衡？于是，双方斗争的结果，还是得把生存的条件让给那些“固守待援”的“英雄”们。留给老百姓的，只有苦痛的生离死别和默默地成为一批批的饿殍。尽管如此，竟还有一批灭绝人性的达官贵人乘机大发横财。他们一方面把杀民养军搜刮来的粮食囤积居奇，倒手变成黄金；一方面利用职权从长春向关内各地进行巨额汇款，利用差价损公肥私。如果说，长春这场灾难，出现过人吃人的悲惨现象，那么，从本质上看，真正吃人肉、喝人血的就是这批人！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回忆说：在长春饿殍遍布的情况下，那些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仍旧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⑧

7月下旬，蒋介石从庐山电令郑洞国，从8月1日起，疏

散长春市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郑洞国下令警备司令部和市政执行。在各个哨卡上，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和市政府各派正副哨长1人，盘查外出人员及物资。予计从8月1日起，被强制驱出哨卡的为下列人员：一是一无所有的贫民，防止他们留在市内闹事抢粮；二是无职业者；三是公教人员及被裁的地方官兵。据说，讨论此问题时，国民党长春市的参议们曾提出异议，郑洞国无可奈何地说：“疏散人口，不是我郑某人的个人主意。”被驱出哨卡的一些居民，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或其它可以度日的食物，均被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搜劫一空。于是，从这时起，哨卡内外，即有大量的饿殍出现。也就是说，蒋介石杀民养军的“德政”，从此“卓见成效”了！⑨

①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0—402页。

②参考《吉林市文史资料》第2辑151—152页，以及第3辑89—90页记者穆青的报导。

③参考《吉林市文史资料》第3辑91—92页。

④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2页。

⑤摘自《吉林市文史资料》第2辑154页。

⑥摘自长春市工委档案资料。

⑦摘自《围城简报》第2、3期。

⑧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4页。

⑨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3页。

长春人民的灾难

事隔40年了，如今到长春若问起那些年老一点的、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忆起那苦难深重的情景，仍旧不免心有余悸。是啊，在国民党军队驻守长春的1948年夏秋季节，长春这座美丽繁荣的祖国北方名城，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那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真是亘古少有的浩劫呀！

1948年春，长春市人口不过50万，而国民党驻军却有10万。也就是说，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个是兵，到了我军开始围城期间，由于一些有钱而怕“共产”的人南逃，市内实有人口减少到40余万，就是说平均每5个人就有1个国民党兵。因而，那时的长春，简直是一座兵城。到处是兵的天下，是兵，在那里作威作福。长春的一切，都得围绕着国民党军队转。

长春守敌为了达到长期固守的目的，维系所谓人心、士气，首先抓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欺骗宣传和思想控制。运用吉林

省党部控制的《中央日报》和长春市控制的《长春日报》，广泛地进行反共、反苏的宣传与诬蔑，并组织培训反动骨干。分配到军内外，充当欺骗宣传的骨干和监视人民言行的特务。他们将一个流亡在美国的反革命白俄分子葛拉诚科写的《我选择自由》一书，责令《中央日报》、《长春日报》转载和大肆宣扬，目的在于从对苏联的诬蔑造谣中，欺骗和恫吓不明真象的群众和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仇视共产党，充当维护反动统治的力量。还将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炮制的反动透顶的陈词滥调、所谓“大纲”的东西，亲自加以发挥、阐述。谓之“总体战概论”，在训练班中“演讲”。并印成小册子数千份，分发受训人员和下发给市属有关工作人员，做为镇压人民和欺骗群众的宣传资本。①甚至把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的那套办法也搬了来，用于在长春大办训练班。首先是开办了吉林省军政训练班，把从吉林逃来长春的一批省政府政治工作大队等机关人员和军队的部分基层干部进行了培训，由郑洞国兼主任，吉林省府秘书长崔垂言和尚传道、李寓春为副主任，特务头子参事王中兴任教育长，共收学员400余人。训练结业后，一部分由李寓春派充吉林省保安旅的下层政工干部，一部分则由尚传道派任长春政工大队队员。这批人，都成为固守长春、维护反动统治的基层骨干，直接骑在人民头上，无恶不作。紧接着新编第七军也举办了训练班，调集本军连排干部受训，由该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任班主任。主要目的，是把基层干部培养成监视下级军官、士兵的特工干部，妄图顽抗到底。7—9月间，又在励志社举办了两期兵团组织的训练班，抽调兵团机关和两个军的中下级军官集训。继续灌输维系士气，加

强精诚团结、长期固守的军事方针。

当时，关内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长春守敌对大学生这部分人深为忧虑，唯恐形成不安定因素。为了把长春大学和从吉林逃来的永吉大学、长白师范学院以及十数所中学的学生等数千人控制起来。命令一个曾任过三青团吉林支团长春办事处主任、名叫智学礼的人，把长春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员（约20余人，倾向我地下革命组织的人并不多，大多处于中立状态）组织起来，与进步学生做斗争。智学礼夺取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出版了一种油印刊物，持“中立”的姿态度，专门与我地下革命组织出版的《红旗周报》做斗争。到了后期，经尚传道批准，由智学礼组织，将这些学生改编成“战时政治工作总队长春大学分队”。在“长大”开展活动。

长春解放前夕，国民党吉林省教育厅长王焕彬提议组织“学运组”，统一各学校内反动组织的领导。经郑洞国主持讨论决定，由王焕彬为学运组长，省党部书记长岳希文，第一兵团政工处长王中兴为副组长。“学运组”成立以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大批逮捕进步学生。许多革命学生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遭到非刑拷打和屠杀。②

长敌深怕饥饿了的学生们滋事，便以整顿教育为口实，把所有青年学生集中起来，组成“幼年兵团”。这样，既便于维持生活，又可以充分利用这批廉价的民力，同时还避免了影响社会治安。到了后期，“幼年兵团”年令搞得越来越“幼”，连初中、高小学生也收罗进来了。

吉林师管区司令为塞责征兵，搜罗炮灰更有进一步的发

挥，他将从北满五省我解放区流入长春的青年和从吉林逃亡流落到长春的一批地主富农子弟，从“难民收容所”中收罗起来，组织所谓“志愿兵团”。这样，既可避免这些人在社会上捣乱滋事，又可减轻救济粮的负担。到7月份，竟组成6个“志愿兵团”，③约7 000—8 000人，大部编入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其中有不少人由于长期散荡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惯，吃不了军队之苦。以后又脱离了军队。

长春守敌，在欺骗愚弄群众的同时，还对长春人民进行了残酷镇压。当时长春市区内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计有：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南京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也称史作炎高参办事处）、中统局长春站、南京国防部保密局北满站、宪兵特高组、市警察局等，这些特务组织的狗腿爪牙，遍布市区各个角落。监视和钳制人民的言行。我军围城初期，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军统特务头子安振东，即接到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的电令。要他加强所谓“防奸防谍”活动，妄图消灭我革命的地下组织，镇压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并通过报刊、集会大造反动舆论，勒令各机关、学校、团体，以科室为单位，编组“防奸防谍”小组，互相监督。并实行联保联坐，一人出差错，联坐者都遭殃。这种庞大而又严密的特务监督网给长春市人民带来了人人自危的灾难。保不定何时、何故，就可能被强加一项“通共”、“通匪”或“隐匿不报”、“图谋不轨”的帽子，投入监狱，惨遭不明不白的关押或杀戮。

为统一特务机关行动步骤，专门成立了“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简称“特秘书处”）。参加这个“会报”的特务头子有：国民党中统局长春站站长张思明、军统局北满站

站长项迺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振东、长春市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第一兵团司令部军法处处长邵惠林、吉林省政府参事兼第一兵团政工处处长王中兴、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岳希文、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站站长史作炎等。下设五个组：一是调查组，由中统特务张伯樵任组长；二是行动组，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特务陈寿岚任组长；三是审讯组，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侦事组长陈牧兼任组长；四是管训组，由军统局北满站特务崔毓霖任组长；五是总务组，由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特务张鸿业任组长，这是执行逮捕与屠杀的总机构。上述特务组织，机构虽然庞杂，但实际上仍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为骨干。

据初步估计，我围城期间，惨遭这个秘密的特务组织杀害的我地下工作人员、爱国人士、进步学生和无辜人民群众，达300—400人。长春解放后，仅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院内一处，即挖出尸体184具。据调查，在这184人中，有我地下工作人员14人，爱国青年16人，无辜市民60人，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图谋不轨”或“不稳定”分子9人。此外，一般的刑事案犯，甚至包括特务机关某人的姘妇，因争风吃醋而遭屠杀。尤其是1948年10月18日清晨，第六十军起义后，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张国卿的命令之下，特务们把督察处看守所残留的“犯人”48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活埋。其中包括一些普通刑事案犯，已在前一天准予保释的。灭绝人性的特务们，自知末日将临，难逃人民的法网。因而，抱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对革命志士、进步学生、无辜人民群众发泄兽性，杀红了眼。其疯狂与残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长春守敌外界的粮源断绝时，尚传遭慑于他市长职责的利

害关系，曾力谏郑洞国在执行蒋介石杀民养军政策的具体做法上打了折扣。所谓“粮管法”的实质，就是巧取豪夺。早在我军对长敌形成包围之前，尚传道曾献策，要国民党中央运来10 000两黄金，做为长春地区发行货币的实物准备。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郑洞国无奈，只好利用他的职权责令南京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大额本票，做为“购粮”和开支军政费用的手段。大额本票最初每张票面额是100万元，接着递增为500万、1 000万、3 000万、5 000万、1亿以至1.5亿，最后竟发展到几十亿元一张了。票面值如此巨大的流通货币，只怕是古今中外史上的首创。粮价也随着票额的上涨而飞升，从开始每公斤数百元、数千元的高粮米，涨到5—6亿元，开创了人类史上从所未闻的粮食价格。从1948年的3月到10月的8个月中，国民党在长春的军政人员、特务、警察等多达10万余，除了直接向人民洗劫以外，就是用这样一堆废币，榨取了市内及郊区60余万人口的全部粮食和财物的。

随着国民党杀民养军政策的逐步加深，长春人民几乎早已与粮食绝缘。由糠秕、陈年酒糟转入吃野菜野草，连秋天树上的落叶和能够得着的树皮，都被吃光了！苦难的市民身上再无丝毫油水可榨时，留在市内就成了守敌的巨大负担。前已说过，远在庐山的蒋介石想到了这一点，电令郑洞国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市卡哨内的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也就是说，把那些没有饭吃的老百姓统统地赶出去，不顾他们的死活。

长敌为了执行蒋介石这一指示，手段恶毒残忍，他们的办法是欺骗宣传与强迫驱逐相结合。如说什么“7月1日是毛泽

东的生日，八路军放卡子7天，要乘机赶快出城。”有的把居民集中起来，用卡车载到我警戒线附近，驱赶他们到我前沿，向八路军“请愿”，放他们到城外活命。被驱赶出来的不只是市内平民，还有公教人员，军队的眷属和被裁减的地方官员。那些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们，在执行这一驱逐任务中，从饥民手中夺下了一切可以入口的物品，致使一些生命垂危的老百姓，连爬到我军警戒线的能力也没有了，有些人力不能支，没走多远就恹恹悠悠地倒了下去，父母已经倒下去了，孩子们凄凄惨惨地哭爹喊娘声发自遗体旁，惨不忍睹⑦。被驱逐到难民麋集的载我中间地带，是国民党土匪队占居的天下，这些曾被郑洞国称之为“让他们自生自灭”的“山大王”们，唯一的“自生”手段，就是残害老百姓。这就等于城内的国民党军把老百姓的血和肉吞食一尽，余下一把骨头又扔给城外的土匪去啃！这些难民的病饿之躯，焉能经得起土匪的蹂躏？有不少人人为之丧生，如不是我党政军开放收容和救济难民及时，只怕迟一天也要增加饿殍数以万计。

9月份，中秋季节的长春，树叶飘落却不见归根，饥饿不堪的人们，见落叶加获至宝，边落边被一抢而光。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院子和周围，原本绿树成荫，一般人是不敢靠近那杀人人不眨眼的阎王殿的，只有一群群瘦骨嶙峋的孩子们，胆怯地跑到围墙四周抢搂树叶。可是，特务头子们居然认为这些可怜的孩子“有碍观瞻”，责令哨兵吆喝驱逐，不走则鸣枪威胁。在市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由于吃树叶、树皮、草根而生病致死的也累累增加。在市场上，开始还有拍卖子女的“人市”，后来，有人卖无人买；于是，街头上被遗弃的孩子愈来愈

愈多，哭爹喊娘，悲惨万状。慈善机关想发动一些人去领养，但哪能领得完，又有几个养得起的？有些人，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一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发生过卖食人肉的惨事！

据原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后来说，当时，国民党新编第七军的3个师，库存的粮食仍可维持一段时间，第六十军到了10月份，确已濒临最后关头；但却从未发生过饿死士兵的事。这话很值得深思：同在一个长春城内，同遭困饿，老百姓饿死了那么多；而国民党军10万士兵却无一人死于饥饿——这说明了什么？纵使国民党军通身是口，只怕也难以抵赖，他们执行杀民养军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吧？

长春人民，在解放长春的作战中，承受了人生莫过的妻离子散生死诀别之苦，其状之惨，实属历史罕见！至今回忆起来，不禁令人痛惜！然而，在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的三年战祸中，遭受生灵涂炭的岂只是长春人民？而是遍布全国！当然，长春有它的特殊性，那就是国民党守军为了对付我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炮制的杀民养军政策。其实，杀民养军并非国民党在长春开创的新篇，而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故技。蒋介石要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就必然镇压人民，他发动内战就是这一政策的集中表现。

灾难深重的长春人民，对这场灾祸的来由是一清二楚的。

①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7页。

②同上第398—399页。

③同上第396页。

大难临头 各寻出路

日趋死亡的危机，笼罩着长春这个苦难的城市。人们都去寻找如何解脱坐以待毙的处境，以求绝处逢生。

高级将领们在打各自的算盘；广大的下层官兵，却只有在“上峰长官”的操纵下，听天由命的份儿了。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对前途普遍悲观绝望。下面兵心涣散，士气沮丧，那么上面那些中、高级军官的心理状态是否会好些？其实，也没什么两样。甚至连新七军军长李鸿，在8月初团以上的干部会上，也发出了绝望的哀鸣：“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投降，一条是奋斗到底。”①这“奋斗到底”，也就是“杀身成仁”的隐讳语了。

在杀民养军的政策下，苦难倍加深重的是长春市人民。自我军围困长春以来，国民党守军与老百姓相争活命的斗争就开始了。

其实，国民党守军也是想“依靠”群众、需要人民“支援”的。在我军围城之始，长春守敌深怕失去了人民群众这个护身屏障，严加控制，不让市民出城。这是因为，如果市民跑光了，他们就成了孤家寡人，还到哪里去抓壮丁、拉民伕？何况，他们更加害怕的是我军断绝市内的水源和电源，这两源都掌握在我们手里。于是，他们也要跟着人民沾光。所以，人民群众对他们还有用，不能放走。当我军对长春实行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完全断绝了城外的粮源，城里的居民又成了“征购”军粮的唯一对象，因为还有一点点油水可榨。可是，当市民的这点粮食潜力挖光了，就变成了几十万食口的包袱，不但无利，反而有害了，于是，大刀阔斧地疏散人口。

在国民党军队内，饱受灾难的是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不甘于附在这只“断了线的风筝”上面，任其飘荡、随其灭亡的。他们要找出路，要生存，要千方百计地挣脱它。于是，在我军“攻心为上”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认准了这条路，纷纷奔向我方。当时，我围城部队各师在防守阵地上都设有国民党官兵投诚接待站。各师的一梯队团也均设有接待国民党投诚官兵和收容长春市难民的点，转送师接待站，再由接待站转送“围指”设立的国民党军官兵招待所。当时在卡伦、新安堡等地，都设有这样的国民党军官兵招待所。投诚官兵到招待所后，即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置：军官可依其志愿送到解放军教导团学习，或遣送回家。士兵如家在解放区的，依其志愿准其还乡，不在解放区的，也要发给他足够的路费，打发他踏上回乡之路。

为了巩固部队，敌人挖空心思，想出了一系列的制止办

法，对基层广大官兵软硬兼施：严酷镇压与欺骗宣传两者并举。其对内统治的主要手段是：

——前沿警戒一律由老兵担任，规定如在警戒线30米以外发现外出军人，任何人都有枪杀之权。并以连为单位，选派可靠士兵，由各排长轮流带领，到警戒线外五、六十米处设潜伏哨，其任务名义为监视我前沿动向，实际上是防止与捉获逃亡者。

——各部队均实行“连坐法”。停止扩大部队，少数志愿当兵者也须严格审查，并于当地取铺保1—2家，以防携械拐军服逃亡。

——逃兵被捉回者，无论携枪与否，一律枪毙；对企图逃亡未遂者，一经发觉，一般均押禁闭或严刑拷打，有时两种方法并用。

——以物质利诱拉拢感情，拢络部队。有的单位将私留的空投粮出卖一部，给士兵每人做一套衬衣，也有的将因与地方部队发生冲突而缴获的枪支出卖，给士兵做皮鞋；还有的单位长官允许士兵打牌、推牌九，一些下级军官亲自带头聚赌，借此麻醉部队，减少逃亡。

——进行欺骗宣传教育，更是国民党军统治者们的拿手好戏。新编第七军的〈精诚日报〉以及长春的〈中央日报〉每天都用大篇幅鼓吹：“大批国军在葫芦岛登陆，现已开抵锦县近郊，不日长春即可解围。”“国军已完全控制北宁路，大批国军纷纷北上。”7月下旬，六十军某将领发表谈话说：中原战争即将结束，大批国军即可出关，大批粮食运至锦州，估计八月节长春即能解围。”“我们有足够的兵力与坚固的城防来固

守长春。”又云“围困长春之共军，均属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更加国军有大量飞机，轰炸共军后方，运输补给线已全部被切断。共军吃穿已入非常困难之境，围城部队在吃树叶，比我们城里还要困难。”

还有一种闹剧式的欺骗宣传手段更加有趣：新编第七军骑兵一团上校团长凌绍康，因病在家休息一星期后归队，发现部队几天来逃亡甚多，光是团部就有八个开小差的，他立即集合全团训话两个小时。他对士兵进行欺骗恫吓说：“你们跑到共产党那边能享什么福？还不是给人家当炮灰，送炸药包，或送后方下煤矿！”为了今后不再出现开小差的，他要每个士兵都找一个尉官以上或本市大买卖家做保人。

敌新编第三十八师的各级军官，对士兵们训话有一个共同的腔调：“共产党主要是消灭三十八师，凡三十八师逃到共军那边的，都枪毙了，如果长春让共产党军打开，那三十八师就会一个也剩不下。”②

尽管如此，敌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们，仍旧千方百计地谋求逃走的机会，只要有隙可乘，即做死里逃生的冒险。因而，8月份虽是长春守敌控制逃风最严的时期，我仍然收容逃兵5 993人，平均每日199人，高于7月份的日平均数。我“围指”唐天际副政委在围城敌工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但削弱了敌人的斗志，也瓦解了敌军战斗力。综合敌逃亡投诚数字，等于消灭敌人一个半战斗师的兵力，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啊，19 000余众，相当于长敌总人数的1/5，的确能编一个半到两个师。这些人都摆脱了死亡的困境，找到了真正的出路。

被长春守敌驱赶出来的难民们，多数徘徊在敌我两军警戒线之间的空隙地带。这些地区，也是敌我双方情报人员经常出没的场所。由于集聚到这个地区的人较多，情况也极其复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里成了那些成群结伙的走私贩们活跃的天地；这种特定的环境，还出现了一种专门为人带路，偷越我军或敌军警戒线的特殊“职业”者。特别是当地的土匪，更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盘踞在兴隆山区和宋家洼子等地的土匪，每到一地先进行掠夺，然后，再强行拉丁硬逼入伙，入伙者，可将被掠夺之财物收回。因此，这些土匪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他们平时隐伏于居民之中，待机进行抢掠居民，向我军打冷枪和向敌阵地发信号弹。农忙季节，则扰乱我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掠夺农具和牲畜，打骂和鸣枪恫吓耕作的农民。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当地人，群众和难民对他们十分害怕，不敢惹也不敢告发。加之土匪们一味进行反动宣传，群众左顾右盼，产生了许多忧虑：一，怕我军走后地主土匪和国民党军回来算帐报复，因而不敢揭发检举。二，有钱人怕侵犯自家利益，基本群众虽然切望我们给他们办些好事，但又不敢出头。三，群众对什么是剥削有误解，种地时劳力不足也不敢请短工帮忙。四，土匪造谣宣传将来共产党要分青苗，一部分群众害怕不敢种地。有的还害怕地多将来交公粮多，误认为我号召种地是为了征公粮。有的政府给种子也有顾虑，认为这是“要花招”，将来偿还不起。五，怕我军与敌军一样，强行征人出兵，拉民伏出担架。

基于上述情况，我国城部队各师均抽出过一定的兵力，剿

灭这些地区的土匪。当时采取的办法大多是待机出击，主要是收缴他们的枪支，对其罪大恶极者，逮捕法办。与此同时，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为了保护和支援群众农田耕作，军队和地方政府都派出一部分人员到这些地区帮助群众劳动。在此期间，我围城部队和地方政府，每人每日节约口粮救济灾民。③

长春国民党军的杀民养军政策愈演愈烈，长春市内人民的灾难也愈来愈深重，徘徊在这空隙地带的饥民们，生命愈发难以支持了。鉴于这种严重情况，我围城指挥所于8月初，决定开放收容和救济从长春被驱出的难民。我吉林省政府当即成立了处理长春外围难民委员会，并制定了组织工作简则。从而，挣扎在这些地区为数8—10万难民有了活命之路。他们被陆续分批迎进我解放区。对那些等待后批、暂时尚未能出来的人们，则先发救济粮应急。为防止有人乘机倒卖粮食，每人每次发3日份口粮。

可是，就在我党政军全力以赴地解救长春市难民的时候，长春守敌认为有隙可乘，将他们打算外逃而苦无门路的人，以及平日豢养的特务、土匪夹杂在难民之中潜出长春。这些家伙，有的是官员眷属，为了逃往沈阳挣扎避难，有的是心怀叵测企图刺探我军事情报的特务，有的则是由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大特务头子崔垂言直接掌握的，派往各县组织流亡政府、扰乱我后方治安的武装特务。他们为了达到外逃的目的，使出了种种卑鄙手段。通常的办法是：

一 化装成难民，携带仅能维持路上生活的物资和破旧衣物或布匹，做为随用随卖的路费。将其它贵重物品，除途中需

用和能够隐蔽携带的金银外，都在长春变卖，利用通汇将款汇到沈阳。

——用谍报员给眷属带路，一举两得。不管任何方向，只要能通过我封锁区，谍报员与眷属即可分道扬镳，各自完成自己的事。

——准备好一套假口供，使言语一致，应付沿路岗哨的盘查。一切机密证件多藏在肥皂内、贴身衣缝内和不易发现的物品中。

——利用我优待国民党逃兵、和照顾学生、技术工人的政策，伪装成上述人员，逃出我封锁区，然后去沈阳或隐蔽在我区进行特务活动。他们有的穿军衣、戴符号，或携带武器（有的是坏枪），或将其它军用品交给我方，骗取信任，要求“回家种地”。有的则用钢笔、表、银元、照像机、望远镜、贵重药品等物，收买我方落后人员，骗取路条，达到目的。还有的采取痛骂国民党、伪装进步人士或走错路途等狡猾办法，在沿途和封锁区内乱串，以刺探我军事情报。

——潜入我区的敌特人员，多为思想极其反动的国民党党团分子。有的是流氓性质的美色女人或妓女，他们都受过专门训练，加入了反动党团。这些敌特，身上都有联络暗记，如有的在身上不定处缝十字，或鞋带倒缚，或衣兜内放3—5粒豆子，或衣服接袖等等。

这些潜入我区的反动分子和特务，大部为我在封锁前沿或沿途查获。他们中有的人到达沈阳后，即用电报报告我军情况，有的将情报书写下来交敌机空报。④

长春守敌的地方部队有些人还采取了另一种挣扎逃命的形

式：他们成群结队地化装成难民，携带武器，利用夜暗，偷越我封锁线，企图流窜出去当土匪。如7月30日到8月2日的4天中，即有国民党地方部队4股从我独立第八师方向窜出，企图向德惠、农安一带流窜。7月30日，敌保安二旅100余人由八里堡经常家店、小南屯、金钱堡窜至马家哨口东北农安县境；8月1日24时，敌保安二旅50余人，由八里堡经腰十里堡、安老泉，向农安地区逃窜；8月2日23时，敌地方部队50余人，由八里堡经常家店、金钱堡至潘家店一带逃窜；同时，另一股约30余人，由车站经腰十里堡逃窜。这些逃敌均被我独立八师一团及地方武装分别歼灭。他们虽然挣扎出了长春，有些人却丧了命，绝大多数还是侥幸做了俘虏。

① 摘自《围城简报》第4期唐天际在敌工会上的总结。

② 参考《围城简报》第3期长敌统治内部的新花样。

③ 参考《围城简报》第2期长春县兴隆区来信。

④ 参考《围城简报》第3期“长敌匪特潜逃的办法”，以及《辽沈战役亲历记》尚传道“长春困守纪事”一文第397页。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勇士们

在我军围困长春激烈斗争的同时，另一条战线——我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的同志们，也在进行着殊死的斗争。长春所以能够取得不攻而克的巨大胜利，决不可低估这些英雄们的重大作用。

长春守敌第六十军所以能够光荣起义，决非偶然。这要从我们党在若干年前的深谋远虑说起，

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云南部队的第六十军编成起，就有共产党员在该军工作一直到长春起义。在六十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大体上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原一八四师师长张冲邀请去的，一部分是参加六十军后一克没有暴露政治身份和在六十军中秘密发展的。这些共产党员，最初主要是在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工作。当时，无论是被请去的也好，隐蔽的也好，都是为了团结抗战，而不是挖国民党的墙脚。抗日战争胜

利后，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些共产党员又成了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尖兵。在配合外线作战和内线瓦解敌军工作中，起了重大作用。

第六十军在民国初年，曾在蔡锷将军的领导下、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是一支颇有影响的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国民党军事当局之命开赴前线。当时，该军的一八四师政治部主任张永和，就是我地下党员。接着，云南党组织又派出了杨重。1938年1月，当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将军率部途经武汉时，经张永和同志介绍，同我党驻武汉办事处的罗炳辉、叶剑英将军接触会面。会面时，张冲将军要求派几个懂军事的青年到他部队中工作。1938年2月，我武汉办事处应张冲之邀，介绍从延安来的周时英、张天虚、薛子正等同志到该师。薛子正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过，懂军事，到一八四师安排在参谋处工作。这时，在一八四师成立了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由周时英任支部书记。同年6月，又调入了杨华、张文斋等同志，充实了我党在六十军的工作力量。张冲将军思想倾向我党，对掩护我党在六十军内开展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38年秋，一八四师奉命改编为第三军，张冲任军长。当该部向湖南转移时，我新四军平江办事处派入我党工作人员两名。此时，在该部的中共党员、连新发展的同志在内，计有：张永和、杨重、刘孟田、周时英、张天虚、张文斋、薛子正、杨华、蒋南生、黄致平、尹冰、杨守沫、林和顺、王立中、张士明、宁坚、杨永新等近20名。从面使我党在六十军内根子扎得较牢，枝繁叶茂，不但经得起风风雨雨的考验，而且还愈

来愈有成效地在敌内部发挥影响和作用。

1938年12月，在六十军中有人阴谋排斥张冲，借口张冲同共产党有来往，具文密报龙云与蒋介石。龙云一气之下将张冲调回云南，蒋介石下令撤消了由一八四师和新编十二师组建新三军的命令和张冲的新三军军长职务。一八四师于1939年1月复归六十军建制。由于我地下党在六十军中已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周时英、张永和、张天虚、刘孟田、薛子正、蒋南生等同志，撤离第六十军。留下尚未公开活动的杨重、张子斋、张士明、宁坚、王立中、黄致平、杨永新、林永顺等同志，由杨重任支部书记，继续坚持斗争。根据当时的形势，必须警惕国民党特务，注意隐伏，不发展党员，有选择的进行交友活动和了解情况。

1939年7月，一八四师派杨永新等人到桂林招收文工团员。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同志又乘机将方文彬（方正）同志派入六十军，领导在六十军中的地下党工作。1940年底，六十军调回云南。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在蒋介石疯狂发动反共高潮时期，我党中央对地下党提出了“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的二十三字方针。据此，我在六十军内的地下党，采取了隐蔽布置。方文彬、张士明等同志调到张冲的第二路指挥部，张士明任特务营长。方文彬是该营的军需官，来往于指挥部与一八四师之间，领导我地下党工作。当时，杨重已经是一八四师工兵营副营长兼连长，同宁坚、杨永新、王立中等同志一起，利用合法身份，在“同流不污”的交友活动中，进行广泛了解情况，调查研究。

从1938年到1944年期间，我在六十军工作的地下党员中，有的已掌握了一定的兵权和取得了一定的职责岗位。一八一师和一八四师的工兵营合并为军的工兵营，王立中任该营第二连连长，杨重由补充团一营营长，调任军部骑兵搜索营营长。在此期间，云南地下党组织，又通过张子斋介绍“云大”和“联大”的进步学生孙公达、陆飞、赵雄等到杨重的骑兵搜索营工作。经杨重与张子斋研究，分别把他们安排到连、排适当岗位。这些同志，不但积极地参加了我党的工作，以后都成为中共党员。

1945年8月，日寇投降，蒋介石下令云南部队开到越南受降。杨重的骑兵搜索营从蒙自开到越南老街时，方文彬从后面追上指示他三条：一、部队开到哪里坚持跟到哪里，二、争取掌握兵权；三、不打仗时外线会派人联系，如参加内战，就把队伍拉到解放区。六十军驻越南安定期间，更换了美式装备，军、师、团各级人事进行了调整，曾泽生任六十军军长。骑兵搜索营撤销，任命杨重为六十军军部副官长兼特务营长。杨重同志长年工作不但没引起敌人的怀疑，反而一跃成为曾泽生身边的人，这正是我地下党长期潜伏方针的胜利。

1946年，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滇系部队的第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奉命开赴东北。我地下党的方文彬同志去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六十军的地下党工作由杨重负责。当第六十军从越南海防踏上“自由轮”来东北时，该军内我地下党员，只有杨重和王立中两个人了。来东北后，又分别将经过长时期了解培养的孙公达、陆飞、赵雄、俞元、詹玉佩、詹玉填等人发展入党。并且还设法通过人事科合法手续，把他们都安排到要害

部门。如孙公达安排到军部情报科，当谍报组长；陆飞安排在人事课当课员，以便了解和掌握全军的团以上军官升迁调补和派系关系；赵雄安排在军部机要室当译电员；王立中安排到军务处当课员，以便了解和掌握全军的编制、武器装备实力。其他都留在特务营任连、排军官。此时的杨重，除掌握全面情况外，主要负责密切同军参谋处长李佐、通信营营长孙璞等人的关系，以及加紧对赵国璋、朱光云等中高级军官的交友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1946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地广大地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正因如此，我党中央更加重视滇军中的工作。1946年4月，朱德总司令主持召开了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云南籍同志座谈会，指出应重视滇军中的工作。并称，他本人也在滇军工作过，也算半个云南人。他号召云南籍的同志到滇军中从事工作，以争取这个有过优良传统和光荣历史的部队，站到人民这一边来。随后，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滇籍共产党员刘浩同志到东北做滇军的工作。行前，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接见了，并做了重要指示。少奇同志指示刘浩等同志要从三个方面做争取滇军的工作：一是依靠滇军中地下党组织，从滇军内部做工作；二是依靠我军威力和党的政策，在前方不断地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将领接触，公开对他们策

反。

这个时机选择很好，恰是六十军初到东北，即将面对面地同我军作战之际，也是国民党军队排斥异己，必将在东北战场上对六十军影响最深的时期。刘浩同志从延安乘飞机到达北平军调处我代表团驻地，叶剑英同志为其亲笔写了给彭真的介绍信。刘经张家口走承德进入哈尔滨，找到了负责敌军工作的李立三、周桓同志。刘浩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了滇军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和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处长，直接负责滇军工作。此后一段时间内，他曾多次往返于六十军与九十三军之间，同我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公开身份会见了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以及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向他们面交了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件，并向他们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政策。

6月中旬，刘浩同志几经周折来到了抚顺第六十军的驻地，找到了杨重和王立中等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把杨重和王立中等人的组织关系由南方局转到东北局。此时，杨重急盼外线来人的心情顿时舒展开来，他向刘浩作了详细的汇报。刘浩根据中央与东北局的指示精神以及六十军内部的具体情况，和杨重、王立中共同研究确定了地下党应做的八项工作：一、在六十军和九十三军中分别建立地下党组织，具备党员条件的，分别逐个地发展入党；二、在滇军的中下级人员中发展我党组织；三、广泛开展交友活动，做好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固工作；四、具备一定条件的要争取带兵权；五、利用时机宣传党的政策；六、注意搜集各种情报，供我军作战需要；七、建立地下交通；八、利用敌军队中的不满情绪进行

内部兵运工作。自此以后，刘浩同志以国民党少校军需官的身份，身着美式军服，带着第六十军副官处的证明，畅通无阻地往来于六十军与九十三军之间。

第六十军一到东北，立即遭到蒋介石的亲信、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歧视。他分割使用第六十军：一八四师潘朔端部驻海城地区；一八二师白肇学部驻铁岭地区；暂编二十一师陇耀部驻抚顺；军部驻新民。三个师的指挥权，或配属于他军，或直接掌握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对此，曾泽生感到很恼火，在他提出意见之后，杜聿明才允许六十军军部靠拢暂编二十一师，移驻抚顺。1946年5月，一八四师在海城被我军包围，在国民党军坐视不援的情况下，师长潘朔端率部起义。

1947年4月，我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前，刘浩奉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长李立三指示，带李竞（译电员）、张文青（报务员）和警卫员刘胜，携带电台潜入六十军。由杨重同志安排住在吉林市，秘密地开展工作。我地下党的同志，还通过与李佐等人的交友活动和工作中的各种机会，配合外线作战和政治攻势，搜集了大量情报，使我及时准确地掌握了该军的部署和动向。

1947年5月下旬，我军于梅河口歼重新组建的一八四师，致使驻守海龙的暂编二十一师陷入孤立、挨打的境地。曾泽生亲自起草电报，令暂编二十一师撤向吉林郊区。电稿内容被我地下党员赵雄告知杨重，杨再转告刘浩。第二天，暂编二十一师在撤途中即遭我节节伏击，全师损失过半，师长陇耀和随从人员化装逃回吉林口前一八二师师部。

陇肇逃回吉林半个月后，经杨重搭桥，刘浩持民主联军总

部和潘朔端等人给曾泽生、陇耀的信，面见陇耀，单独面谈了1个多小时。六十军孤守吉林市，曾泽生决定修筑钢骨水泥永久性工事。杨重是工兵出身，曾泽生指派他负责勘察、设计、定点、并编制工程器材表。杨借此机会，把吉林城防工事和兵力、火力部署等，整理了一份附有图表的文字资料，通过地下交通员送交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我军准备围攻吉林，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资料。

此时，滇军原将领张冲已从延安到达东北，被我任命为松江省政府主席。他在哈尔滨发表了广播讲话，对六十军颇有震动。蒋介石发了火，亲令曾泽生清洗张冲的旧部。因此，被任命为第三次组建的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团长的杨重，到沟邦子上任不久，于9月初，突然接到曾泽生“着派杨重、李蒸二人带足旅费，马上离开部队去昆明带新兵”的手令。李立三同志指示，在六十军无法工作就回解放区，不要去云南。10月间，杨重在地下党其他同志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哈尔滨，改名杨滨，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副处长。六十军党支部，由孙公达同志接任支部书记，直到六十军在长春起义。

1948年，国民党多次予谋破坏小丰满发电站。我党在六十军工作的孙公达及五四五团副团长赵国璋等同志，曾有计划地做了大量工作。并将我军制止敌破坏小丰满发电站的电文送给了有关人员，送到了曾泽生和陇耀等人的案头，对他们施加影响。六十军撤离吉林时，郑洞国传达蒋介石的命令中曾有炸毁小丰满发电站一项。在我军与地下党里应外合地施加影响下，曾泽生毅然拒绝乱命，保住了小丰满发电站，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军围困长春以后，对在六十军的我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由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负责，主要领导人即刘浩同志。当时，他们的主要工作：一是将六十军由吉林撤退时丢下的家属经过教育后，一律送还长春。二是密切内外线之间的联系。三是利用投诚人员中某些人携带宣传品返回市内做工作。四是利用敌机空投飘入我区的邮件，有的拆封装入宣传品，有的是熟人信件则加批语，送入长春。五是做好释俘派遣工作。如刘浩同志亲自安排释放梅河口战役被我俘获的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团副何尔寿、夏绍文，营长张士勋等，回长春做陇耀、曾泽生、李佐等人的工作。这些人回到六十军后，宣传我军政策，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收到较好的效果。其中张秉昌、李峥先，在六十军长春起义前，是曾泽生首先派出城到我一兵团部接洽的代表。

在六十军中，我地下党工作基础最好的是五四五团。该团是六十军中主力一八二师的主力团。中共党员副团长范啸谷同志与团长朱光云关系甚密。1948年1月，范在作战中不幸牺牲。经孙公达等同志活动，调赵国璋同志继任该团副团长。因而，我地下党在该团的工作基础依旧很好。在六十军酝酿起义尚举棋未定之际，我在五四五团工作的地下党员，认为条件已经成熟，遂与团长朱光云商定率全团起义。并由赵国璋写好行动计划，交赵雄出城送往东政前方办事处。恰在此时，曾泽生首次派出的接洽代表，也刚好到达我一兵团部。因而，兵团决定，五四五团不必单独行动，改为支持六十军全军起义。^①

我党在对长春守敌开展的地下斗争，总的说，六十军的基础较好，开展得早，根基也牢，成效显著。因为当时的工作重

点也着眼于滇军。但对敌其它部队也并非没有我地下党活动。如新编第七军的暂编五十六师（原为伪满铁石部队）内部，我地下党的工作也是较为活跃的。5月下旬长春外围的战斗，我东北军区制定作战计划时，就曾考虑过该师我地下党的工作情况。但那次战斗从发起到结束都很匆匆，我地下党未能及时发挥作用。可是，据称暂编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的被俘，即与我地下党工作有关。

当时，东北军区政治部负责敌工工作的，是周桓同志。在长春作战方面，除刘浩同志负责九台联络站对六十军的前方办事处外，尚有松前指挥所以陈光同志为领导的对长工作组。该组派出张正平同志进入市内开展工作。张正平同志进入长春后，首先与亲友们集资，于东二条胡同开办了富源长制米厂。以此为掩护，接通关系，发展组织，广泛地联络交友。一面做敌暂编五十六师的策反工作，一面利用社会合法活动搜集情报。由他领导的我在敌暂编五十六师内部有三个工作组：一个是白殿升组，一个是金器之组，一个是姚兆民组，各组均有数量不等的下属人员。白殿升组发展到26人，白的合法身份是中校军需官，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后因在中长铁路局铁路员工宿舍（活动据点）参加活动，被变节分子出卖被捕。被捕后，他不但什么也不承认，反而信口说了一些铁路高级职员的名字是他的“组员”。敌人明白，他是想乘机制造督察处与中长铁路局高级职员间的磨擦。直到6月18日就义那天，敌人从他口供中也不能肯定他到底同共产党有没有瓜葛，只给他定个胡乱拉拢一些人图谋不轨的罪名。白牺牲后陈光同志指示有关部门为他开追悼会。

金器之的合法身份是暂编五十六师的上校高参，他与原暂五十六师师长刘德溥交往甚厚。因而，他的主要任务是争取该师的领导层，做刘德溥等人的策反工作。有时，他直接与陈光同志进行联系。1948年7月，暂五十六师师长刘德溥因不为上峰信任而被调走，金器之也因此失去了主要工作对象和人事关系的支柱。被一个名叫江静波的人暴露而被逮捕。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敌人的严刑拷打使他折了胳膊、断了腿，也不肯吐露与任何人有什么关系，就义前，他高喊共产党万岁。白殿升、金器之两位同志都被迫认为烈士。他们为长春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于我地下党在敌暂编五十六师内部做了大量工作，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48年10月，在第六十军光荣起义的同时，为我地下党所控制的暂五十六师直属队的辎重营、迫炮连、通信连、宪兵排等单位，都有所响应。10月16日，六十军起义的部队还没有拉出城，暂五十六师师直通信连，就已切断了该师所有的与新编第七军军部和第一兵团部的通信联系。

张正平同志领导的另一条战线，就是以富源长制米厂为掩护基地，广泛搜集敌军情报的侦察网。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设法接触敌军各部门，确切地统计敌军吃粮人做，调查和掌握全市存粮数字，判定敌军可能顽守的时间等资料。并且，把他们的制米厂办成了在全市行业中颇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单位。制米厂的经理李国栋和会计高博儒两同志，是我地下党骨干，他们利用合法身份，巧妙地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李国栋是残废人，装有一条假腿，他以做生意为名，直接打入国民党空军地勤司令家中，托故为其爱妾兜售空运私货，了解和掌握敌空运

情报，为我军封锁敌空运，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指挥依据。李国栋、高博儒两同志于1948年6月3日被捕。他们在督察处特务们的酷刑之下，只承认个人有“地工活动”，其余一概不知，抱定了必死念头，义无反顾。督察处查封了富源长制米厂，也找不出其它线索，以“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安法”为名，呈批处死。李、高二同志于7月×日就义。长春解放后，人民政府找到了李、高两位烈士的遗体，将其棺殓，并开追悼会。

张正平同志下属还有一个工作组，负责人李野光，合法身份为长白通讯社记者。他打入了国民党的中统特务组织，从中吸收了三四名为我们工作的人员。从而掌握了该特务系统的全部组织情形和活动情况。因此，在长春解放的同时，我公安部门曾一举捉获了长春市内的重敌特20余名，并一网打尽了松北若干个县的中统特务组织和破获了一些敌特活动电台。②

为了进一步瓦解敌军，围城指挥所指示，各围城部队尽可能利用条件派人打入长春守敌内部，进行兵运和搜集敌情。据此，各师均以各种不同方式派人打入当面之敌的内部。这些被派遣的同志，都起了应有的作用。如独立第八师派入敌暂编五十二师某连的魏国臣同志，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敌六十军由吉林撤退时被收容的该连长的妻子和孩子送入长春与其亲人团聚。那位连长的妻子深为感激，临行时留下了她丈夫的一枚印章，意思是一旦我方有人进城需要她丈夫尽力之处，可持此为证。魏国臣同志是通过一个商人的关系持印章入城的。组织上赋予他的任务是：第一，打起仗来使这个连队，或者该连的一部分举白旗；第二，有什么重大情况，立即设法脱身出来

报告。魏国臣同志到该连后，连长为了遮掩政工人员的耳目，一面下令把他“押”起来，一面暗中贿赂监禁者，说他“是我的恩人”，不可虐待。接着，他要魏国臣做他的勤务兵。直到长春守敌受命准备突围，该连长立即暗中打发魏国臣出城，要他回来报告情况。③

长春围城的胜利，是我们在长春守敌内部的内线斗争与外线政治攻势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没有地下党长期于滇军内部沥心沥血地工作，六十军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于长春起义；没有第六十军的起义，新编第七军焉能放下武器？当然，政治瓦解之所以成功，也取决于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的压力，二者缺一不可。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在起义前曾说过“待时机成熟则起义”的话；这“成熟”之“时机”，也正是被我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到山穷水尽之际。舍此，得挣扎时还要挣扎。因此，围困长春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我军军事与政治斗争互相结合、互为作用的战斗结晶。

① 参考《吉林市文史资料》第3辑第108—109页。

② 查阅长春市档案馆有关资料及参考张正平本人的回忆。

③ 参考原独立第八师敌工科长苏甦的回忆。

我党政军民共同对敌

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是我军建军的原则，也是我军历来克敌制胜的法宝。在这个原则下面，我军才能够紧紧地和全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地支援，克服各种困难，战胜一切敌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军逼近长春之后，长春市委就立即抵达长春市郊与我军一道开展工作。我军每向前推进一步，地方政府的同志们，就立即以紧张的工作态度出现在新区。他们一面大力支援前线。紧密配合围城部队执行对敌经济封锁任务；一面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新的政权，从事长春市郊当时的紧要工作——救济灾民与恢复生产。

在我围城指挥所全面部署了对长春守敌实行军事包围，政治瓦解、经济封锁的同时，我吉林省委和长春地区的党政军民，

在东北局的统一领导下，顿时融为一体。共同研究部署了军民联合对敌斗争问题。6月29日，各围城部队防区的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宣告成立。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党政军民同心协力包围、瓦解和封锁长春守敌。对敌人斗争委员会按围城部队各师的封锁区域组成，打破原有的县区界线，以各师的封锁区域来确定各区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工作范围。由各师的政治委员担任主要领导。此项工作，以长春的东南郊地区较为活跃。如，在长春正南独立第六师方向，设有长南区；在长春东南独立第九师方向，设有净月区；长春正东独立第八师方向，设有兴隆区。这三个区的各方面组织都较完善，先后成立了人民政府，并对各村、屯都派出工作队。

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是党政军民行动一致的综合权力机构。在整个围困长春的斗争中，根据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情况的需要，不失时机地提出各项工作任务、斗争策略和工作手段。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形成了一股所向披靡的巨大力量。当时，在对敌斗争委员会地领导下，开展了稳定社会治安，生产救灾，安排难民，对敌包围封锁各项工作。

较为普遍地进行了清查户口以了解社会情况。这不仅是对封锁区内的人口普遍进行清查，造册登记，而且也是一项政策性很强、较为复杂的工作。因为这些地区既是我军的防区，又是灾情严重的新解放区。要细致地摸底，要全面掌握社会情况。一方面要严防特务、土匪混入我区进行破坏骚扰；另一方面还要查清潜藏在我区的敌人，以及敌伪统治体系，建立人民新政权。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统治机构，保甲组织，必须一律

捣毁。迫使这些敌伪机构人员，交出档案和文件。由于这些旧人员了解当地情况，对尤大民愤的一般人员，可以不究既往，暂时使用，但不给以实权。对敌伪统治机构负责者，一律不用，追索其所有文件，调查了解其本人材料，密加监视。除个别罪大恶极、不打击不足以平民愤者外，一般暂不斗争，将来再清算。对地主，一般也不组织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地主及国民党政府官员，只要不继续作恶则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否则才依法惩办。在进行此项工作中，尽量避免树敌过多，被敌利用。

群众渴望新政权，只好先成立起区、村、屯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暂时无适当人选，即先由工作队兼任，然后再尽快地指派或选举村长、屯长，由于群众没有发动，暂时不成立农会。通过生产、救灾、对敌封锁等各项活动，发现和选出大家可以信赖的干部，逐步建立起受群众欢迎，组织简单、实际、方便工作、不拘名义的权力机构。要紧的是防止在新的权力机构中，干部队伍不纯，作风不正，甚至新瓶装旧药，成了伪旧人员的蔽身之所。当时的确有些村、屯的农会，是自发组织的，有的干部欺压群众，向群众索粮要款，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有的农会，是地主操纵的假农会。然而，当时对这样的农会组织，还不能立即宣布撤消。因为群众的觉悟程度还不高，又缺乏领导能力，只好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逐步取消更换。①

稳定我封锁区内的社会秩序是当时一项重要工作。这些地区，社情异常复杂。为了消除隐患和防止土匪滋生，收缴了藏于民间的零散武器。这些零散的枪支弹药，大部藏匿于地主、或潜伏的特务、土匪手中。有些地区在我部队进驻之前，土匪活动异常猖獗。如长春县的兴隐区，是土匪盘踞时间较长的抢粮基地。

土匪对群众摧残比较厉害，仅保安区被土匪杀害者就有100多人，打伤者20多人。米砂子、万宝山等地，被土匪杀害者也很多。长春县各区，被土匪杀害者平均不下50人。原因是这些地区曾被我军进占过，开展过一些地方工作，如初步组织了农会，进行了一些反奸反特活动等。后来，我军后撤，地方工作不得不停止。于是，土匪、特务们则乘机伸了进来，对当地群众进行残酷的报复。土匪们说：“中央军不发饷，胡子不能不抢，不杀穷人头，对不起老蒋。”^②因此，当地群众在一段时期内，对“农会”这个名称颇有忌讳。

这些反动透顶的匪帮，大多是我后方逃出的地主武装与当地的地主武装结合组成。他们直接受国民党新编第七军的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抢掠、搜集我军事情报、造谣惑众、制造恐怖等活动。这些土匪帮系很多，头绪很乱，十个一群，二十个一伙，都各有自己的“司令”。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有的长期隐伏在我封锁区内，打冷枪、发射信号弹，或者穿着我们的军装，拿着我们的护照，进行破坏、扰乱活动。

我军逼进长春，国民党军队龟缩市内后，这些土匪武装大部被改编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其余者则潜藏于民间，伺机活动。群众深受其害而又不敢检举。这些潜藏于民间的，多为当地的地主武装，他们的能量还相当大；在我区内，还潜有地主特务组织。仅在兴隆区，我独立第八师一举就起出了藏在民间的50多支枪。我独立第六师的长南区，也起出各种枪20支，子弹738发。整个长春外围封锁区，收缴的零散武器虽无确切统计，但为数不少。这对消除隐患和稳定社会治安，起了重要作用。

组织群众生产救灾，成为当时的一个迫切问题。遭受国民党土匪破坏的家园要重新建设，生产与救灾必须双管齐下。我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提出的口号是：“不撂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当时，这些地区的情况，越是靠近长春市的边缘越惨，已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群众瘦弱不堪，不但生产无法进行，如不迅疾采取救济措施，饿死人的情况将更增多。因此，从后方调进大批救济粮、种子和其它物资。但是，运输需要时间，远水救不了近火。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是先就地筹划一些粮食。如借地主的存粮，除留给他一两个月食用外，其余部分分配救济。富农有余粮也可以借，但方法较和缓些。此外军队节约口食、各单位上交的缉私粮也都用来救灾；还有一种办法是发动群众开展互助，或者以衣物到就近的封锁边缘区换点粮食应急，等等。③

在生产问题上，由于特务土匪们造谣破坏，有些群众对我老解放区进行过的土地改革有些误解，因而思想有顾虑，特别是不敢种逃亡地主的地，农忙时也不敢雇短工。经广泛宣传并提出“谁种地给谁发粮”，“谁种地归谁收”的口号，群众的生产情绪才逐渐提高起来。对春耕分片包干，并由我各围城部队，派出大量的人力和畜力协助支援。所以，在长春外围的肥沃土地上，不久就显现出大自然的盎然生机，郁郁葱葱的庄稼充满了沃野。

但是，这样的斗争成果，的确来之不易。耕耘中土匪干扰，自然可以用武力排除；而一旦误了农时，却非人力可以挽回。故此，组织灾民生产，决非轻而易举。譬如，我独立第九师封锁区的净月区（原为双阳县部分地区与长春市郊部分地区

组成)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7月上旬提出了“三抢”运动。何谓“三抢”?就是发动与组织全区7个行政村,95个自然屯,2954户,12550人口,突击10天进行抢铲、抢蹚、抢种。原来这个区的情况是:全区8321垧耕地,仅种上了3721垧,只达总数的2/5,并且青苗有20%已经荒芜,其中约640垧青苗收成绝望;未荒的土地,70%尚未完成第一遍铲蹚,如在10天左右不能铲蹚,也要荒芜;已经补种了的荞麦地为1084垧,仅占原来预计补种4000余垧的1/4,何况,已经到了“挂锄”,其农时形势之紧张,不言而喻。然而,该区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提出的“三抢”运动,实现又谈何容易?一是劳力不足,人吃马喂两缺;再是新区群众觉悟不高,在缺乏物质保证的情况下,更不易发动。净月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第一,充分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变工互助;第二,加强领导,借助于解放军的大力协助和后方的支援。正值该区困难时刻,我围城指挥所号召各部队节约粮食,救济灾民。驻该区的独立第九师除无代价地支援地方40匹牲口外,并交节约救济粮23000斤,缉私粮4000斤。政府从后方调来救济粮22万斤,加上群众互助的粮食16000斤,按人口分配,每人平均可得20斤。基本上保证了劳动力吃饭才能下地的要求。截至7月20日,该区抢种摆荒地2000余垧,抢铲青苗地1—2遍,抢蹚1遍以上,挽救和抢种大田4000余垧;并补种荞麦250垧,菜地260垧。如无意外情况发生,该区估计秋粮食收获可达16000石以上。如每石按480或600斤计算,全区近13000人口,人均粮食可达600—700斤。

独立第六师封锁区内的长南区,有20个村,92个自然屯,共有土地9253垧。在围城部队的支援下,完成春播5963垧,还

准备尽可能多种些荞麦和秋菜。这一地区，政府拨救济粮10万斤，军队交节约救济灾民粮7 600斤，缉私粮1 027斤。按户分配，平均每户可得160斤。

独立第八师的封锁区兴隆区，跨九台、双阳两个县的各一部，该区既保证了春耕，又补种了荞麦1 000晌。部队交节约救济难民粮10 431斤，交缉私粮38 206斤。指战员捐助现款东北流通券147.74万元。

党政军民融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战斗威力。在这种威力面前，任何困难都要为之低头让路。事实证明，在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下，使长春市郊数十万灾难深重、濒于死亡的人民群众获得了新生，这与长春市国民党占领区形成鲜明对比，我军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实际行动，与敌方杀民养军政策是何等地截然不同！对比之下人民充分看清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同的本质。

当时，在长春市内曾流行着这样的民谣：

“小白菜哟，地里荒啊，长春市里，没有粮啊！没有粮啊，人心慌啊；遭殃军啊，守不长啊。守不长啊，快投降啊，顽固不化，见阎王啊！”

“高粮叶子，青又青啊，长春市里，不点灯啊！不点灯啊，蒋匪横行，姑娘媳妇，没有命啊！没有命啊，闹革命啊，里应外合，攻进城啊！”④

这就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呼声。

收容救济难民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长春守敌以灭绝人性的罪恶行动，在抢尽市民存粮，使他们陷于饥饿之后，又把他们强行驱出市外。当时，在敌我封锁前沿之间的中间地带中，

徘徊的难民多达8—10万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在这个难民停留的区域内，由于国民党土匪队伍的抢掠，早已十室九空。难民们陷于严重的饥饿状态，饿殍与日俱增！

吉林省委根据东北局指示，根据军民联合对敌斗争的需要，为救活这为数众多的难民，于8月14日发出《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决定中明确指出，由唐天际、武少文、董昆一、朱明、李庭序、李焦等同志以及长春、九台、伊通、双阳等县县长参加，组成处理难民委员会。唐天际为主任，武少文、董昆一为副主任，负责领导和处理难民一切工作。8月19日，处理难民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决定下设兴隆、净月、长南3个办事处，负责调查、检查、教育、管理、救济、转送难民等事务。3个办事处的负责人，兴隆为李庭序、净月为张成华、长南为李焦。各办事处在我封锁前缘地带的工作，受该地区对敌斗争委员会领导。

收容和救济难民，采取定点放行的办法，当时考虑到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织领导方便及交通条件，确定主要在兴隆、净月、长南3处开设放行口，在西部也适当放行一些。首先由各办事处派出若干检查组，深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登记、发放难民放出证和救济粮。处理难民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只限在我军警戒线附近地带的难民，在敌区边缘地带的尚无办法救济。第二，不能行动者就地救济，每日能走5里以上者，送长春边缘各县安置，每日能行走15里以上者，遣送指定的较远各县安置。第三，救济办法，放出者按指定安置地点的行程，计日发粮，并多发2日份；就地救济者，按每日每人应发数目，3天发1次。第四，对放出人员进行检查。此项工作较为复杂。要防止坏人混入我区，要严格防疫，也要防止长春市

内的难民继续外涌。因而必须做到：不公开号召难民出城，选择对象进行救济；经检查后，无论是放出或就地救济，均发给救济证；检查中发现反动首领及重要嫌疑分子，则分别遣送处理；一面检查，一面进行宣传、调查，对难民态度要和蔼。第五，集中分批遣送。确定长春（指当时的长春县）九台、双阳、伊通、永吉、舒兰、磐石、桦甸、德惠、蛟河等十县接收和安置难民。为防止紊乱，不影响我后方秩序，指定遣送路线，途中各县、区、村，设大小招待站，禁止难民在非指定路线地点流亡。

3个区的处理难民办事处都做了大量工作。独立第六师封锁区的长南地区，工作秩序好。那里的难民自己组织起来，派代表与我工作人员接洽，并预先造好名册交付审核。先后有20 000余难民，有组织、有秩序地分批附册移交收容站。最多时该区出口在一天内即放出6 000余人。就兴隆、长南两个办事处的统计，从8月中旬到9月底，收容与救济的难民分类如下：

兴隆区，独立第八师方向：学生，6 224人；医务人员，194人；车夫，851人；小贩，1 621人；商人，4 575人；工人，6 305人；农民，708人；自由职业者，1 229人；其它，8 275人。共计，31 302人。

长南区，独立第六师方向：学生，3 202人；医务人员，204人；商人，25 287人；工人，10 679人；农民，3 368人；技术人员，869人；教师517人；职员，1 079人；军人，160人；铁路工人，258人；邮政工人，21人；其它，22 826人。共计，68 471人。

难民到我解放区后，大体采取了以下安置办法：有劳动能力的工人及各类技术人员，一律交由吉林省政府工业部分别检查使用；十六岁以上的青年学生，不论男女，一律送到东北大学，集中检查教育；原属东北其它各省籍的难民，由处委会介绍回原省；无依靠的妇女、孩子及老弱病残，分散到各县适当安插，或发动群众救济；一般市民，尽可能利用其社会关系安插，或分散到各县参加生产；反动首领及重要嫌疑分子，属军事系统的，送军区政治部，地方系统的，交由公安部门处理。⑤

党政机关和当地群众在对敌封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对长春守敌军事包围的基础上，实行梯次的军民联合经济封锁。即除军队担任封锁的第一线外，在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的统一安排下，地方于封锁区的纵深内设立层层封锁组织，以弥补空隙，严防坏人潜入和粮食走私贩漏网等情形发生。如独立第八师封锁区内的九台县，提出了“全面总动员”的口号，男女老少，一齐上阵，结合生产活动，执行经济封锁任务。各县县大队、区中队在封锁区内到处设有检查站。通常每区设3个站，每站3—5人，主要任务为检查来往行人，并组织与指挥各戒严队的行动。

戒严队，每个村都有。除坏人和地主不能参加外，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规定男人16岁到50岁，妇女20岁到40岁，儿童8岁到15岁，都分别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白天是妇女儿童站岗，晚上是男人青壮年站岗。戒严队成为村中群众组织的主要形式，因为这些地区当时还没有成立农会组织。原因是过去哪里有农会，土匪就到哪里去摧残、杀人，故暂不成立农会。戒严队的任务不只是军事戒严、经济封锁；而且还要担负起动

员抢种、组织田间管理，和救灾等工作。

开展群众封锁，要严密组织，规定大家都必须遵循的各项制度。如有的区提出了5项要求和八点做法。五项要求是：走私的要缉回来；出城来的人要堵回去；特务、坏人要发现；执行任务要依靠贫雇农；完成封锁任务要结合生产。八点做法是：深入动员，讲清政策和纪律；每行政村按具体情况制订封锁计划（包括封锁要点地区、岗哨设置、巡查路线、缉私方法、村屯之间互相通报手段等）；制订群众封锁纪律，村屯封锁公约，儿童团守则，戒严队纪律等；查获走私案件，依其情节轻重召集村屯检阅大会，及时奖励与处分；划分第一、二、三线，层层封锁，上山打柴割草，也要盘查；夜间组织打更、看青，建立窝棚，每5天进行一次无规律的清查户口，检举黑户。⑥

据7月中旬统计，地方武装和政府工作干部，参加专职经济封锁工作的，即有300余人。并且，随着此项工作任务的加强，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地方同志熟悉当地情况，在开展对敌经济封锁工作中，具有特殊的效能。他们分数到各地发动群众，在封锁区第二线所取得的成绩，往往是第一线不能取得的。如兴隆山村，在10天内就堵截了14个由长春潜越我警戒线的难民和1个走私商贩。又如，独立第六师方向的长南区，从难民携带的物品中，清查出国民党军队服装47件，并查出难民私贩粮食683斤。

在纵深25公里的封锁区内，检查站和封锁的重点区星罗棋布。从政府人员、地方武装到广大男女老少，紧紧地同我围城部队并肩战斗，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洪流；这万众一心结成的严密封锁网，使任何坏分子和走私贩，都无隙可乘。

组织与保卫秋收也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春种是为了秋收，春天抢种不易，秋天抢收劳动果实麻烦更多。春种时，要排除国民党土匪队的百般干扰；到了秋收，则要严防饿急了敌人出城抢粮。那一年，长春外围我封锁区内的庄稼长势较好，可望八九成的收成。全区种上的地共约50 000垧，每垧地可望收4石粮。粮食品种，高粮、大豆各占1/3，其它包米、谷子等杂粮占1/3。秋收要从9月中旬开始，先收杂粮，后收高粮和大豆。这段农忙期大约半个月。

对此丰收景象长春守敌难免垂涎，势必乘秋收机会出城抢粮。估计敌人抢粮的方式，很可能以军事出击掩护为主，或勾结土匪，或组织市内饥民，用分红办法诱惑他们出来偷抢。为此，我第一兵团（此时“围指”已改为第一兵团）于9月1日发出保卫秋收的指示。指出，保卫秋收是部队当前首要任务。要求各围城部队以顽强积极的动作，压缩敌人；打击敌一切大小抢粮部队以及土匪活动；加强封锁、严禁走私。提出的战斗口号是：“不让一粒粮一根草被敌人抢去！”“不让快饿死的敌人复活！”“不让一个抢粮的敌人逃回去！”⑦

军民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广大群众和保卫秋收的武装力量，都组织到秋收这条战线上来。提倡四快：快割、快打、快藏、快运。收割中组织一切男女老幼及难民，编成互助组、变工队。先收割前方，后收割后方。靠近前沿的地区由部队和地方武工队担任掩护，最前沿由部队掩护夜间抢收。我各围城部队，除以战斗姿态掩护秋收外，还从二线部队抽出人力、畜力支援秋收。我第一兵团要求：各师每天至少要抽出1/10的人力和1/5的牲口、大车、支援秋收。

· 独立第十师成立军民联合秋收委员会，以师政治部主任为主要领导，二线部队和后方机关，秋收期间抽出1/2到1/3的力量，直接帮助和领导群众秋收。在师属各部队于驻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的基础上，全师抽调60名排以上干部，配合当地政府分布在本师防区内的56个村，领导农民收割4960余垧，产粮15157石。在阵地前沿的庄稼，于9月16日前全部收割完毕。又如独立第六师，对全防区的秋收工作做了先前沿、后纵深，集中力量抢收的具体部署。为了达到颗粒收回，该师部队前出到距敌前沿200米处收割庄稼。敌向我收割部队发射数十发炮弹，指战员们置而不顾，有条不紊地收割完23亩谷子。在狼沟洞以西的庄稼，因靠敌最近，则采取集中力量边割边运。一夜之间完成110亩。接着，又将靠近敌人不远的欢喜岭一带的庄稼，采取边收割、边用人往回背的办法，于9月20日全部抢收完毕。

在助民秋收期间，我围城各部队均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令人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完整的统计。这里只能提到一些不完整的数字。如，独立第十师参加秋收人力为7023人，牲畜137匹，大车103辆。独立第六师出人力2064人，收割作物2082亩，平均每人收割1.75亩。独立第七师参加人力为1434人，收割作物2321亩。这3个师的数字，也恐怕是东鳞西爪，肯定不全。

春抢种，秋抢收，都是在敌情威胁和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在我武装保卫下进行的。如此特殊条件的农业生产，也只有长春外围对敌封锁的斗争中才能产生。边战斗，边生产，从春到秋，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的对敌封锁斗争的胜利和粮食生产

的双丰收。这是我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并肩战斗的丰硕成果，也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建军宗旨所发挥的巨大威力。这是我军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从我军围困长春开始，到敌第六十军起义，新编第七军和一兵团投诚，解放长春，这当然是两军力量的较量；但也决不可忽视人心向背的对比，国民党想用杀民养军的办法做救命草，结果并没有摆脱覆灭的命运，我党我军则坚定地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与人民休戚与共，从而取得了胜利！人民是胜利之本。

-
- ① 参考《围城简报》第1期《长春市南郊目前封锁生产救灾中的几个问题》。
 - ② 摘自《围城简报》第2期长春县兴隆乡来信。
 - ③ 参考《围城简报》第1期中共双阳县委来信。
 - ④ 摘自长春市工委档案。
 - ⑤ 参考1948年8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
 - ⑥ 参考中共净月区委《关于生产救灾封锁的报告》。
 - ⑦ 参考1948年9月1日我第一兵团《关于保卫秋收的指示》。

我军力量的源泉

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

由准备对长春守敌地强攻到久困长围，这对部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转折。初期立足于打，整个部队从思想动员到战术、技术训练，以及战场勘察、物资装备准备等等，都做到了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广大指战员擦拳摩掌，都想在解放长春的作战中大显身手，争当战斗英雄。可是，紧接着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强攻为久困长围。这个转变对整个部队来说，决不只是个现在打还是将来打的问题。且不说部队那一时还没有转过弯来的急躁情绪，只是那当即采取的对敌经济封锁的斗争手段和必须执行的政策，不仅是摆在广大指战员面前的新课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作战环境的考验。有些人在枪林弹雨中无所畏惧，但却难以理解和接受这从未经历过的特殊对敌斗争策略。

围困长春的斗争，异于全国解放战争各个战场的历次作战行动。

围困长春的作战手段，是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综合体。它的斗争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常规作战的一般过程。在常规作战中，一个战士和基层指挥员，只要攻得勇猛、守得顽强，就可以完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围困长春作战则情形特殊，光凭勇敢还不足以圆满完成战斗任务，它要求每一个指战员在执行对敌包围封锁任务中，要具有相当的政治头脑、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一定的处理问题的政策水平。也就是说参战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具有打仗、瓦解敌军和执行经济封锁政策的三种本领。这对广大围城部队的指战员来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当时我围城部队的作战环境也很艰苦：被封锁的长春守敌缺粮，我军也面临着粮食供应运输不及时的问题，长春外围已遭土匪抢掠一空，军粮无从筹划，部队只好依靠部分黄豆和寻找当地的地主借些存粮，维持半饥半饱；时值雨季，阵地建设尚不完善，战士们站在潮湿甚至有积水的堑壕里担任战斗警戒，而且没有可以遮雨的场所和雨具；盛夏季节的阵地上，草丛茂密，害虫麇集，不堪其扰，战士们风趣地概括说：“苍蝇瞎蚊子加小咬，昼夜不停四班倒。”

综上所述，做为我军生命线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必须具有与新环境相适应的新内容。在围困长春的过程中，军内外曾不断出现过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矛盾，适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妥善的工作方法，也在不断地转化这些矛盾，使它朝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并使一些问题迎刃而解。因此，可以说我军之所以取得围困长春的重大胜利，主要是我军内部稳

健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了部队的团结一致和始终如一的高昂士气；是在正确的政治思想指引下，从上到下坚定地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

我围城部队的政治素质情况是比较好的。部队骨干大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士，部队成员绝大多数来自经过土地改革后的翻身农民。他们在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号召下，参加了人民军队。入伍后，除经几个月的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外，更主要的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教育。1948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部队进行了新式整军，普遍开展了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以及“找本挖根”、“倒糊涂”等活动。独八师三团设大灵棚、灵牌，由苦大仇深的战士痛哭失声地控诉旧社会之苦。这些有声有色的政治教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在1948年解放全东北的号召下，开赴长春外围作战执行围城任务。事实证明这些来自翻身农民的战士，经过部队熔炉的锻炼，已经起了很大地变化，成为有高度阶级觉悟、纪律性较强、并有一定的政治嗅觉和辨别一般是非能力的战士了。

围长之后，于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政治委员肖华同志在报告中分析了对敌斗争形势，并富有说服力地指出了围长斗争特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阐明了对敌围困封锁的重要意义。指出：“东北局和总部决定以军事包围、政治瓦解、经济封锁等办法来围困长春，决不是消极地对付敌人，而是要求达到夺取长春歼灭长春全部守敌、解放长春人民的积极战略目的。就是以今天的围困，造成攻打长春的有

利条件。”“我们还须了解面前的敌人，是有庞大的军队和坚固的工事的。我们以大规模的攻坚战夺取之，决不可马虎从事，而须一定的准备步骤。那么，今天的围城，也就是攻城的序幕与有效的战斗手段。”并且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时我围城部队中存在的一些思想情况。“我某些部队和机关，有些人对封锁长春的重要意义尚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如有的没把封锁当成第一件工作去做；有的反看成是单纯的军事斗争，没认识到是对敌斗争的政策，是对敌作战的形式；有的以片面的观点，或部分的、暂时的群众利益，或某些干部思想中的片面慈善观点，因而对封锁长春不严。他们不了解，长春如打不下，是长春市人民的永远灾难，也是周围群众的灾难。”同时严正指出，某些部队与机关，仍有人不顾全大局，从本位主义和个人发洋财的思想出发，做一些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事。这些同志不了解如此做法，客观上是资助了敌人，这是极不容许的。要把它看成是树立正确围城思想的重要障碍之一，必须正视和设法克服。

围指领导这些针对性很强的指示，切实地击中了我围城部队某些人在围城初期所暴露出来的思想上的模糊观念与执行经济封锁政策中存在问题的要害。当时在部队中产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主要是急躁情绪。譬如，有的干部、战士认为：“要打就打，围困什么？”“经济封锁，还不是坑老百姓，老百姓遭罪！”“再有一两个月，老百姓死光了，敌人也跑了。”有的对挖工事缺乏信心和耐心，说“挖这有啥用？还不是白费力气。”还有的单位干部战士急于求打，认为“林总”这“一慢”也太慢了，向上级提出请战：“我们包打下来”，“拚了

算了，磨到什么时候为止！”另一种思想认识是片面的慈悲观点，认为围困的办法不“人道”，因而，在执行封锁任务中，敷衍了事，私自放走了一些群众。还有一种思想是怀疑我军的力量，认为我们是因为力量抵不过敌人，才不敢打。因而，有的说“敌人有飞机运粮，光靠围，围不死”；还有的则悲观失望，认为照此“围”下去，没有什么前途。①

在执行经济封锁政策中存在的另一个要害问题是，有的生产和贸易机关与人员，从财政观点出发，营私走私，向市郊难民购买与换取货物或破烂，而运进蔬菜和其它用品。在部队中，也出现过极个别人收留和购买难民或逃兵之衣物笔表等现象。②

基于上述情况，围指领导结合围而长春的斗争任务，对围城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内容，这些内容，也就是我围城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总依据。围指规定我围城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总任务是：以高度的战斗动员保证围城任务的完成，并在围城中贯彻攻打长春的战场练兵工作。这就要求：

——必须深入围城的政治动员，发扬部队围城战斗中高度的顽强性、积极性。首先是在干部、党员中说明围城的积极意义。围城并不是消极的，是为了夺取长春，要坚定全体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克服部队中对能否打下长春的怀疑思想和消极情绪。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当时部队的战斗准备工作。并要求以当时关内外我军攻城的若干胜利的战例，如收复开封、洛阳、临汾、四平、鞍山等实践来教育部队，以增强攻打长春的必胜信心。其次是要在部队中树立优良的战斗作风。

担任守备的部队，要提倡顽强守备；担任反击的部队，要强调动作迅速，勇猛机动。在战士中，要提倡创造独胆英雄；干部中要提倡积极负责，服从指挥与敢于胜利的精神。要从每次大小战斗中去掉各种坏的习气——游击主义、分散主义以及本位主义的观点。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会直接妨碍大规模、集中统一的围城任务。友邻部队之间，要做到互相团结，互相策应、主动支援；反对备扫门前雪，互不通气。

必须针对不同的作战任务，把政治工作与当前的战术要求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政治工作要保证各个不同战术任务的完成。发动群众动脑动嘴，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克服困难。这样，才能使每个指战员对完成自己的任务具有充分的信心，这种信心也才是有技术基础的，而不是空中楼阁。但是，也还要注意到长期的围城任务会使部队产生疲劳、急躁、厌烦、疏忽等现象。这种现象，也会影响任务的完成，政治工作对此也要及时防止和加以克服。为此，要把政治工作的重点，放在第一线部队，要创造一套适合第一线的文娱活动与教育工作的方式。如快板小报、通俗战士读物、大鼓、顺口溜、小传单、流动俱乐部等。要加强保卫工作，及时揭穿敌人的反动宣传。物质保证上注意恢复战士的体力。后方机关及政府应经常组织剧团到前线慰问。

——利用战斗空隙，进行战场练兵。这种练兵是面对着敌人的练兵，是最实际、最生动，与战士的切身经验相结合的，与当前任务完全一致的练兵。训练内容主要是达到攻城的要求与目的。为此，必须练习如何反击、攻坚等战术、技术。政治工作要保证人人有熟练的技术，能掌握自己的武器。要开展练

评与战评结合，做到学与用完全一致，边学边用，边用边改。要克服练兵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必须发扬军事民主，干部要亲自领导。多表扬模范，提高战斗观念，创造出的一套战场练兵的方法。

——政治教育应贯彻城市政策与时事教育。在城市政策教育方面，要达到下列要求：一要转变对城市的看法，没有城市，革命就不可能最后胜利。要树立能打下城市并能巩固城市的信心。二要弄清党的城市各种政策，这对干部更为重要。如保护工商业、劳资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三是人人要熟悉总政所颁布的城市的八大守则，并要自觉地遵守，克服发洋财思想及破坏城市纪律的现象。四是要适当地指出过去土改中对城市政策的左的偏向，教育干部战士，尤其对参加过土地改革的新战士更为重要。五是要求各级干部及领导机关要检查反省本部队或本人对城市政策的错误认识。这样，会使认识深入一步。方法要采取民主方式，发挥自由思想，但不应放松领导。在教育中要防止形式主义或急于求功的思想。团以上的领导机关，要传达《反对五种恶劣作风》及《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与前言。

在不妨碍战斗与练兵的条件下，做好驻地的群众工作。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动员群众参加对敌封锁，帮助群众搞好生产，禁止使用民力。部队要尊重地方的同志，与他们配合工作，虚心采纳他们的意见，保障地方工作同志的安全，主动同地方同志搞好团结。

围城指挥所在围城初期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不但明确了围城部队政治思想工作

必须遵循的方向；而且，也指出了部队中现存问题和还有可能发生的不良倾向。事实证明，围指指出的那些问题，是很有针对性和预见性的。仅以七月中旬对独立第八师的调查情况为例，对实行经济封锁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的情形，在干部战士中颇有人在，前面提到的那几种思想偏差都有反映。违犯纪律政策，买便宜东西的情形，在大部分单位都程度不同地发生过。

针对上述情况，独立第八师根据“围指”政工会议精神，在部队中大力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前后召开了五次干部会议传达与布置围城工作，反复阐明对敌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重大意义，并且批评了各种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在战士中，则采用先暴露思想，再组织辩论，最后解答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说理教育。在开展说理教育中，要搞通的主要内容是：

- (1) 早打、晚打，到底哪种办法对我有利？原因何在？
- (2) 为什么不让城里的老百姓出来？
- (3) 为什么要没收进城的粮食？
- (4) 没收进城的走私粮食，又救济灾民，是否要手腕？
- (5) 封锁到什么时候为止？要达到什么目的？

通过展开辩论，解决了部队中许多人头脑里的糊涂观念，是非明了，头脑清醒了。在此基础上，又请从长春逃出的国民党士兵介绍长春市内及长春守军的情况。逃兵们说：“这样围困两个月也坚持不下去，每次空投的粮食还不够两个团吃一天的”。逃兵们讲的敌军内部的困难和士气低落的情形，生动有据，非常有说服力，增强了部队围困长春的信心和决心。指战员们纷纷检查自己以往的模糊观念。并表示决心，认真执行围困和封锁任务，做好攻打长春的思想准备。部队士气更高了，

干劲增强了，严格地执行了封锁政策，违犯纪律的现象趋向杜绝。

当然，独立第八师并没认为部队经过教育后政治形势较好，就可以从此一劳永逸；他们认为，随着围困长春期间的延长和形势的不断变化，还会出现反复或其它糊涂思想，必须随时抓住思想苗头，有针对性地做好政治工作。

与此同时，对独立第六师也做了在围城作战中的思想状况的调查。情形与独立第八师大同小异。不过，由于该师部队于7月6日反击过敌人的出击，干部、战士的思想有不同的特点：

(1) 练兵的重点是攻坚，而练兵部队却要轮流防守阵地。守阵地的部队，以工事为依托，击溃了敌人的出击。因而，对工事的作用增强了信心；但练兵的内容，却又是准备向守在坚固的工事里的敌人进攻。坚守与攻坚，前者有作战实践，尝到了依托工事作战的甜头；后者则是变更作战手段的准备。因而，有些战士在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和顾虑。

(2) 干部的思想与战士不同。一部分干部对围城作战产生了厌倦情绪。原因是在学习《反对五种恶劣作风》及《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时，只注意解决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却忽略了中层干部的思想状况。

(3) 战士思想表现虽为求战心切，但其动机却大不相同。如十六团在围城动员摸底时，战士们急于要求快打的动机可分为以下五种：一是老战士不愿意练兵守阵地；二是有一部分老兵曾参加过1946年攻克长春的战役，他们凭老经验介绍长春如何好打，使一部分战士产生了轻敌思想；三是有些东满、北满籍的战士，认为打下长春就算完成了任务，就可以歇兵回

家了；四是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不怕死，主张打，因为围城显示不出勇敢战斗的精神；五是有一部分人出于早日解放长春的心愿，并且认为各地逃亡地主都进了长春，这一下可以把坏根挖净了。总之，是一种急躁情绪。

因此，独立第六师认为，不能满足于眼前部队饱满的士气；更应防止因战斗胜利（7月6日反敌出击）而滋长的骄傲轻敌思想。同时，又必须把“要求打”的士气持久巩固下去。当时该师采取的办法是：一、及时传达敌人的军事、政治情况变化，使大家明白，这些变化就是我军围困得来的成果，以增强胜利信心，坚定围城思想。二、结合学习城市政策，树立我们打城市一定能胜利，而且能巩固的信念。三、在干部中，特别是中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中央颁布的两个文件，从自己的思想整顿起，统一干部思想。四、积极开展练兵，提高技术、战术，在练兵的同时，结合说明敌我攻守战术的不同特点。五、及时总结军事、政治、战斗、挖工事等等各方面的经验，首先在所属部队交换介绍，以达推动部队工作的作用。下级干部因缺乏经验不善于总结，则由师团机关分别深入营连，具体帮助。

独立第六师还采取了组织战士提出问题、暴露思想，然后开展辩论的方法来提高大家的认识。具体做法是，辩论之前组成若干访问小组，通过访问，解决部分解放战士和新参军的战士，对我军力量怀疑和缺乏胜利信心问题。如，他们访问了我军炮兵阵地，见“来了许多大炮”，就提高了信心；访问了难民，就了解了长春市内的混乱和困难情形，访问了国民党军逃兵，就深知长春守军内部生活情形以及思想状况。当战士们弄清长春守敌因食黄豆饭许多人发生腹泻时，对围困长春的成

果，有了新的认识。

随着思想问题的解决，我围城部队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各师还在“八一”建军节召开了奖模大会，树立典型，表彰先进，进一步促进了围城工作的开展。应该说，我军不仅将十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陷于不能自拔的绝境；而且，在我军思想建设的战线上，通过围困长春这个特定课题，也总结和取得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长春最缺的是粮食，作为一个大城市，其它的日用品并不太缺乏。因此，有的出城的难民携带一些衣物，找附近的老百姓换吃的。这种交易，极不公平，往往是难民付出的代价过高。我军干部战士，也曾一度出现过少数人用粮食换取难民的日用品的现象。个别连队，竟集体决定用粮食换难民的日用品，特别是钢笔、手表之类的东西。还有的以我们的东北流通券换国民党的钞票，谓之“红钱换白钱”，托人进市内购买衣物、布匹及其它用品。

上述问题一经发现，立即引起了领导机关的重视。围城指挥所指示各部队，除对违纪者进行批评教育外，凡来路不正当的东西，一律上缴；个人付了钱的，按个人实付钱数发还本人；收缴物品，由政治机关统一处理，作为救济难民或奖励干部、战士之用。

在严肃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围城指挥所通报表扬了独立第八师二团四连班长李凤春同志，并公布了他的先进事迹。李凤春同志，于1946年参军，一贯表现较好，在围城斗争中，他站稳党的立场，认真地执行了封锁政策。他不但自己不贪小便宜，不发难民财，也教育全班不要这样做。更值得称道的，是

他做为一个一般战士和普通党员，敢于挺身维护党的利益，向不良倾向做斗争。战士们看到连里有的干部买了东西，自己也想买，李凤春同志立即集合全班耐心地说服大家：“咱们研究研究，看买东西对不对？买东西对执行封锁任务有什么坏处，有啥妨碍？对老百姓有啥影响？要是没坏处没影响，那咱大家都买。”但有的同志仍然强调：别人买，干部买，我们也可以买。李凤春向连队领导反映，个别干部仍然说拿“红钱”到卡哨外去买东西行。但他仍规劝战士，不要买东西。

在支部大会上李凤春仍坚持意见说：“现在咱们是担任封锁，根本不该买东西，随随便便上街买东西影响不好且不说，那还封锁个啥？我不同意。”③他不怕孤立，不怕打击，不计较个人得失，完全从全局出发，为革命利益着想。“围指”在宣扬李凤春的典型事迹，号召部队向他学习的同时，并号召所有在这方面违犯纪律的同志，自觉地反省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于是，这股歪风很快地得到了纠正。先进典型的事迹起着教育和鼓舞广大指战员的作用。

总之，我军围困长春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从提高阶级觉悟入手，进行为何打仗、为谁打仗和如何才能打赢这场仗的充分说理教育。这种生动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保证了围困任务的圆满完成。

① 参考《围城简报》第1期。

② 参考1948年7月20日围城指挥所下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封锁政策的几个问题》。

③ 参考围城指挥所1948年8月24日通报。

绝境中的长春守敌

处于绝境中的长春守敌，虽有负隅顽抗之志，奈何缺乏力挽狂澜之师！士气江河日下，斗志完全丧失。

蒋介石倒是给长春守敌注了不少“强心剂”。今天声称从这里调兵，明天许愿由那里遣将，给他们一些空洞的精神寄托。有的国民党军将领，在“固守”困难重重的压力之下，把蒋介石写给他们的“坚守待援，大军即将前赴解围”的亲笔信看了又看，希望从那字里行间得到安慰和鼓舞。甚至把蒋介石称兄道弟的拢络手段，也视为荣誉和珍宝，每次看毕，都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①

为了苟延残喘以待援兵，长春守敌采取了不断小股出击的办法，进行一些试探性的突围和企图抢粮的袭扰活动。同时，还将骑兵旅，保安旅等一些地方部队，驱赶到我前沿附近的缓冲地区，掩护正规部队的作战行动。

为此，我围城指挥所曾责令各部队依据具体情况，采取出击或袭击的方式，消灭这些前出在我前沿附近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如我第十二纵队出击盘踞在慈恩医院之敌，独立第七师袭击小南屯、宋家洼子骑兵一旅之敌，独立第八师袭击马车地号，等等，都是此类战斗。综合统计，在围困长春期间，这类战斗约30余次，歼敌4 000余。

直到9月末10月初，我军解放义县，锦州告急，才使一些人如梦初醒，意识到蒋介石的诺言只不过是十足的骗局。他那称兄道弟的亲笔信，只是一剂令人给他卖命殉葬的迷魂汤。例如，曾泽生和陇耀当时就曾大骂：“老蒋简直是个大骗子！我们再也不能相信他‘坚守待援’的鬼话了！再也不能上当了！”陇耀气愤地大骂：“他妈的！‘坚守待援’，援个屁！说得好听，是‘放屁暖狗心’啊！（云南土话）”于是，曾泽生把蒋介石几次写给他的称兄道弟的亲笔信，三把两把撕得粉碎，扔进纸篓里。所谓“援兵”的泡影，从此宣告破灭。

当时，流行在长春市的一首民谣曾把长春的状况生动地概括为“十个不少和最多”：

长春市的蒋家官兵不少，携械投诚的最多。

长春市的楼房不少，拆了当柴烧的最多。

长春市的接收大员不少，贪污受贿的最多。

长春市的工厂不少，烟囱不冒烟的最多。

长春市的老百姓不少，饿着肚子的最多。

长春市的柏油马路不少，挖得破烂不堪的最多。

长春市的商店不少，关门倒闭的最多。

长春市的学生不少，失学的最多。

长春群众的民谣不少，盼望解放军的最多。②

秋深了，收获季节到了。遭受饥饿折磨的长春守敌，眼巴巴地看着郊区大片成熟的庄稼，眼里冒火，口中流涎。于是，又开始组织试探性的“出击”了。

长春守敌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又组织过多次“出击”：9月22日，敌第六十军暂编第五十二师以两个团的兵力，趁我独立第八师三团接替二团防务之机，向三团一营周家碗铺阵地发起攻击。该营于夜间10时刚刚接防完毕，对阵地情况尚不熟悉，即于凌晨4时与进攻之敌接触。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发起冲击，有5个连攻进我阵地。同时，敌一部分兵力还迂回到我一营侧后。经该营及该团其他部队全力奋战，终于将进攻之敌击退。此次战斗，共毙伤敌200余人。长春守敌类似这样的“出击”，次数不少，其结果都是碰得头破血流，一无所获。

10月初，我东北解放军主力围攻锦州，郑洞国自知前途暗淡。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能否脱离这座死城，只有靠自己了。

8—9月间，蒋、卫于沈阳确曾有过集中几个军，北上四平、接应长春守军南下之议。及至锦州被围，此议便彻底化为泡影。

当时，为保证锦州战役的胜利，我东北各主力部队均调集辽西前线。在长春外围的第六纵队、第十二纵队，也奉命调至通江口、开原之线。我围城的一线部队，只有第六、七、八、九、十独立师和后调来的独立第十一师等，共6个独立师。

此时，守敌认为有机可乘，于是组织了新编第七军大约两

个师的兵力，向长春的西北部进行出击。他们打的盘算是，即便突围不成，也可以鼓舞一下士气，摸一摸我独立师防守能力的底；此举如能侥幸占领了宽城子或大房身机场，则更为自己逃离长春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在10月4、5、6日的3天中，敌新编第七军主力，一直向长春西我绿园一带的阵地出击。

10月4日下午，因为新编第七军在绿园一带出击伤亡惨重，毫无进展。郑洞国打电话把曾泽生找到兵团部，提出要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编第七军出击。曾泽生表现消极。在郑洞国的坚持下，曾泽生于10月5日派出其主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向宋家洼子方向出击。曾泽生、白肇学亲自前往督战。并命令团长朱光云，占领谭家营子后，继续向北推进。朱光云以敷衍塞责的办法应付着。当日昼间，以化学迫击炮射击我阵地，夜间以一营三连向我阵地攻击，伤亡10余人后撤回。向上谎报以一营出击受重挫，遭我军顽强抵抗，伤亡200余人，因不支和伤亡过重，不得不撤回。这次突围试探出击，尽管竭尽了全力，计划还是落了空。新编第三十八师向我独立第七师阵地展开了全力进攻，我独立第七师部队全体指战员奋力抗击，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敌人的进敌。

与此同时，我独立第十师的阵地，也遭敌新编第三十八师之一部和暂编第六十一师的攻击。敌人首先以炮兵火力和飞机扫射对我实施压制，以配合其部队攻击。我独立第十师的部队英勇抗击了敌人的多次冲击。持续两昼夜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敌突入我阵地的1辆坦克，被我击毁。敌人逐渐不支，退回原进攻出发阵地。战斗到第3天，敌人又将暂编第五十六师

调来参战。

新编第七军的3个师几乎全部投入了战斗。由于敌人的拼命攻击，敌约1个团的兵力，突破我前沿之一段，窜至长春西南、距市区约12公里的白龙驹一带。在我军的追逼下，龟缩于一座宙宇内。我追击部队发起围攻，一举全歼该团。至此，突围试探又以伤亡惨重的全面失败而告终了。不甘于“坐以待毙”，结果仍旧摆脱不了“坐以待毙”的命运。

其实，长春守军的高级将领们，对他们本身和整个守城部队的前途，是一清二楚的。

10月5日，六十军遵照郑洞国的指示，派出一八二师五四五团，配合新编第七军的出击。曾泽生、白肇学到前方督战，与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相遇。曾泽生同李鸿单独闲谈起来。

曾泽生表现愁苦地问李：“目前，我军士气很低落，兵无斗志，贵军情况如何？”

李鸿不耐烦地说：“士气很低落，大概都相同，没有什么两样。”

曾泽生又问：“你看，我们还能够继续守下去吗？”

李鸿愁苦着脸说：“困难太多啊！”

曾泽生想进一步探查一下李对固守和突围，到底抱有多大信心。因此说：“突围，我们六十军是没有指望的。你们还是可以的。”

李鸿摇摇头，表示信心不大。曾泽生以为，新七军战斗力最差的是暂编五十六师。因此，他又试探地问李鸿：“五十六师可以突出去吗？”

不料，曾泽生这一问竟引出了李鸿的一肚子牢骚：“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军官有军官的做法，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是围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架子就散了！”③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突围试探，失败是必然的。

10月7日那天，郑洞国又来到曾泽生的指挥所。曾泽生向他提出：“官兵没有粮吃，饿着肚子冲不上去。而且三天出击，伤亡过大，部队不能再打下去了，必须撤回。”郑洞国又问李鸿，李鸿也主张撤。郑洞国无奈，只好同意：“那就撤回来吧！”说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叹气不止。④是啊，摆在他面前的事实正是这样：守，是坐以待毙；突围，又根本没有希望，出路在哪里呢！

可是，接踵而来的，是蒋介石命令郑洞国率部突围的三道“催命符”。

早已陷入绝境的长春守敌面前只有起义、投诚和被歼三条道路，在等待着他们的选择！

① 参考《吉林市文史资料》第2辑。

② 引自长春工委档案材料。

③④ 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

我已布下天罗地网

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固守长春，目的在于牵制我军部分兵力，以便减轻其沈阳、辽西军队的压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尽可能延缓时间，等待其它战场的态势改善后，再抽出兵力增援东北，达到永远控制东北的目的。万一东北守不住，则尽可能保存实力，将东北军队收入关内华北地区，养精蓄锐，伺机卷土重来。蒋介石之所以令长春守敌“固守待援，相机出击”，正是基于这种目的。一直拖到“待援”绝望，“固守”不能的情况下，他才严令郑洞国从长春“突围”。真使郑洞国左右为难。

但此时此地的郑洞国，仍然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对蒋介石、卫立煌的命令不能不执行；盲目的侥幸念头，不能不有；破釜沉舟的愚蠢之举，不能不做。

此时，我第一兵团指挥部的工作也主要着眼于歼灭突围之

敌。并早已从多方面着手进行着反突围的作战准备。如对预定战场地形的勘察，制定反突围作战方案等等。并且，依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反突围作战方案经过反复修改，也多次向围城部队以及担任中途阻击的部队，下达了准备歼敌于南逃途中的指示。同时获悉辽西会战的局势，迫使长春守敌从机关到部队，立即投入了突围行动准备：各部队一连几夜组织操练跑步行军和急行军，炒黄豆准备分发给士兵做干粮，民间的马车一抓而空。此外，还将部队的军官眷属集中于海上大楼，将病残马匹全部屠杀吃掉。

从上述的一些迹象表明，敌人无疑是在准备“突围”了。

我第一兵团于9月16日，向部队下达了防敌突围的电令。电令中详尽地分析了敌情，并提出了三个打击突围敌人的方案。

第一方案，如敌突围以后沿中长路为主南进时，我军兵力部署：（1）、独立第十师、独立第九师、独立第八师等三个师，首先消灭翼侧大屯附近之敌（估计敌兵力可能在一个师左右），然后，再沿中长路歼敌主力；（2）、辽北部队的独立第十二师以及内蒙骑兵第二师，对大黑林子之敌实行侧击，然后向中长路追击；（3）、独立第七师即从中长路敌主力侧后尾追攻击；（4）、独立第六师，配合辽北部队（独十二师除外），向刘家店地区之敌突击，截击其一部；（5）、如大屯附近有敌两个师以上的兵力时，独立第六师、独立第七师、独立第八师、独立第九师、独立第十师等部队，首先歼灭大屯之敌，尔后，转向陶家屯、刘家房子地区前进。

第二方案，若敌主力向中长路以西逃窜时，我军兵力部

暑：（1）辽北部队任务，内蒙骑兵第二师以一部阻击敌人，师主力则越至三棵树、八面城一线，阻击敌人，其它各部队，向梨树、八面城一带阻击敌人；（2）、独立第六师、独立第八师、独立第十师等三个师，向朝阳坡、山林子、榆树台地区追击前进，独立第九师于独立第八师后跟进；（3）、独立第十二师、独立第七师，则向敌侧背由西北向东南侧击，尾追前进。

第三方案，如敌不走中长路，而沿伊长路西侧逃窜时，我军兵力部署：（1）、独立第九师一部于谢家山节节抗击敌人，该师主力则由东向西侧击敌人，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2）、独立第十师、独立第八师、独立第六师，则由西向东沿乐山镇到望山镇以北地区，向红头山、大南屯及其以北之敌突击；（3）、炮兵任务，除配属独立第六师、独立第十师各一个野炮连外，团集中主要兵力兵器截击敌主力，打乱敌行军序列，压制敌炮兵，支援陶家屯、刘家房子间各突击队作战、并向占领要点之敌进行炮火袭击。

电令同时指出，由于参战部队较多，为便于协同作战，采用各独立师之间委托指挥的办法，以利于统一行动。

对于歼灭突围的敌人，肖劲光司令员当时提出了具体的预想。他指出敌人从突破口窜出后，其兵力一定多而且较为集中。我各反敌突围部队在作战行动上宛如插向敌人的一把刀子，这把刀子究竟该如何插？就是说，插的深一点好呢？还是浅一点好？如果要把这把刀子深插，就必须把部队全部集中。这样，固然可以多截击敌人。但是，突出重围之敌，会象一股很强的洪流，纵然将它突然截住，其冲力之大，仍旧难免要漏

掉很多。如果这把刀子插得浅一些，采取多插它几刀的办法，我参战部队即可成梯次配置，从侧面打击敌人。这样，可以一个梯次消灭一部分敌人，放过一部分敌人，由第二梯次再从侧面伏击；余下的敌人，再由第三梯次去解决。会使敌人的兵力逐次减少，士气更加萎靡、沮丧，最后，不但可以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而我部队的伤亡，也能大量减少。①

我第一兵团司令部的反敌突围作战方案，就是根据肖劲光司令员这一作战思想制定的。各准备参战部队均根据预定的作战方案，到现地勘察了地形，并向营以上的干部作了传达。此后，又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充实和完善着这一反敌突围的作战方案。

9月底，我第一兵团又电令围城各独立师。大致内容是：

（一）、我第六纵队、第十二纵队已调往开原、通江口附近地域。我主力部队正在围攻锦州。围困长春的作战任务，由独立第六、七、八、九、十师以及独立第十一师完成。

（二）、据一切迹象表明，在此期间，长春守敌很有可能向外突围，各独立师务须马上集结，以师为单位，进行反敌突围的作战准备。

（三）、在长春守敌尚未突围之前，我各围城部队仍以少数兵力与侦察分队，伪装成围城部署的原样，以迷惑敌人。同时，仍旧进行政治攻势，瓦解敌军。

（四）、各独立师之部署做如下调整：独立第九师以1个团及侦察分队，担任河沿伪满军官学校、车家店及石碑岭之线的警戒任务，师主力集结于奢岭口子一带。独立第十一师（欠1个团）准备进城，以1个团接替独立第八师陶家窝棚、十里

堡、金钱堡之线的警戒，另1个团及师部驻兴隆山。独立第八师于交待警戒任务后，全部集结于兴安堡整训待命。独立第七师以1个团及侦察分队，担任上下台子、水塔、樊家营子、杨家粉房、火烧里之线警戒，该师率主力（及炮四团之榴炮连）集结于张家窝棚、驛马站以西地域。务须注意以炮兵控制宽城子及大房身机场。独立第十师，派1名团干率1个营及侦察分队，担任石虎沟一带的警戒任务，并直接受独立第七师指挥；该师部则率主力集结于范家屯东南之五台子、井家台地区。独立第六师（含独十一师1个团）以1个团及侦察分队，担任孟家屯、荆家窝棚至刁家山一线的警戒，师部率3个团及炮四团的1个营，集结于长春堡西南之马家岭、西马店。

（五）、各警戒部队采取宽大正面防御措施，进行有重点的、据点式的防御配备。次要地段可采取巡逻警戒措施。若敢出击，则依托工事给敌以猛烈地杀伤，然后，再行节节抗退，但务须察清敌出击之目的。

（六）、各独立师之部署调整，限于10月2日以前全部完成。

（七）、调来归兵团指挥的3个独立师（辽北部队），各以1个团的兵力，于朝阳坡、公主岭、二十家子、三十家子一带控制红头山有利阵地，以阻击迟滞敌人。各师主力则集结于二十家子、靠山屯至伊通南北地区待命。

兵团司令部暂驻四家子不动。

为了增强反敌突围的兵力，除原已调归第一兵团指挥的辽北部队3个独立师外，东北总部又为第一兵团增调了安东的1个独立师，合龙前指8个独立团，松江前指4个独立团，吉嫩

前指7个独立团以及蒙古骑兵第二师。加上原围困长春的6个独立师，共为11个师又19个团。若按团计算，共为52个团的兵力，分布于长春以南的昌图至梅河口地域，准备歼灭长春突围之敌。

此时，我第六纵队和第十二纵队，位于开原、通江口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利于机动的位置：既可以对长春突围之敌进行自西向东地侧击或就地正面阻击南逃之敌；又可以监视沈阳敌人的动向；同时，一旦需要，还可以向辽西战场机动和向东一直可以控制到沈阳以东的地带。上述部署对长春准备突围之敌构成了不可逾越的天罗地网，不论敌人从哪里突围都将遭到我军的歼灭。

我军撤下的天罗地网敌人是否知道呢？大致情形知道一些，但很不具体。譬如，在郑洞国召集曾泽生与史说密商突围的会议上，曾与史都估量过突围中可能遭我若干兵力的打击，但他们只计算了6个独立师和两个纵队。仅此，就已使准备突围的敌人，颇有谈虎色变之慨了。其实，他们所指出的那些兵力，只不过是军布下这张大网的半数。

截至10月9日，我第一兵团所指挥的各部队，依据当时情况，又做了如下调整配置：

——独立第十一师，位于长春以东兴隆山附近地域。

——独立第七师，位于长春以西车家窝棚一带。

独立第八师、独立第九师、独立第十师，位于双阳以西，小龙王庙、大南屯地域。

——独立第六师、蒙古骑兵第二师，位于大黑林子、公主岭一带。

辽北独立第一师、独立第十二师、独立第十三师，位于伊通以西，乾沟子、靠山屯、大孤山、二十家子等地域。

——安东独立第三师，位于伊通县。

——合龙前指 8 个独立团，位于西丰、西安（现辽源市一带）。

——松江前指 4 个独立团，位于梅河口一带。

——吉嫩前指 7 个独立团，位于烟筒山、朝阳山一带。

上述部署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对敌撤退企图的判断更加具体。兵力部署更加集中。在这样一段地域狭窄、纵深只限长春以南至吉、辽接壤地区，不过一二百公里的距离内，集中了密度这么大的兵力，且莫说对手是经我久困长围 5 个月、而又经多次突围试探的遭挫折的败军之师，即便长春守敌那两个军是精力充沛的强敌劲旅，也禁不起我重兵的步步打击。何况，敌人这一路所经过的，都是我解放区。这些地区，大部经过了土地改革。已经当家做主的翻身农民，对人民子弟兵坚决拥护，全力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南逃的长春之敌必将寸步难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等待他们的只有覆灭的命运。

可是蒋介石却还在那里接二连三地命令突围。

10月10日，在一批飞临长春上空的机群掩护下，一架小型飞机俯冲下来，投掷了一个束着红带的小包。包里装有蒋介石令长春守敌突围的手令。蒋介石的手令不只给郑洞国一个人，也分别给曾泽生、李鸿写了亲笔信。信中的大意是，空中投粮，已无法继续，命令长春守敌向长春以求突围，经吉、长之间取路南下，转至抚顺以东的营盘。蒋指令驻营盘之国民党二〇七师接应。然后，再转去营口。同时还许诺，突围之际，派

飞机掩护。

蒋介石的这一“突围”手令，正值郑洞国刚刚组织过较大规模地突围试探出击遭受挫折，全军将士正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下收到的。饱尝失败之苦的郑洞国和他的高级亲属们，对蒋介石的命令，不能置若罔闻。立即进行密商。可是，此时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经开始酝酿着全军起义的大事，对这种眼睁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的“突围”议题，当然不会发生什么兴趣，只不过是敷衍而已。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抱病在床，副军长史说也表示无可奈何。

蒋介石第2次催促郑洞国“突围”的电令，是在第1次空投手令的两三天后。郑洞国依旧找来曾泽生、史说磋商。结果还是徒增烦恼，无计可行。

10月16日上午，飞机空投了蒋介石的第3道突围的命令——一份“国防部代电”和一封蒋介石给郑洞国的亲笔信。

尽管蒋介石的“代电”和亲笔信的措词如何的严厉和“恳切”，但对长春守敌来说，已经是无济于事了。由于六十军酝酿起义的大局已定，蒋介石那份促令“突围”的“代电”，连同长春守敌的“突围”部署，很快就由曾泽生将军派出的代表送交我第一兵团司令部。

郑洞国表示，“总统既然决心要我们撤退，我们就只好走吧。”他抱着“效忠党国的思想，甚至是以身殉职的决心，“按令行事”。决定长春守军分为两个纵队向清原转移。第六十军为左纵队，先沿吉长公路向吉林急进。待先头师通过岔路河后，即令该师向吉林佯攻，掩护军主力折向东南方双河镇前进。俟全纵队通过岔路河后，先头师即任全纵队后卫，转向吉

林、盘石铁路线，跟随全纵沿铁路线向海龙、清原前进。新编第七军为右纵队，先由新三十八师向长春南部大屯佯攻，打破缺口掩护暂编第六十一师向南急进，占领伊通伊巴当，担任翼侧掩护。新三十八师则做为右纵队的先头师，向西沿长春双阳向烟筒山、砬石铁路线前进。暂编第五十六师先任长春守军的后卫，固守市内的城防工事，待新三十八师撤出长春后，改为后卫，随后跟进。暂编第六十一师待暂五十六师到达双阳后，即向双阳转进，担任右纵队的后卫，掩护兵团退却。预计16日夜间开始行动，17日拂晓开始出击。实在走不通，就拉上长白山。对此，曾泽生曾打趣地问郑洞国：“你还想在共产党的天底下打游击啊！”^②

郑洞国的突围撤退计划已经拟定。

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正在等待着他们！

巧合的是郑洞国决定“突围”行动的时间，也正是我六十军宣告光荣起义的时刻。如果当天没有六十军此举，长春守敌的“突围”战，就要打响了。

① 参考肖劲光《久困长围取长春》。

② 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13页。

第六十军光荣起义

负责固守长春市内东守备区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于1948年10月17日宣布起义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骤然改变了国民党军在长春“固守”的局势，不仅促使了新编第七军和一兵团部的被迫投诚，长春市的迅即解放，而且对整个东北战局、乃至全国各个战场，都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我党对滇军长期争取工作和内线斗争的丰硕成果；是我军政治瓦解敌军政策的重大胜利；是几个月来对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国民党第六十军爱国进步的将领们、以及他们所率的全体官兵，长期渴望光明探求真理，最后做出倒向人民一边的重大抉择。1948年10月17日，对围困长春战役来说，是个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日子，应该为它欢欣雀跃。

国民党第六十军的光荣起义，其原因固然离不开我军事压力的一面，但这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特别使第六十军难以容

忍的，是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多年来深受其害。五华山事件之恨尚未消除，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一调来东北就又落入该事件的执行者杜聿明之手。第六十军从到东北，就一直在忍气吞声中苟延生存，官兵上下，早已忍无可忍。加之我地下党在该军内部历史悠久的策反工作。因而，第六十军的起义内在因素颇多，决非偶然。军事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使其举义时机成熟。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是一位爱国将领。他识时达务，在关键时刻，反蒋起义。但当时也是不容易的，是准备付出大的牺牲代价的。六十军大部将士们的眷属都在云南家乡，如果起义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轻易放过这批“反属”的！可想而知，六十军的全体将士们在决定起义之前，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

曾泽生将军长时考虑的问题是，摆在六十军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最后落得个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被歼于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当然，最后促使曾泽生将军毅然下定决心的，是北宁线被我军切断、锦州被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大势已去的形势。曾泽生为国民党军若干高级将领做出了表率，成了历史上受人称颂的将领。

应该承认，做为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从忠于国民党的反人民内战的阵线中解脱出来，的确不是一件易事，没有脱胎换骨的决心，是做不到的。第六十军虽不为蒋邦嫡系所信任，但在反共的根本立场上还是一致的。譬如，杜聿明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对第六十军的看法，就有这样的话：“我认为云南部队虽非

蒋军嫡系，可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他们非到绝望时不会轻易动摇，只要我信任他们的高级将领，照顾部队装备较差情况，不给予他们重要任务，守后方城市，万一发生情况，再以大军支援，不会出什么意外。”①杜丰明的这些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即便滇军将领对蒋介石不满，也不会轻易倒向共产党的一面。他们要维护卢汉在云南的地位，对龙云、卢汉有怀德报恩思想，甚至抱着“可以叛蒋，不能叛龙、卢”的观念。尽管内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排挤打击，外遭我军的进攻与包围，内外交困，艰险重重，前途暗淡，但仍然含垢忍辱，任劳任怨，以期维持云南政治局势的稳定，不负龙云和卢汉而后已。真可谓一片赤诚，对天可表。欲憾之，岂是易事？

9月22日的晚间，曾泽生第一次找来了平时与他感情接近互相能够信赖的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和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首先提出了起义问题。陇耀赞同，他认为应掉转枪口给蒋介石以致命打击。白肇学也同意反蒋，但自己却想“解甲归田”。第二天一早，曾泽生又去一八二师与白肇学推心置腹地畅谈，终于打通了他的思想。

对于陇耀，曾泽生是心里有底的。早在1947年6月，他就向刘浩同志表示待相机行事。当年1月，陇耀的暂编二十一师驻防于海龙。他的女儿陇若兰是在云南读书的进步青年，当时曾同她的母亲来海龙看望过陇耀。陇若兰曾在多次谈话中劝告她的父亲选择正确的道路，不要为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出力卖命；同时也指出“可以叛蒋，不能叛龙、卢”的狭隘观念是错误的。这些谈话，对陇耀的思想转变颇有影响。因此，在曾泽生第二天专访白肇学，经个别交谈统一思想后，六十军的

三位主要将领，终于确定了反蒋起义的方针。具体行动计划的研究工作，也从此在严守秘密中展开了。三位将领几次密商的详细情形，已有文章叙述，不必在此重复。

就在曾泽生将军与陇耀、白肇学密商起义的过程中，蒋介石促令郑洞国率部突围的三道手令陆续下达到长春。郑洞国已经决定17日拂晓开始突围了。事情发生的竟如此巧合，10月14日，我军攻克辽西重镇锦州，也恰在这一天，曾泽生将军派出同我军联络的代表——张秉昌、李峥先找我一兵团部联系起义。历史就是如此无情，同在一个东北战场作战的国民党部队，在同一个时间内，有的被歼，有的却走向了光明的新生。

张秉昌、李峥先两个人带着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的联名信，于14日凌晨出长春，当他们经我独立第九师师部，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穷岗子敌工站时，已经是15日凌晨的3点钟了。张、李二人首先见到了刘浩同志，当即又受到我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同志的接见。当唐天际主任向刘浩、潘朔端征询对此问题的看法意见时，刘、潘二同志认为，六十军起义的诚意应予充分相信。同时，刘浩同志表示，他愿意亲去长春与六十军接洽。

兵团首长们正在司令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部署反敌突围问题。当唐天际主任与刘浩同志来到司令部说明敌第六十军派人联系起义时，有的同志对六十军的起义持怀疑态度，认为该军声称起义是假，麻痹欺骗耍花招、达到突围逃跑的目的是真。肖劲光司令员冷静地分析了情况后，认为六十军起义的真实性是很大的，同意刘浩、潘朔端两同志的看法，并同意派刘

浩同志为我军代表进入长春同他们谈判。肖司令员说，六十军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如果企图突围就消灭它。根据肖司令员的指示，解方参谋长同刘浩同志来到政治部召见了张秉昌和李峥先。明确对他们表示：（一）第六十军反蒋起义我们欢迎，如果不是真的，借起义之名而行突围之实，我们则采取坚决歼灭的行动；（二）第六十军要掉转枪口沿中山路对新七军及郑洞国的兵团部设防；（三）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将反动军官六十军参谋长徐树民、军统特务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崇及该师三个团团长扣押起来，强制暂编五十二师服从指挥；（四）六十军应派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暂编二十一师付师长任孝宗为正式代表，商议起义具体事项。张秉昌、李峥先也是我军派回去的工作人员，他们二人在六十军并无正式职务，不能代表六十军。上述四条请张秉昌、李峥先回复曾泽生军长，然后，即派车送张、李二人到暂编二十一师前沿，回去复命。

就在张秉昌、李峥先出城与我军联络的同时，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我地下党组织也决定全团起义。派人出城向我兵团政治部汇报和请示。经我兵团首长研究后确定，因六十军即将全军起义，政该团的单独起义为支持全军起义。曾泽生军长组织起义时，临时指挥所即设在该团团部。

张秉昌和李峥先于16日下午才由暂编二十一师的防区回到城里。二人带回的消息，使曾、陇、白十分欣喜，当即派出李佐和任孝宗做为正式代表，同我军共商起义的具体事宜。李佐和任孝宗带来了蒋介石给郑洞国的手令和国防部“代电”，并且，还带来了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唐天际主任向他们传达了根据东北局指示精神、兵团领导研究的意见，欢迎第六十军全体

官兵起义，起义后的待遇完全同解放军一样，六十军不必参加解决新编第七军的作战，由我部队在接收六十军防务后，再解决新编第七军，六十军按照我兵团领导指定的路线，向九台开进，组织整训。唐天际主任还通知李佐和任孝宗、刘浩同志为我军代表，随同他们一起进城。

10月17日上午，刘浩同志与李、任副师长到达曾泽生的临时指挥所。

就在我军代表刘浩同志同曾泽生军长商谈起义计划的同时，新七军、一兵团部以及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们，枉图想尽一切办法挽回这种局面。如新编第七军参谋长龙国钧，打电话给陇耀，抱怨说：“既然久为战场上的兄弟，为何突然事变毫无商量。”陇耀敷衍说：“事出突变，也是我料想不到的。”于是，两人约定，两军之间虽各有主张，但决不互相残杀，以中山路为界，各自约束部队防止冲突，听候自上面下的解决。这次电话，从表面看，似是龙国钧与陇耀的私约，实际上却是代表两个军的双方协定，自然是生效的了。

17日早晨，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和长春市长尚传道代表郑洞国前去与曾泽生会晤，曾很干脆地对三个人说：“我们已经决定起义。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他们愿和六十军一起行动，我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要想把六十军剿灭再突围，也只有听便。”说完，他把手向外一指，“你们可以请回了。”

17日上午，我军代表刘浩同志征得曾泽生的同意，与郑洞国通了电话。没有任何结果。

第六十军宣告起义，打乱了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已经开始

出击行动了的新编第七军，又各自撤回了原防。六十军撤出长春前，曾泽生曾给郑洞国和李鸿分别写了一封信，意在劝他们放弃反人民的立场，共襄义举，仍没有得到积极地响应。

六十军在酝酿起义期间，本军内的气氛也是很紧张的。当10月16日夜李佐和任孝宗出城后，曾泽生连夜先后到暂编二十一师、一八二师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封锁消息，严加戒备，沿中山路向新编第七军布防，监视暂编五十二师。

晚11时以后，曾泽生回到铁路宾馆，令特务营派一个班把军参谋长徐树民监视起来，并截断他的电话。接着，又令副官长张维鹏打电话通知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和所属3个团长到军部开会，来到后，把他们扣押起来。并要他们打电话把各自的副职找来，当面交代必须服从指挥，与全军一致行动。张按曾的部署顺利地解决了暂编五十二师。

就这样，在我兵团的领导安排下，曾泽生军长将暂编五十二师也挟持起义了。至此，第六十军全体官兵，共26 000余人，在曾泽生将军率领下，摆脱了反人民内战阵线，拔身而出，光荣地站到人民的一边。十七日晚，六十军即同我军交接了防务。我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九师、独立第十一师三个师进驻长春。第六十军按指定路线于18日凌晨出城，在绚丽多彩的阳光照耀下走向新生，开赴九台整训。

① 摘引自《吉林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216页。

新七军及一兵团部放下武器

1948年10月17日凌晨2时，新七军突围第一线部队已经进入了开进位置，突然传来六十军起义消息。原定的“突围”计划，只好暂且告吹。新七军所属各部队，也都象鸟儿炸了窝，纷纷向他们的将领们报告：一夜之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原来友军驻守的那些核心细胞工事和岗哨，换成了人民解放军！变一面受敌为腹背受敌。①

国民党军的某些将领，长期受封建正统观念的教育和熏陶，颇讲究孝、悌、忠、信，“忠于党国”和“杀身成仁”。长春守敌的将领们，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为了效忠党国所体现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固精神，也是对天可表的。这种精神，不但郑洞国具备，其他一些将领也有深刻的影响。

令人惋惜的是，第六十军能够义旗高举，新编第七军和一兵团部却不能效仿？郑洞国在六十军起义后所承受的重压不比

曾泽生小。然而，他却宁肯被迫缴械投诚，也不走光荣起义的道路；为的是“忠于党国”；作为嫡系和可靠亲信，其维护蒋介石政权的耿耿忠心比起非嫡系部队来，自然要坚定的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宁肯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也不愿做背叛蒋介石的事情。这些人就是这样：生怕对不起蒋介石，却不怕对不起全国人民和广大士兵。这就是新编第七军和兵团部，未能走上起义道路的根本原因。

10月16日的子夜，敌兵团部和新编第七军的将领们就获得了第六十军反蒋起义的消息。郑洞国最先接到了暂编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的电话，接着，新编第七军向他报告，中山路上对方加强了警戒。新编第七军副军长史说，当时正在按蒋介石的手谕组织部队准备突围。突然接到参谋长龙国钧的电话，说友邻的防御地带已经换了天下。

10月17日上午，郑洞国在兵团部召开会议。郑洞国问史说，“上面仍令突围，你有何意见？”史说坚持不能突围。当时，军统局特务头子项迺光、吉林省府秘书长崔垂言和蒋介石的两个督察官都在座。大特务头子们指着史说的脸说，为何不能突围，拖也要拖到长白山上去打游击。史说忿然地返回军部，会议也无结果。

面对着这突然的事变和上面命令突围的压力，究竟如何采取对策？史说从兵团部回到军部后，立即召集了全军营以上的军官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会上主张突围和反对突围的人进行了一番颇为激烈的辩论。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办，谁也提不出更进一步的主张。因而，这又是一次不欢而散，没有结果的会议。

可是，事情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拖下去，总要有个归宿和结局。应该说，新编第七军及一兵团部的缴械投诚，是下促上的结果。自然，其形式还是由上面出面谈判，双方签定条约才放下武器的。就在那些将领们还举棋不定的同时，新编第七军下面有些部队已经迫不及待地寻找出路了。起初，有的连队主动地撤销了对我军的警戒；在仅一路之隔的两军对垒下，罢战的意图莫过于把自己的后背置于对方枪口之下的了。还有一些单位，主动同我军接触接洽投诚放下武器，开始时是一些分散的班、排，后来发展到个别的连、营。

在复杂的境遇中，自然还会出现先走一步的人。暂编第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凤翔，就是在这场纷争中第一个挺身而出的人。他率先同我军正式接触了。当他得知东半城已经换了天，仅一条马路之隔就有解放军向他的部队喊话时，他神情十分紧张。“这怎么得了呢！”他的部队是摆在阵地上的，万一有事，就首当其冲。整个防御体系已一劈两半，枪口朝着自己的屁股。他焦虑地等待上面的裁决，可是军部、师部都没有任何指示。各营来电话向他告急，他只能说“告诉各连，加强警戒，无命令不准打枪”。

暂编六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来到了姚的团部。姚与吴是同乡，相处很多，平时无话不谈。吴祥伯也是来打听消息的，但他很同意姚所下达的“无命令不准打枪”的命令。恰在这时，一营长来电话告急，说解放军已逼近他的指挥所，向他喊话。听到这情况，姚凤翔反而有些放心了。于是，他要吴去一营看看，“最好能找个人过来同我们谈谈”，自己则去军部探听消息。

姚凤翔到军部见到了史说，发现没有任何安排和打算。不料回到团部，吴祥伯却真的带来了两位解放军在那里等他。其中一位四川口音，年在四十左右，自我介绍姓周是团长，另一个是警卫员。姚凤翔对我军这位团长的大胆行动很敬佩。

双方协议，保证互不侵犯，并由姚凤翔派出通信兵，与我方周团指挥所架通电话，以资联系。然后，姚又派车送我军团长等二人返回驻地。这位首次与敌接触的团长，就是我独立第九师二团团长老红军周黎同志。

姚凤翔又是架电话、又是派车送人等行动，自然会引来另外一些人的注意。直到中午前后，军和师对他都没有任何指示。而暂编六十一师第一团团长李卓鹗却打来了电话，除表示同意姚的做法外，并提出赶快同六十军取联系的意见，不要坐失良机，不要等到别人行动在先（意在联系起义）。接着，军部的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来到了姚团，也同意姚的做法，表示支持。并把他刚才从史说、龙国钧口里听到的一句话说给姚听：

“要我们起义做第六十军的尾巴办不到，放下武器是可以的。”当时，姚凤翔认为，王及人的来意，很可能与史、龙二人的意图有关。他心里有了底。

下午，军部副官处处长杨振汉也来了，杨显然是带有上面的意图，询问姚凤翔接洽的经过，表示同意。于是，两人商定立即前往当面解放军的周团指挥所，去见周黎团长。姚表示，如果新编第七军要突围、要打，他可以把他的团先带过来。周黎团长笑了笑说，老兄，我很佩服你，请莫着急，我们要争取的不是你这一个团，而是整个的新编第七军。……这一次接触，为新编第七军全军投诚迈出了第一步。姚凤翔回团部不久，军

参谋长龙国钧来电话，表示同意姚的做法，并明确提出可以投诚。

自龙国钧打来电话后，新七军各单位主动找上门来联系投诚。姚凤翔一时成了联系投诚问题的核心人物。可见，只要你的路子走得对，就会有人紧跟上来的。当确，新七军正式谈判投诚代表来到姚团集中。其中有：新编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编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新编第七军军部炮兵指挥官王及人、副官处处长杨振汉，新闻处处长杨天挺，暂编第六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加上姚凤翔共7人，于11时到达我军周团指挥所，与我军谈判代表在地下室举行了谈判和签字。当晚，我军出席谈判的，有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经谈判，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后，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二、新编第七军投诚人员不参加群众斗争大会，并保障任何人亦不得在群众大会上受斗争。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留由新编第一军伤残人员经营的某农场，并允许其个人耕种（该农场原系日本人留下，新一军做为安插老弱病残）。

四、对愿参加革命工作的，给予工作，不愿参加工作者，遣送回乡。

五、不得抄投诚人员腰包，亦不得侮辱眷属。（此条经解方参谋长提出，在解放军中就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新七军代表对解放军政策亦有所了解，同意不列此条）

在这个条约上签字的是：解方、彭克立、宁伟、姚凤翔。

接着，又讨论了一些具体事项，诸如：放下武器的部队于

19日上午在原地集结，听候接收，各部队于放下武器后，营以上的军官在新七军大楼集合，连以下的军官在新七军教导总队大楼集合……②

与此同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除将第六十军起义情况电报中央军委外，并将对敌一兵团及新编第七军的争取工作情况上报军委。电报大意说：我们昨日已告敌一兵团郑洞国等人及新编第七军投降，对郑等本人可以从宽优待。我各独立师及十二纵队、六纵队均向长春急进中，如敌不降，则歼灭之。我原围城部队于今（18日）拂晓前，将六十军防务全部顺利接完。现已将新七军内外包围起来，正依托与控制原六十军阵地监视并进行侦察，待主力到达后，攻击该敌。同时，正尽力争取瓦解中。郑洞国目前犹豫徘徊，表示可从长计议。新七军各师长表示听郑命令。现在对峙中，未有战斗情况发生。③

18日下午，郑洞国到达了新编第七军军部。可巧的是，此时姚凤翔等人正在与我军商洽新编第七军投诚问题。郑洞国此来仍旧召集师以上的部队长，提出准备突围的问题。暂编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当即表示他那个部队已经不能再打了。暂编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虽然到会，可能因为自己力单势薄，一语未发。新编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表示，听从副军长的命令。郑洞国看了看史说，史根本不表态、不作声。史说与龙国钧想留郑在军部吃晚饭，以便谈谈与解放军接触问题，郑洞国却愤然站起，冲门而走，史与龙送他出门，也不屑话别。④

下午四时许，史说下达了一道命令：准许各部队长率领自己的部队，按原定计划，路线向南突围。很少一部分自不量力主张突围的人，接到命令后，考虑到部队的现状，突围不会有

好结果，只好放弃突围的主张，同意放下武器。⑤史说此举是较明智的，起码使那些准备挺而走险的莽撞人，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防止了可能发生的内哄。

当18日凌晨六十军全部撤出长春后，我兵团解方参谋长即进入长春市内，一面指挥独立七师、独立九师、独立十一师接替六十军防务；一面直接参与同新编第七军的谈判和组织受降问题。兵团领导亲临前线，是这次组织接防、谈判以及对新编第七军受降等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新编第七军按照谈判签定的协议，于10月19日清晨，全军家属集中到军部地下室。各部队以连为单位在原地集合。通信网于上午8时交接完毕，军部的警戒也同时交我解放军。军官，营以上集中于新编第七军军部，连以下集中于该军教导总队大楼，此项工作，原计划上午12时前即可进行完毕；但因蒋介石派来了9架飞机，对长春市的东部地区进行轰炸，因而延至下午4时才结束。至此，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嫡系部队——新编第七军，就从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序列中永远地消失了。

在新编第七军广大官兵放下武器的同时，我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于10月18日亲自拟电致郑洞国，劝郑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之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⑥我军也以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的名义，给郑写信。

但这些都未能动摇郑洞国对蒋介石的愚忠。19日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到兵团部对他说：“新编第七军全体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

10月19日上午，由兵团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和刚刚下令由新七军调任兵团部炮兵指挥官的王及人等出面，与我军在电话上商定，于原暂编二十一师师部举行谈判。我方与其接洽的代表，是独立第九师二团政治委员向军与参谋长杨旭亮。

是日晚，郑洞国“坚守”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枪声、手榴弹声大作，而我军却不发一枪一弹。

21日凌晨，郑洞国的兵团部枪声还没有停止，肖劲光司令员即亲自带领独立第九师的部队，来到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前。21日下午4时，郑洞国走出央行大楼。长春解放后的一两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长春国军战至最后一弹，郑洞国将军成仁，三百余名军官殉职。”郑洞国之子郑安腾看到“中央社”发布的消息后，奉母命急急忙忙为父奔丧。可是，紧接着我《东北日报》头版，在《中国战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郑洞国和李鸿到达哈尔滨车站的照片。

①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章“长春起义和放下武器”部分。

②同上，参考郑洞国、史说、龙国均、姚凤翔文。

③参考东北局1948年10月17日——18日电致中央军委的节录。

④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67页。

⑤参考《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78页。

⑥摘引自《周恩来选集》第313页。

长春人民重见光明

第六十军起义后，我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同志即进入长春市，在我独立第九师二团团长周黎、政委向军等同志陪同下，同敌新编第七军有关人员接触，进行谈判。新编第七军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广大官兵早已厌倦内战，因而，谈判较为顺利。按双方协定的条件，新编第七军于10月19日全部放下武器。当日下午4时，全部受降工作结束。6时许，我一兵团副政委唐天际同志即抵达长春。他一面组织指挥对郑洞国兵团部的包围和谈判工作；一面着手筹划对长春市的军事管制以及同地方同志商讨如何从敌人手中接收等事宜。实际上，我以唐天际、朱光、邹大鹏等同志为领导的长春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已正式展开工作。我吉林省委，长春特别市市委及政府各部门，均为搞好新解放的长春工作做好了人事安排和准备好了各项接收工作。

当时的长春，由于国民党杀民养军政策造成的恶果，百业俱废。商业性的活动已经不复存在，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均已停止运行，所有的工厂全部停工，最繁华的街道也很少有人来往。长春，成了一座名符其实的死城，遍地疮痍，满目凄凉。国民党军构筑的明碉暗堡和障碍设施遍布街头。大街小巷，饿殍比比皆是。那些高大雄伟的建筑物，也仿佛失去了以往的光泽，灰溜溜地矗立着，象是在倾诉着凄惨的经历。这座刚刚从人间地狱里解脱出来的城市，哪里还有祖国北方名城的绚丽姿态！

我一兵团入城部队，在入城前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教育。学习了总政颁发的城市八大守则和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进入长春的部队，军容整肃，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恪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人民群众的赞誉。

当我军开进长春市内时，大街小巷，万众欢腾，许多人热泪盈眶，长期隐藏在内心的辛酸苦辣一下子都涌泻出来。人们愤怒地撕下了国民党政权搜刮民脂民膏、血腥镇压人民的布告，并把它踩在脚下。有些老年人和妇女，拉着我军战士苦诉衷肠，揭露敌人残暴统治的罪行。我入城部队，在市内并未停留多久，各师除留1个营看管和搬运一些接收的军用物资以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出城外。

我兵团司、政机关进城后，第一件事即按东北局批示，由一兵团，长春市委及独立第十一师的领导，组成长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0月21日，正式开始工作。第一件事是连夜组织给市民发放救济粮，同时决定收容流窜在市内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和收缴零散枪支。并在举行第一次会议之

后，立即以第一兵团的名义，发出安民告示——《告长春人民书》。

《告长春人民书》表达了我军对长春人民遭受的苦难，寄以深切的同情和致以由衷的慰问。对国民党在长春施行的暴政，表示强烈谴责。其次，宣传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取得的伟大胜利，指出蒋介石政权必亡，人民解放事业必胜的光辉前景。最后，着重讲述了我军宗旨及我党政策，并表示愿同长春市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共同建设长春，把遭受国民党严重破坏的长春市迅速恢复起来，并建设得更好。

10月21日晚12时，陈正人政委受东北局委托来到长春。唐天际副政委着樊科长派车去车站迎接。与陈正人同志同来长春的，还有谢甫三、朱光等同志。

翌日，于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召开第二次军管会议。由唐天际同志作了关于军管会组成工作的报告。并宣布由唐天际任军管会主任，朱光、邹大鹏为副主任。下设卫戍司令部、政治部（由独十一师兼）、市政办事处、公安局、统一接收保管委员会、秘书处、解放官兵招待处等职能部门。接着，讨论了军事管制条例和草拟的布告、通报，明确了军管会各成员的职责分工。最后，陈正人同志传达了东北局的指示：一、东北局希望长春市的接政和恢复工作迅速展开，要把各项工作做好，要为全国解放大城市提供接收工作的经验。二、军管工作应从开始起，即着手准备为不久即将成立的市政府、打好移交手续的基础。三、长春市的武器弹药由兵团机关接收处理，被服应多用于俘虏，以减轻公家一大批开支。其它物资，各部队、机关，只有责看管，无权处理。陈正人同志还补充了个人意见：一、

除武器弹药外，军用交通工具、军事器材等，交给军队处理。三、所有财产，产权属省的、市的，分别由省、市接收，属中央的，电请中央机关接收。会上，还结合讨论东北局的指示，对如何迅速恢复长春市的秩序和搞好接收工作进行了研究。①

同日，长春特别市政府宣告成立，与军事管制委员会合署办公。由邹大鹏同志任市长。②

在接收工作尚未正式开始之前，我党在长春市内的地下工作者们，也都积极地活动起来。这些同志，几乎遍布长春市各机关部门和单位。以往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如今，终于到了这些同志出头露面、大显身手的时日了。他们在各个角落组织了大量可靠群众，在纷乱中保护国家财产和文件档案，看管和监视坏人，防止坏人逃跑和乘机进行破坏，积极做好准备配合我军、政接收人员的接收工作。

——我在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内部工作的田平、吴守忠、韩文增、王作永等同志，10月19日，即在警察局内张贴了布告，并率领他们平日在敌警察局内联络交友的30余人，佩带印有长春市公安总局印章的红袖标，封锁了全部档案、枪支弹药、车辆以及所有的办公室，监视了原国民党警察局长袁家佩、副局长李贺民以及代理局长张翁石等人的行动；并且，还组织人到朝阳、宽城子、南关等各区的警察局进行了接收。同时，他们还组织电业局、电信局的职工群众保护设备，使国家财产免遭损失和破坏。由于这些同志的工作做得很细、很及时，所以，使我派往任公安局副局长的薛焰，带领李从模、赵鼎、侯诺青等同志于10月21日顺利地接收了市公安局。

——我在铁路系统的地下工作者，如刘承训等同志，率领职工50余人，保护国家财产。使铁路器材仓库、铁路工厂、22台机车和若干台车辆安然无损。在电务段的我地下工作人员王宝儒同志，坚持保护机器设备，使60台机器设备完好无损。在铁路医院的刘永升同志，全力保住了医院不遭破坏。长春车站助理站长、我地下工作人员刘贤修同志的看管下，始终井然有序，直到长春市解放。10月23日，我吉林铁路局派人顺利地将长春铁路系统接收下来。

——长大医院，是长春市较大的一座医院。我地下工作者刘亚光同志打入敌骑兵二旅第一团当了医官后，便利用合法身份长期进出于长大医院。他在纷乱中不但保护了医院的全部设备和医疗器械，并将保存在该医院的杨靖宇将军及其他三位烈士的头颅，也精心维护妥善保全下来。

——长春市由于人口减少。闲置房产颇多。我地下工作者黄勉之同志，完整地保管了房地产局的全部帐簿表册，为我接收和以后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的长春，工业不多，有些轻工业厂家，重工业很少。我打入敌生产管理局的地下工作者丛占林同志，在该局所辖的10个工厂中，每厂都安排了3—5人进行护厂。保证了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也为接收提供了方便。③

可以想象这些遍及各个角落、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勇士们，在他们渴望已久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心情是何等地喜悦与兴奋！仅仅在几天前，这些同志还冒着很可能看不到这即将到来的伟大胜利的危险，忘我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应该学习这些同志为党、为革命的一片赤诚，向他们致以崇高

敬礼的。

10月22日，我长春市卫戍司令部发表第1号布告，宣布卫戍司令部正式成立。唐天际为司令员兼政委，王效明为副司令员，宋景华为副政委，同时宣布六项规定：一，从即日起正式宣布军事戒严，戒严期间，没有长春市军管会颁发的通行证件，一律不准通行，以确保革命秩序。二，禁止任何机关部队和任何人无故鸣枪，有必要鸣枪时，先报告本部许可并通告后，方可施行，违者拘捕，以军法论处。三，凡国民党军设置之地雷区及我军控制之军事要地，禁止任何人行往，一切往来人员，应在各大小街道上行走，以保安全。四，凡本军一切部队机关团体人员，必须依本部防空警报实施防空。在警报预告时间，即禁止通行，以免混乱。五，凡残留在市内的国民党军官兵及特务土匪等，要自动报告，交出武器。对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本市人民得随时报告与逮捕，送本部或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六，对任何抢掠、杀人放火、造谣惑众等反革命行为，以军法从事。

刚刚解放了的长春，由于各治理机构组织较为健全，兼以军队进驻，总的说，治安情况尚好，社会秩序也恢复较快。因此，卫戍司令部又于10月22日相继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自10月23日起，上午8时至下午4时解除戒严，准予市内自由通行。在此时间外，仍为戒严时间。

同一天，军事管制委员会也发布了第2号布告。其内容大致为：一、凡流散在本市的国民党军官兵，限即日起到解放官兵招待所报到，以便集中招待。若匿藏不报，滋意流窜，一经查获，定予严惩。二、凡蒋匪特务机关、国民党党部、宪兵警察

等一切政治组织，业已解散。其组织成员必须立即宣告脱离其组织，不得再行活动。并须自动向本市公安机关报告。如继续活动，危害治安，一经查出，依法治罪。三、凡散布在本市民间之武器弹药及军用文件，希全体市民藏有者交出，知情者报告，散失在外者搜集，送交本市卫戍机关或公安机关。有功者奖励，如隐藏不交或知而不报者，以私藏军火论罪。四、本市在非戒严时间内，准许一切市民自由通行，并照常营业。为便于交通与维护公益起见，准予将街道两旁及十字路口国民党军设置之土木结构的工事（如地堡、碉堡短墙外壕及鹿砦铁丝网等）一律拆毁与扫除。五、本市所有建筑物（如房屋、电线杆、道旁树木等）不得任意破坏，违者严重惩罚。

解放官兵招待处，于10月22日成立。其下属各招待所，从即日起开始接待已到登记处登记了的国民党军流散官兵。解放官兵招待处执行的任务，就是具体体现我军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官兵，所采取的一视同仁的态度和宽大、优待政策。被收容在招待所内之将、校、尉各级军官及士兵，均分别根据我军供给标准供给食宿。使他们数日来惶惶不安的心情稳定下来。原国民党军新编第七军军部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军鞋处等处，及其所属的部下、眷属等，均被安置于原来的住处。他们的孩子，每天还能得到半斤细粮。那些徬徨街头及流散各地之国民党官兵，一经登记，立即得到我军的食宿供应。于是，他们奔走相告，纷纷向招待处报到登记。仅第二招待所在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即有430人率其眷属前来登记。其中包括将级军官1名，校级33名，尉级24名。国民党长春团管区少将司令李树桂闻讯后也从朋友家出来，携其全家及其副官前来登记报到。

与此同时，我接收了国民党军联勤总司令部所属之四十一医院、二三二医院以及新编第七军军直及各师的野战医院等共11所，其中共有国民党军伤病员1800余人，均得到了与我军伤病员同等的伙食待遇和治疗条件。这些人未被我解放前，每天只能喝上一点稀饭和拣末的白菜根熬的汤。新编三十八师士兵马瑞文说：“我们早就希望你们进来，好吃饱肚子。”④

总的看，我军对长春特别市的各项接管工作做得较为顺利。在开头的一两天，即做到诸事并举，百废俱兴。市内社会秩序逐渐好转。当然，也不是没有缺陷和漏洞。例如，此时已经察觉，由于我接管人员的疏于严检，戒严控制不缜密，竟检国民党在长春的两大特务头子——军统局北满站站长项迺光和袁晓轩钻了空子，化装逃脱了，这是我军接管长春工作的一个失误。

长春在开始逐渐复甦了：10月23日，《长春新报》复刊。是日，电报、邮政也全部开通。也自这一天起，工厂陆续开工，如火柴厂，23日当天即生产了4箱火柴。10月25日，公共汽车开始运行售票，10月28日全市自来水修复……

10月27日，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唐天际同志提出四项议程：检查一周来的军管工作；研究下一步主要应抓住哪些；讨论军管工作将如何向长春特别市政府移交；总结工作经验。

会议认为，军管会在短短的一周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在接收、治安、秩序管理以及城市恢复等方两，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摆在面前的问题依然不少，工作还很艰巨，有些事情并非一下子就能解决。会议还提出了若干虽已着

手解决，但又未及处理妥善的问题。如：暗藏的敌人还在活动；在接收工作上，有时因步调不一致，也发生过小的争执，因而，有些工作进展较缓慢；当时长春人口10余万，有尸体35 000具，采取以工代赈办法，掩埋了13 500具，尚有24 000具未及掩埋；准备了救济粮600万斤，从10月21日开始发放，从24日开始代售，现只发到各区400万斤，估计到达居民手中者，能占2/3；市内电话已通，市外尚未沟通；已经恢复生产的工厂，只是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等以及一些加工工业；商业尚未恢复，预计28日开市，但还面临着统一商品价格和商界提出请政府给予保障的问题；大特务头子项迺光、袁晓轩等人尚未查获，逮捕了17个可疑人，收缴了17部电台，其中有5部是密台；还有一批散兵游勇、军警宪特流窜街头或匿居市内，或与流氓土匪相结合，乞食行窃，扰乱治安，造谣惑众，甚至放火、抢劫、袭击岗哨、抢劫汽车；更有甚者，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两起谋杀我领导干部的事件，一次是对邹大鹏，一次是对那某采，均被我破获，暗藏的敌人仍在活动。

针对上述情况，会议决定了如下工作内容：一、拨经费东北流通券5 000万元，做为印刷传单、标语、领袖像等宣传之用。二、将从解放区运来的1车皮豆油，发给市民做为救济。三、尽快地搞好接收工作，以便腾出精力，对付暗藏的敌人。四、提高警惕，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五、除10月26日已发布的第3号布告，勒令流窜的散兵游勇、军警宪特限于28日到军管会报到登记外，再登报下达一个通令。六、所有进城采购物品的单位，限于28日到军管会秘书处登记，否则以不合法论，押送出境。七、由市府负责成立采购委员会，下发购买证，无证

不准购买，指定的禁品也不准买卖。八、定于10月29日上午，召开市政府科长以上、公安局分局长以上以及军区后勤部门参加的会议，研究接交工作。

自10月26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第3号布告发布后，截至28日，又有600余流散的警察、谍报分子到有关机关报到。同时，收缴枪支300余支，子弹数十万发。

长春特别市解放的第8天，各中学已纷纷复课，19所小学开学。惨遭国民党蹂躏的教育事业开始复甦。我人民政府专拨粮食救济各校的教职员工以及原来的公费生。10月28日，商店相继开业。长春解放8天来，市面初见繁荣景象。被国民党统治时期摧残倒闭的工商业，被人民政府大力扶植起来。在投放贷款东北流通券5亿元的同时，确定对新解放的长春市的工商业，免征税收3个月。

10月31日，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结束“军管”工作的会议。会上唐天际同志对10天来的军管工作做了总结。他说，本月16日，开始组成长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工作从10日就开始了。如草拟和讨论军管会的组织条例，准备救济粮，起草布告及准备通行证等等。但接收和保管办法，却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和写个具体决定。因为六十军起义了，忙于做欢迎他们的工作。接着，就是争取迅速进城。所以，有些问题，准备得还不是那么充分。⑤

1948年11月1日，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第4号通告称：“长春解放后，在此军管期间，经我党政军民全体努力，革命秩序业已确立，市政建设日趋恢复。本军事管制委员会，奉命宣告结束。本会全部职权，于本日（11月1日）移交

中共长春市委、长春市政府。”至此，长春特别市解放后的10天军事管制工作。完成了历史使命。

1948年12月1日，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于《长春新报》公布长春战役战果：

“长春围城及六十军起义与新编第七军投诚，敌军共丧失兵力95 855人。分别统计如下：

(一)、围城战果：自6月19日至10月16日，我共收容投诚敌官兵19 612名。携来武器计有：六〇炮10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38挺，冲锋枪8支，步马枪1 257支。另在历次外围战斗中，共计歼敌4 328名，合共歼敌23 940名。

(二)、六十军起义：起义参加我军官兵共计26 000余名，配属武器计有：各种炮290门，其中榴弹炮4门，山炮4门，自动炮2门，战防炮1门，火箭炮4门，步兵炮14门，迫击炮70门，六〇炮187门。另有重机枪124挺，轻机枪690挺，冲锋枪1077支，战防枪14支，步马枪6 508支，短枪144支，讯号枪32支，枪榴筒142具，汽车27辆，子弹960 979发，炮弹5 498发。

(三)、新编第七军投诚战果：(甲)投诚部队番号，包括第一兵团司令部、新编第七军军部及新编三十八师，暂编五十六师，暂编六十一师，军直属之骑兵团、汽车营等；地方部队番号，包括吉林保安旅，骑兵保安旅第一旅，第二旅，长春警备司令部，吉林师管区，松北五省流亡政府等单位。(乙)投诚人数，计正规军官兵32 000余名，地方军官兵7 926名，合共47 426名。(丙)缴出武器计有：各种炮331门，其中榴弹炮8门，山炮9门，战防炮28门，平射炮24门，火箭炮14门，迫击炮61门，六〇炮187门。另缴：重机枪146挺，轻机枪845挺，

冲锋枪1 205支，战防枪21支，步马枪 13 435支，短枪 170支，讯号枪 9 支，枪榴筒18具，掷弹筒25具，电台11部，无线电话55架，电话总机41架，单机240架，电线150公里，飞机 1 架，装甲车 2 辆，汽车419辆，大车49辆，子弹4 519 278发，手榴弹12 848个，炮弹8 150发。其它仓库物资等全部完整。

①⑤ 张萍阵中日记，10月17至22日。

②④ 见《长春新报》1948年10月24日。

③ 长春档案馆有关资料。

历史的结论

长春是我军作战史上第一个不攻而克的大城市，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略要地伸向我腹地的一个重兵防守的战略要点。当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如果下大力量进行强攻，毫无疑问是可以攻克的。但是，我军的大量消耗还是其次，整个东北战场“关起门来打狗”局势的形成，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就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把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赶入关内，增加了华北、华东战场的压力；二是迟滞了整个战争的胜利进程，很可能导致东北局提出的1948年解放全东北的战略任务落空。

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正确部署下，我东北领导机关，决定对长春守敌采用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这就保证了我军主力集中于辽西、北宁线战场，切断了敌人退路，形成了辽西战场决战的局面。与敌人的企图相反，不是敌牵制了我部分主力，而是我以非主力部队牵制了国民党军队部分主力。正如肖劲光

司令员所说的，“历史上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的色彩，非常之巧，郑洞国率领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10万人；而我攻城部队，番号和实力也恰好是第一兵团10万人”。①我十万人迫使十万守敌不得不走起义、投诚的道路。

这一事实本身，很有说服力地体现了我中央军委和东北领导机关，英明、果断而又颇具胆略的高超指挥艺术。蒋介石的算盘珠，一向是操在我们手上的。他想用固守长春，牵制我主力南下，却由不了他，恰恰相反，到是我们陷住了他的两个主力军；他又想放弃长春，回兵沈阳，还是由不了他，使他插翅难逃，当地就歼。处处是我们牵着他的鼻子走。

围困长春作战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是我军采用“久困长围”的方法、攻克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大城市的第一个成功的战例，为我军提供了在围攻大城市中，军事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等多方面的经验。

围困长春时间之长，动用兵力之多，不仅在我军作战史上空前，在我国内作战史上亦属罕见。这是一种特殊的作战方式。因此，当时有人把这称之为“困饿战”。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者结合起来，对长春守敌形成了难以抗拒的强大攻势。在围城的几个月中，国民党军向我投诚的零星人员竟达19 000余人，约占守敌总人数的1/5。这种情形在两军对垒中，也属罕见。

围困长春的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它的斗争手段远远地超出了军事作战的范围。因此，必须党、政、军、民一致动员起来，统一行动。对敌斗争委员会，就是为适应这种情况而产生的。

经我久困长围和多方面的工作，曾泽生将军深明大义，率第六十军起义，对解放长春做出了贡献。郑洞国将军及新编第七军的将领们，放下武器，率部投诚，也受到人民的欢迎。

从蒋介石的接连三道突围命令，到第六十军的光荣起义、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为时不过10来天，长春就获得了解放；廖耀湘兵团援锦，迅速被我消灭于辽西旷野，从而使整个东北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有道是“树倒猢猻散”——蒋介石对东北战场可能出现如此结局，不会没有预感。不然，他就不会象热锅里的蚂蚁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亲临指挥了。只是这“树”倒得这么早、“猢猻”散得如此之快——长春守军突围不成，东北战场几十万大军也接踵覆灭于一旦，这很可能是他没有料到的。

从现象上来看，长春市没用强攻就获得了解放。但这一胜利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代价才换来的！从外围战斗，到围城结束，经历30余次大小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我军伤亡4 000余，上千名干部、战士长眠于长春外围的地下，其中还有团营干部。更不能忘记长春市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据解放后长春市统计，围长期间长春市内因病饿而致死的人民群众，多达10万余人！

不付任何代价的胜利，是不可能有的。长春人民付出的高昂代价不仅争取了长春的早日解放，也促进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乃至全国的提前胜利。局部做出了牺牲，使全局获得了更大利益。所以，应该肯定：在历史上，长春人民为解放长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起了重大作用，也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当时来说，这一问题，也并非为所有的人都能接受

和理解。

假如我军围城之始，即把长春守敌肩上的几十万市民食口的包袱卸下来，让他们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地对付我们，岂不是失去了围困封锁的意义？既然包围封锁，就必须尽可能地给敌人制造固守的困难，几十万市民食口的包袱，宛如我对敌经济封锁的另一支强有力的偏师，卓有成效地削弱了守敌的固守能量，缩短了我军围困的时间，促使守敌早日土崩瓦解，我军早日解放长春。

历史的回答是：当时长春人民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内战所造成的恶果。国民党军在长春奉行的杀民养军政策，是导致长春市民大批死于饥饿的根本原因。

长春不攻而克，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部署。也是我围城部队，在肖劲光司令员、肖华政委的指挥下，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和认真地执行“久困长围”的正确方针的成果。

长春不攻而克，决不能忘记在敌军内部冒着生命危险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他们不怕牺牲、艰苦工作，与围城部队里应外合，成功地策动了六十军起义。

长春斗争的胜利，还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和党政机关工作同志的密切配合。他们不但为我军提供了后勤保障，而且积极地参加了对敌封锁工作。

长春解放已经四十年了，抚今追昔，教益颇多。我们深切悼念为解放长春而牺牲的烈士们和人民群众，我们更加珍惜这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

① 引自肖劲光《久困长围取长春》。

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大事记

1948·1·14—1948·10·31

1948年1月14日，我军开始发动冬季攻势。截至3月14日解放四平，冬季攻势宣告结束。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占有的地盘，只剩下吉林、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三个孤立地区。

早在1945年11月，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民党军的敌伪铁石部队，乘苏军撤离之机窜入长春。1946年4月14日，我军全歼该敌收复长市。是年5月24日，基于战略全局需要，我军又主动撤出长春。

1948年1月22日，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的第三任主帅——卫立煌来东北就任。

解放全东北的仗应如何打法，1947年10月7日，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局：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1948年2月又电示，“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1948年3—4月间，东北局、东北军区利用冬季攻势结束休整的间隙，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中心议题是，1948年的任

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以及强攻长春问题。并决定成立第一、第二两个前线指挥所。

3月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奉命弃吉就长。是日子夜撤出吉林。途中被我歼灭一部于10日抵长春近郊。

3月15日，郑洞国抵长。以东北“剿总”副司令官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的名义，担任国民党守卫长春的主将

3月25日，敌大房身机场遭我军炮火袭击，两架运输机被彻底击毁，一架击伤机尾。从此，长春守敌同沈阳唯一空中运输线，趋于断绝。

4月18日，东北军区总部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预计5月份集中8个纵队的兵力进行攻城和打援。

5月19日，长春守敌以两个半师的兵力向长春西北郊进犯，企图保护机场并逐我围城部队于炮火射程之外。5月24日凌晨，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于大房身机场与小合隆之间，将出扰之敌切断，展开激战，此战虽歼敌一部，并占领大房身机场；但却未能达到予期全歼敌人的作战目的。

5月下旬，以辽宁军区机关为基础的第一前线指挥所组成。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任参谋长。其任务是准备攻打长春。

5月26日，东北军区发出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队，根据长春外围作战与敌接触的实践及对政侦察情况的了解，冷静估量我军究竟有无一举全歼长春守敌之把握。并将有关部队上报的讨论意见呈报军委。

6月3日，中央军委电示，对长春作战问题，要充分考虑

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各项意见，攻与围，权衡利弊。

6月5日，东北军区总部对长春作战提出了三个值得商榷的预案。并倾向于较长期围城打援的第三方案。上报军委。

6月7日，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军区，同意对长春作战的第三方案。即用3—4个月围困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后再攻承德或他处。

6月15日，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传达中央军委和东北局的指示，执行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明确对长春守敌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瓦解的作战手段。调整围城部署，“围指”要求各围城部队，务于本月30日前按指定位置就绪。

6月28日，“围指”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政委代表“围指”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对敌斗争口号。

同日，“围指”发出《交通通讯工作指示》，要求围城部队进一步加修工事，挖交通壕。除环城交通沟要保持各部队之间，以及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的联系外，并要伸向最前沿，形成一个完整的地下交通网。

6月29日，围城部队各师防区的对敌斗争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各师的政治委员担任主要领导。

6月30日，“围指”发出《侦察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首长亲自动手，从部队、群众、俘虏三个方面，对长春守敌兵力的设防、工事构筑以及内部情况，进行全面的侦察。

7月1日，“围指”在李家屯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敌情，研究改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问题，特别强调加强对

接合部的封锁。

7月3日，“围指”通报，据捉获之敌特供称：6月21日由长春派出敌特50余名。30名往吉林，其余在卡伦一带。其任务为扰乱社会治安，侦察我兵力部署。该敌等会晤时联络信号，为上单衣脱下夹在左手腕里。

7月初，“围指”唐天际副政委在长春东郊召开了围城部队敌工科长会议，部署政治瓦解长春守敌的工作。

7月3日至6日，长春守敌以4个师的大部兵力，从四面向我军防守阵地出击，并以南面为主，企图试探突围方向，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7月20日，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发出对各联络处及围城部队敌工部门的指示信。提出：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是我军对长春守敌斗争的总方针、总任务。要求我军敌工工作要克服因封锁而造成的困难。尽可能地寻找时机，物色线索，建立关系。

7月21日，“围指”发出加强侦察工作的电示。内容为，近日多方迹象表明，长敌似有逃窜准备。要求各围城部队密切注意侦察长敌各方面的动向。

7月24日，“围指”发出准备粉碎长敌再次出击的作战命令。并对我东、西两地区队，分别作了打击出击之敌的具体部署指示。

8月5日和8月11日，“围指”下发两次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各围城部队把主要力量放在对敌宣传攻势上；并加强内线工作，慎重地发展内线关系；同时要求各区的对敌斗争委员会统一领导开展这一攻势。

8月10日，“围指”通报，自7月30日至8月2日，长敌地方游杂部队，曾有四起经我独立第八师地区偷越警戒线外窜，均被我消灭。要求各部引起注意。

8月16日，“围指”召集军事工作会议。根据“东总”指示，压缩部署，进一步困锁敌人，此时，“围指”已改称第一兵团。司令部亦前伸到距长春20里的四家子。

8月17日，“围指”发出围城部队军事教育的指示。指出目前在我围城部队攻击训练已有初步基础的情况下，为适应将来作战需要，应即转为打预期遭遇性的追击战斗训练。

8月19日，“围指”发出政治攻势突击周的指示。决定从8月26日起，进行一周政治攻势的突击运动。

8月21日，“围指”电示反敌突围的作战部署。指出，长春守敌在我久困长围之下，日趋瓦解、衰败，饥寒交迫，孤立无援。在发现我主力南下，沈敌及北宁线为我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很有可能突围。

8月24日，“围指”通电称：我主力在北宁线上正准备歼灭锦州南北各线分散之敌。预定下一步敌若龟缩于几个强大据点内坚守不出，则我主力仍有打长春或打援敌之可能。我围城部队对正式攻打长春仍应做准备。

同日，“围指”通报表扬了独立第八师二团一营二连四班班长李凤春同志。他不但模范地执行了封锁政策，而且积极宣传瓦解敌人。

8月14日，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采取分别收容、紧急救济的方法，挽救被长春守敌驱逐出城的难民。并以唐天际、武少文、董昆一、朱明、李庭序、

李俊以及长春、九台、伊通、双阳等县的县长组成处理难民委员会。

国民党军的杀民养军政策，给长春市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市民的粮食被抢劫一空，即疯狂地组织外犯抢粮。仅8月5日到30日，敌地方游杂部队，即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地出城抢粮行动。围长期间，反敌出城抢粮战斗多次。敌颗粒粮食未获。

9月1日，我第一兵团向各围城部队发出保卫秋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不让一粒粮一根草被敌人抢去！”“不让一粒粮一根草流入长春！”“不让快饿死的敌人复活！”“不让一个抢粮的敌人逃回去！”

9月18日，我《东北日报》发表记者穆青题为《空中投粮杯水车薪，长春蒋军粮荒加深》的报导称：“为美蒋所大肆吹嘘的长春空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欺人自欺的趣剧。每日飞临上空的运输机，最多不过四五架而已，有时更少。这些飞机，在我军四面八方的高射炮火射击之下，犹如惊弓之鸟，从来不敢低飞。只好躲在云层之上作漫无目标的高空投掷。因此，白色的降落伞，黑色的麻袋，经常一包包落到我军阵地上来……”。

9月中旬，北宁线上的锦州战役打响，我军进军号角为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敲响了丧钟，长春孤城之敌也濒于绝境。我第一兵团电示第六纵队和第十二纵队调开原、通江口之线待机击敌，各围城部队停止秋收和筑城任务，马上集结，准备与突围之敌作战。

9月16日，我第一兵团向各围城部队下达了防敌突围的电令。电令中详尽地分析了敌情，并提出了三个打击突围敌人的

方案。

9月23日，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第一兵团又召开了敌工会议。指出，今后敌工工作的方针，除继续开展对敌宣传攻势大量瓦解敌军外，特别要注意做上层的工作，为组织战场起义，创造里应外合的条件。

9月底，我第一兵团电令各围城独立师，内容为，在第六纵队、第十二纵队已调开原、通江口，我军主力正围攻锦州的情况下，围城作战任务，由独立第六、七、八、九、十、十一等6个独立师完成，为此，围城部队的防区又做了调整。

绝境中的长春守敌，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组织过多次突围试探性的出击。如9月22日，敌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向我周家碗铺阵地发起冲击，10月4—6日，敌新境第七军主力向长春西我绿园一带阵地地出击等，均遭碰壁。

10月9日，我一兵团所指挥的准备歼灭突围敌人的各部队，依据当时情况，又做了新的调整。经这次调整后，在吉长以南100—200公里的狭窄地区内，集中了两个纵队，10个独立师，19个独立团的重兵。

10月10日，蒋介石空投手谕，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并分别给曾泽生、李鸿也写了亲笔信。两三天后，蒋介石又空投了第二道促令突围的手令。

10月14日，我军对锦州发起了总攻。经31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范汉杰部10万余人。锦州大捷，引起了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

10月16日上午，敌机又空投蒋介石的第三道促令突围的手谕和一份“国防部代电”。

10月16日夜，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带着蒋介石的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代表六十军与我军商谈起义事宜。我兵团当即派刘浩同志为代表，与李佐、任孝宗一同进城，同曾泽生协商。

10月1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宣布光荣起义。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不但骤然冲垮了郑洞国的突围计划，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党军在长春固守的局势，促进了长春的迅即解放。

是日夜，我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九师、独立第十一师等三个师开入长春接替了第六十军的防务。18日凌晨，第六十军共26 000余人，井然有序地撤离长春，开赴九台整训。

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亲拟电报给郑洞国，劝其效法曾泽生光荣起义。

10月19日上午，国民党新编第七军被迫放下武器，向我军投诚。

10月21日晨，敌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将军率幕僚卫队放下武器。我一兵团肖劲光司令员亲率独立第九师部队在伪满中央银行大楼门前，等待郑洞国。

10月20日，我以唐天际、朱光、邹大鹏等同志为领导的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已正式展开工作。第一件事，是连夜组织给市民发救济粮，并发布《告长春人民书》。

是日，长春特别市政府宣告成立，与军事管制委员会合署办公，邹大鹏同志任市长。

10月21日夜，陈正人同志受东北局委托来到长春，参加了第二次军管会议，并传达了东北局的指示。

10月22日，长春特别市卫戍司令部宣告成立。由唐天际任

司令员兼政委，王效明为副司令员，宋景华为副政委。并发布了第1号布告。

10月31日，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结束军管工作的会议。唐天际同志对十天的军管工作做了总结。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 所属部队师以上干部名单：

部别	第一兵团					十二纵队			三十四师			三十五师			
职别	司令员	政委	副司令员	副司令员	副政委	参谋长	司令员	政委	副司令	副参谋长	师长	政委	主任	副主任	师长
姓名	肖劲光	肖华	陈伯钧	陈光	唐天际	谢沛然	钟伟	袁升平	熊伯涛	王亢	温玉成	谭友林	高先贵	李冰	王魁先

部 别	三十五师			三十六师					六纵十八师					独六师	
职 别	政 委	副 师 长	主 任	师 长	政 委	副 师 长	副 参 谋 长		师 长	政 委	副 师 长	副 政 委	参 谋 长	主 任	师 长
姓 名	粟再三	李光汉	齐渭川	沈启贤	王建忠	郑贵清	柴谦		阎捷三	袁克服	黄荣海	孙汉	周明国	朱子统	邓克明

部 别	独六师					独七师							独八师		
职 别	政 委	副 师 长	副 师 长	副 政 委	参 谋 长	主 任	师 长	政 委	副 师 长	副 师 长	参 谋 长	主 任	师 长	师 长(后任)	政 委
姓 名	钟人仿	全榆	马翼飞	祝世风	刘甦	江学彬	罗华生	邱子明	成启文	余勋光	刘可夫	童浩生	刘子奇	王明贵	邹衍

部 别	独 八 师			独 九 师					独 十 师					
职 别	副 师 长	参 谋 长	主 任	师 长	政 委	副 师 长	副 政 委	参 谋 长	副 参 谋 长	师 长	政 委	政 委 (后任)	副 师 长	参 谋 长
姓 名	蔡 久	章 申	桂 生 芳	廖 仲 符	钟 民	罗 文 华	谭 文 帮	冉 泽	郑 扶	赵 东 寰	蔡 明	崔 国 辉	邓 中 仁	王 玉 华

独 十 师	独 十 师													
主 任	师 长	政 委	主 任											
江 腾 蛟	王 效 明	宋 景 华	汪 × ×											

**长春国民党第一兵围
所属师(旅)以上指挥官名单:**

部别	一兵团		新七军			新三十八师		暂五十六师		暂六十一师			六十军		
军衔	中将	少将	中将	少将	少将	少将	上校	少将	上校	少将	上校	上校	中将	少将	上校
职别	兼司令	副参谋长	军长	副军长	参谋长	师长	副师长	师长	参谋长	师长	副师长	参谋长	军长	参谋长	副参谋长
姓名	郑洞国	杨友梅	李鸿	史说	龙国钧	陈鸣人	彭克立	张炳言	刘大名	邓士富	宁伟	曾德辉	曾泽生	徐树民	冷克
部别	一八二师			暂二十一师			暂五十二师			保安旅	骑一旅	骑二旅	吉林师管区		
军衔	少将	上校	上校	少将	少将	上校	少将	上校	上校						
职别	师长	副师长	参谋长	师长	副师长	参谋长	师长	副师长	参谋长	旅长	旅长	旅长	司令		
姓名	白肇学	李佐	杨正隆	陇耀	任孝宗	杨肇骧	李嵩	欧阳午	汤启圣	何大刚	韩云五	杨友梅	李寓春		

后 记

围困长春是我国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它在对敌军事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在这次战役中，我军有4 000多人伤亡，作为幸存者，我们有责任把战役情况写出来，告知来者，记取教益。

本书的撰写是在沈阳军区首长和机关、旅大警备区首长和机关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编委会负责人邹衍同志，当时任独立第八师政治委员。该师是参加围困长春作战的几个独立师中，唯一尚保留的建制部队，现在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编成内担负海防守备任务。邹衍同志曾长期在沈阳军区做领导工作，他出于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感，于1983年即倡议撰写《围困长春》一书，并得到肖劲光司令员和其他一些同志的热情支持。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遂于1985年列入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党史资料工作的专题，组织人员撰写，历经3年时间完成书稿。

我们撰写本书的原则是尊重历史事实，以历史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辅以当事人的回忆。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本来面貌。本着这个原则，编撰组用了1年多的时间广泛地搜集资料，进行走访和座谈。先后查阅100余份档案资料，访问许多当事人，召开多次座谈会，以求确切弄清当时围困长春作战的真实情况。

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总参办公厅王宪智主任、金耀明副主任、刘振杰副主任、研究室邓森泉主任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解放军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海军党史办、吉林省档案馆、长春市档案馆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吉林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及党史办、长春军分区及二道河子、朝阳区武装部等单位给了大力协助；在走访中，许多当时参加围困长春作战部队的领导同志，如：十二纵队三十五师政委栗在山同志、独立六师政治部主任江学彬同志、独立七师师长罗华生同志、独立九师师长廖仲符同志和马星玉同志、独立十一师师长王效明同志、原吉林省省长于克同志和在北京、大连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很好的建议；在第一稿完成后，二炮宿灿同志、解志一同志、武警总部赵松贤同志以及孙鹤亭同志、海军杨健同志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负责整理肖司令员历史资料的张炜同志对本书的撰写、修改给了具体的帮助；还有长春市政协文史办孟金乙、原建新等许多同志也为撰写本书给了积极的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和完成初稿后，编委会经反复讨论，特别是通过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作了多次修改。但因所搜案资料尚不够完善，尤以编者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以及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1987年11月

